



注释：

① 如薛永应同志在《经济结构学的方法论问题》中就提出这个建议。该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② 张曙光、陈胜昌：《关于经济结构的研究范围问题》，《陕西财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③ 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组织管理技术——系统工程》，1978年9月20日《文汇报》。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7—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页。

⑥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5页。

⑦ 在把国民经济这个大系统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分系统时，当然可以说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是属于不同序列的问题，它们在研究上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下述意见是不能完全同意的，这种意见认为：“第一，如果说经济体制具有某种相对的稳定性，那么经济结构则是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任何静止的国民经济结构都是不存在的。第二，如果说经济体制问题以微观分析为基础，那么经济结构的研究则以宏观经济分析为前提。需要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出发，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按照这种意见，生产力结构处于经常变化之中而生产关系结构则不是如此，生产力结构的研究要从国民经济宏观出发而生产关系的研究则不是如此，生产力结构的研究需要采用系统分析方法而生产关系的结构则不是如此。事实上，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之间不存在这样区别。

（原载《经济科学》1982年第2期）



提高经济效果,促进经济发展

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保证有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要求进一步坚决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行多方面的工作。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努力提高经济效果。

当前我国经济效果很差,提高经济效果的潜力是很大的。从固定资产利用来看,1979年与1957年相比,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增长10.2倍,同时期工业总产值只增长6.7倍,工业净产值只增长5.5倍。1979年每100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工业总产值103元,比1957年138元下降25%。每100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税金也由1957年的34.2元下降为24.9元,下降27.2%。1980年,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利用率继续下降。从流动资金利用来看,1979年国营企业每100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31元,比1957年19.4元增加59.8%,如加上物资供销企业的流动资金,则每100元工业产值占用40.8元,比1957年的23.6元增加72.9%。我国流动资金周转期延长,主要是超储积压物资增加。从产品成本来看,1979年比1966年生铁上升了39%,合成氨上升了29.8%,解放牌汽车上升了31%,水力发电上升了31.9%,火力发电上升了31.1%,硫酸上升了33.2%,21支纱上升了13.7%,新闻纸上升了9.5%。据成本上升幅度和目前生产规模计算,由于成本上升,国家每年约减少收入100多亿元。再从基本建设来看,1980年底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新增固定资产对当年投资之比)为76.7%,比“一五”时期



的 83.7% 低得多。1980 年底基本建设项目在建工程占用资金达 750 亿元以上,相当于当年投资总额的 140%,比“一五”时期的 63% 高得多。据此计算,现在在建工程占用的资金比正常周转需要量多 400 亿元。1978—1980 年 3 年之间,平均每 100 元生产性积累新增加国民收入 42 元。比“一五”时期少 18 元,每年约减少收入 100 多亿元。

经济效果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而这里我们提出通过提高经济效果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一定的发展速度,这是否可能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因为,经济效果固然受经济结构制约,但影响经济效果的还有其他很多原因。提高经济效果除了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外,还要求进行其他多方面的工作。当前,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努力提高经济效果。

首先,对那些消耗高、质量差、亏损大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由于盲目发展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有相当数量的企业不仅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且大量浪费社会财富,它们的产品或者不为社会所需要,或者质量低劣,成本过高,长期亏损。问题在于现在有的地区仍然存在盲目建设的现象,我们不仅必须坚决改变这种状况,而且要下决心关停一批生产十分落后的必须关停的企业。有些企业与其半饥半饱地拖下去,不如关掉一批能源使用效果很差的企业,把能源腾出来,使消耗低、产品质量好而又为社会急需的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其次,整顿现有企业。现在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混乱,劳动纪律松弛,财力物力浪费严重,违反财政纪律,这是经济效果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不少企业在原材料消耗、工时利用、设备利用、工卡具消耗、费用开支等方面缺乏先进合理的定额;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和产品成品缺乏严格准确的计量和必要的出入库手续;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原始记录和统计资料很不完备。有的企业违反国家



关于成本开支范围的规定,乱挤乱摊成本,侵占国家收入。有些企业铺张浪费,请客送礼,大手大脚,挥霍国家资金和社会财富。这些现象如不通过整顿加以克服,是难以在降低成本上取得应有的成效的。当前我国能源供应紧张,但有些企业对能源的使用也缺乏起码的管理。大量事实表明,如果我们把企业整顿工作认真地抓起来,经济效果就会显著提高。

再次,改善经营管理。经营管理对经济效果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经营管理好,经济效果就好。这可以从上海和全国经济效果的比较明显看出来。1979年国营工业企业每100元固定资产提供的产值,上海比全国平均数约高1.8倍;每100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金,上海比全国平均数约高2.1倍;每100元工业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上海比全国平均数约低42%;资金回收期上海为15个月,比全国平均48个月要短33个月;国营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上海为3万元,比全国平均数高1.5倍;工业职工平均创造的国民收入上海为7673元,比全国平均数高1.2倍。上海经济效果比全国好,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同它经营管理水平高也是分不开的。为了改善经营管理,企业不仅要善于管理,而且要善于经营。过去我们忽视经营,今后要加以重视。不仅企业要讲求经营管理,而且整个国民经济和各个地区各个部门都要讲求经营管理,这样才能既提高微观经济效果,又提高宏观经济效果。

又次,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设备的技术改造。过去我们长期忽视设备的技术改造,这也是导致经济效果差的重要原因。目前全国工交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中,超期服役的约占25%,许多企业设备老化、工艺落后,造成产品质量低、消耗高。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由于设备老化,一年多耗标准煤2000、3000万吨。一批老企业由于大量设备陈旧,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很困难。如有的化工厂设备腐蚀严重,生产难以为继。再就技术状况来说,我国有些企业的技



术设备是比较先进的,但是总的来说技术水平较低,如机械工业大部分是50年代的设备,轻纺工业很多是建国以前的设备。很多企业 and 研究单位的测试手段也较差,这是影响当前机械产品上不去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我们在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技术的同时,必须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设备的技术改造。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搞活重工业,而且有利于提高经济效果。

最后,我们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做好这项工作,也必将促进经济效果的提高。当前,要认真总结这几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使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服从于调整 and 有利于调整,并使各项改革措施配起套来,使之既有利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国家的计划指导,从而有利于宏观和微观经济效果的提高。

(原载《人民日报》1982年4月20日,署名:彭昊)



一定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过不少失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个总结对于经济工作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我国“一五”时期的积累率是比较合适的。以后多次犯过积累率过高的错误。这几年党和政府采取措施逐步降低积累率,取得了成效,但和我们的国力相比,从总的方面看,积累率仍然偏高。为了进一步克服这种偏高现象,并使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应该分析研究过去犯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①。这说明了这个问题容易犯错误的客观原因。从主观上来检查,则是由于过去存在一种积累愈多愈好的“理论”,认为积累率越高经济发展速度就愈快,因而不切实际地追求高积累。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合理的积累率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积累就要挤掉消费,这样不仅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且会使人民的消费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挫伤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积累的使用效果下降。例如以



我国“一五”时期和“四五”时期相比，积累率由 24.2% 提高到 33%，而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则由 35 元减低为 15 元。这样，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没有随着积累率的提高而增加，相反是降低了。当然，积累的使用效果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但积累率过高使积累的效果下降，则是不能否认的。总之，根据我国 30 多年来的经验，积累过高不仅不能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过去积累过高，也由于我们没有认真考虑我国的国情。我国生产力水平很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②有的同志援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例子论证可以高积累，他们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区别。资本家可以不顾工人的死活提高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深刻地揭露了这种现象。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必须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努力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建设是搞不好的。过去所以多次犯积累率过高的错误，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我们长期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我们长期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追求过高的生产发展速度。为了达到这种速度，就片面地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以钢为纲”，单纯依靠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来搞建设。这样，势必引起高积累，导致经济效果下降。《决议》对于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这是我们今后要记取的。

我们在防止重犯高积累错误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忽视积累的偏向。应该看到，这种忽视积累的偏向也是存在的。例如在纠正高积累时，曾有过积累率愈低愈好的说法，甚至认为我国“一五”时期的积累率也过高。尤其值得注意的，现在有些地方和企业存在着一



种损害国家利益、片面强调增加职工收入的倾向，滥发奖金等不合理现象相当严重，这样势必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合理的积累。国家的积累消费计划是通过企业实现的，如果企业片面强调消费而忽视积累，企业领导人和职工一起算计国家，国家的积累消费计划也就难以顺利实现。

反对不切实际的高积累，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积累的重要性。恩格斯说，积累是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③。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坚持的观点。国外经济学家认为一定的积累率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为了使国民经济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积累率。旧中国所以不能实现工业化，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积累。据一些学者的估算，旧中国从1931年到1936年的6年中，有4年积累是负数，积累率最多的1936年仅为6%，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结果。现在我们有可能较快地积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要的资金，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我们固然不能认为积累率愈高愈好，同样也不能认为积累率愈低愈好。

为了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关系。通过这几年的讨论，广大干部和群众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这在认识上是巨大进步。但是我们也要使大家明确地认识到，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能是大力发展生产。我们常说“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不满足需要，社会主义生产就没有目的，不发展生产，人民的需要也无法满足。而发展生产则必须有一定的积累。那种片面强调增加职工收入而忽视国家积累的做法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它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从而也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不能离开满足人



民需要来谈发展生产,否则就可能犯高积累的错误;同样,我们也不能离开发展生产来谈满足人民需要,否则就可能犯忽视积累的错误。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还要求改革和完善各种经济管理制度。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是否有利于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判断一种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适合还是不适合的一条重要标准。为了克服国家与企业之间“吃大锅饭”、企业内部职工之间搞平均主义的弊端,现在工交财贸系统正在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但是,有的地方在建立经济责任制时只强调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忽视了他们应负的经济责任,没有真正做到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有的地方由于单纯突出“包”利润,因而有的企业盲目追求利润,不惜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些也都不利于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应该在完善经济责任制的过程中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

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还必须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懂得积累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懂得积累和消费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而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到应该如何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问题,从而自觉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最主要的就是要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同志说过:“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建立起保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关



系的社会经济体制,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第 12 页。
-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第 18 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33 页。
- ④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第 32、33 页。

(原载 1981 年 10 月 13 日《人民日报》,署名:冯明)



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报告中指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要继续以调整为中心，把主要的力量用于调整经济结构，并争取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为了实现这项要求，认真研究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作用，以及调整时期如何处理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等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 健康迅速发展的条件

国民经济是一个大系统，经济结构就是国民经济诸组成要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内在形式和方式。它包括经济比例关系，但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因而，我们不仅要看到经济比例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作用，而且要看到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作用，看到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健康、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

经济结构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它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从我国当前情况看，以下这些方面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第一，经济结构通过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影响经济发展速度。马克思曾指出，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处理好两大部类的关系，这就是第一部类应该生产出维持简单在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实现扩大再生产所需要追加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



应该生产出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 and 实现扩大再生产所需要追加的消费资料。而这个条件能否得到保证,则决定于经济结构的状况。合理的经济结构,才能保证满足扩大再生产对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要求。在我国,当前消费资料主要是农业、轻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主要是重工业提供的,因此,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则表现为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我国社会再生产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就是农轻重关系长期不协调,发展速度过分悬殊。从1949年到1978年,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5倍,轻工业仅增长19.7倍,农业仅增长2.4倍。通过近5年的调整,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快于重工业,农轻重的关系比过去协调了,这是完全必需的,正确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重工业发展速度越慢越好,也不能否认在一定条件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一个规律。

第二,经济结构通过两大部类各自内部的比例关系影响经济发展速度。马克思在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时,除了分析两大部类的关系外,还分析了各个部类内部的关系,如第二部类内部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品的关系,第一部类内部不同生产资料的关系等等。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也表现在各个部类内部比例关系失调。例如消费资料虽然总的来说是数量太少,不能满足需要,但是也存在着有些消费资料严重积压的现象,例如:涤棉布、化纤丝织物、收音机等消费资料的积压相当严重,这是轻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等原因造成的。农业的内部结构也有不合理之处。至于重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就更为突出,如冶金工业中矿山落后,有色金属落后;机床加工能力大于钢材供应能力;能源工业落后等等。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重工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也制约着生产资料合理的优先增长。列宁曾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意味着“不断增长着的某一部分生产资料的产品,是靠该部门内部的交换,即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交换来实现的。”^①



第三,经济结构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合理的经济结构不仅要保证生产过程顺利进行,而且要保证流通过程顺利进行。如果部门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规模结构等不合理,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就要受到阻碍。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尤其要注意经济结构通过流通过程产生的影响。在存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流通不仅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必要阶段,而且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恩格斯曾说生产和流通“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②长期以来我国商业、服务业落后,流通渠道受阻,导致资金周转时间长,流通费用大,产品积压多,是国民经济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还表现在交通运输部门的落后上,1958—1979年间,我国货运量平均每年增长5.2%,不仅低于同期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6%的速度,也低于同期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9%的速度。许多地区用煤非常紧张,但有些地区却有大量煤炭运不出来。这种状况,也极大地妨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四,经济结构通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利用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国民经济才能迅速发展,因此合理的经济结构也应该保证生产力诸要素的正确结合和充分利用。这就要求根据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情况,正确地配置资金集约型产业、技术集约型产业和劳动集约型产业。目前我国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更没有得到合理利用。一方面设备利用率低,产品库存多;另一方面不少待业人员需要就业,就业人员人浮于事的现象也相当严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经济结构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现在劳动力比较充裕,资金则比较紧张,因此,在发展必要的资金集约型产业和技术集约型产业外,要多发展一些劳动集约型产业。过去长时期内轻工业被挤,商业服务业不发达,影响了劳动集约型产业的发展,不能使更多的人就业。又



如工业中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过去既存在着盲目引进先进技术的失误,也存在着很多小型企业消耗过多、得不偿失的现象,这些都必然使得现有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

第五,经济结构通过科学技术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在现代化社会大生产中,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合理的经济结构才能保证科学技术较快地发展,并使科学技术较快地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在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经济结构中能够处理好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关系。例如在产业结构中要有先进的机械工业,给整个国民经济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在分配结构中要使科学技术发展有必要的资金和物资保证;在企业组织结构中要使生产发展和技术革新密切结合起来;在投资结构中要重视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等等。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也表现在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明显的例子是机械工业臃肿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解放后我国机械工业发展很快,机床拥有量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但是结构很不合理,一方面普遍存在生产任务不足,不少生产设备闲置,很多工人没活干;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低,很多生产任务又承担不了,设备老化、工艺老化、技术人员知识老化等现象都比较严重,从而阻碍了科学技术较快地转化为经济效益。据一机部对现有 2.7 万种机电产品的分析,其中 1.1 万种性能较好,可以保留,但大多要改进;1.2 万种性能比较落后,亟待更新;4 000 种性能落后,必须淘汰;而缺口空白的有 1 万多种。如何使经济结构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六,经济结构通过经济效果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经济效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经济结构则从多方面影响经济效果。例如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两大部类以及各个部类内部关系不协调,生产流通过程受阻,就既影响宏观经济效果,也影响微观经济



效果。又如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等现象,限制着专业化的发展,也妨碍发挥分工协作在提高经济效果中的作用。再如由于基建规模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影响投资效果的提高。现在经济效果比“一五”时期下降很多,经济结构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七,经济结构影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从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和源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理的经济结构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重要标志,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相比的一个重要特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得到实现,才能激发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过去一段时期内我们曾或多或少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几年来,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以消费资料生产为中心来安排国民经济比例,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这是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一个重要条件。

此外,合理的经济结构还意味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现阶段我们应该在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并逐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这也是促进经济健康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我国建设的历史充分说明了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制约作用。“一五”时期我们重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根据当时情况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同时注意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基本建设和生产的关系。这些关系总的来说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因此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效果较好,并为“二五”初期经济顺利发展打好了基础。但从1958年开始为了



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速度，破坏了综合平衡和一些主要比例关系，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虽然 1958 年、1959 年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很高，但这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并导致以后工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下降。经过 60 年代初的调整，克服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从 1963 年开始经济才迅速恢复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又继续犯了盲目追求高速度的错误，使经济结构的状况不仅得不到改善甚至趋于恶化，国民经济也难以健康迅速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才开始扭转这种局面，使今后的经济增长能够在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的基础上顺利进行。由此可见，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作用是决不能忽视的。

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促进 经济结构合理化的基础

当前调整时期的中心任务是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之逐步合理化，那么，应当如何处理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呢？五届四次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很快，但并不是不要争取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是完全正确的科学论断。

有的同志不满足于调整时期争取一定的发展速度，主张当前应该实现高速度。这种主张是不切合实际的。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其他原因，还不具备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条件。例如：能源不足、资金短缺、经营管理水平差、重工业市场狭小等等因素，都严重地限制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而要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势必要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比例的失调现象，给国民经济带来莫大的损失。

也有的同志鉴于过去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教训，认为调整时期速度问题是不重要的，在没有发展速度或经济下降的情况下也可以实



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例如可以压缩长线部门的生产以扩大短线部门的生产。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克服部门之间发展速度过分悬殊因而比例失调的状况,压缩长线部门来扩大短线部门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认为仅仅这样做就可以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更不能认为国民经济长期没有发展速度也可以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我们固然应该重视经济结构对发展速度的制约作用,但是也不能否认经济发展速度对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

为了说明这里的问题,有必要从历史上谈谈经济增长对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从人类社会的历史看,经济结构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漫长的年代里,经济增长十分缓慢,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很慢。例如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几千年里都是农业占绝对统治地位,工业和商业难以迅速发展。经济结构的这种长期停滞状况,是同经济增长极其缓慢相适应的。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动则比较迅速。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动有一种明显的趋势,就是在国民经济中农业所占比重呈减少趋势,工业的比重先是增大,以后也有减少的趋势,包括商业等在内的服务行业的比重则呈增大的趋势。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动和经济增长是有内在联系的。

第一,农业比重减少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其他部门转移,一般是在农业生产增长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农业生产发展了,加上工业等部门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农业的比重才趋于降低。从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可以看到,它们农业劳动力比重小,乃是由于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很高。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逐步向工业以及其他部门转移。马克思早就指出:“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③现代经



济结构的急剧变动首先是以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的增长为前提的。

第二,工业比重的变化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也表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先增加后减少,都和经济增长有紧密联系。美国劳动力中工业的比重 1839 年为 16.2%, 1929 年提高到 38.8%, 但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下降趋势, 1950 年为 34%, 1977 年为 27.6%。为什么先增加呢? 因为社会对工业品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需求日益增加, 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为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提供了可能性。为什么后来又减少呢? 这是工业发展到一定时期, 对服务行业的需要迅速增加, 而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允许服务行业可以有较多的劳动力。再从工业内部的变化看, 轻工业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 而重工业正是在农业、轻工业增长的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

第三, 服务行业比重的增加同样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战后一些国家服务行业发展很快, 其前提条件是工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 允许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向服务行业转移。有人估计, 美国目前在教育、科研、情报交流等方面占用的劳动力已接近劳动力总数的一半, 这些服务行业人员增长速变比全部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快 1.5 倍。这也是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 “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 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④

第四, 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也受到经济增长的制约。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国民收入大幅度增加, 才有可能增加积累。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率原先并不很高, 以后能够提高, 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战后日本也是如此, 1945 到 1954 年期间, 国内总投资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 25% 左右, 1964 年增长到 30% 多。

第五, 消费结构也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动的。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了, 消费结构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例如支出



中用于吃的比重减少,文化、娱乐、医疗、保健费用的比重增加等等。服务行业比重的变化也是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结果。

因此,从一些国家的历史看,经济增长对部门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乃至技术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都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解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动有合理的方面,也有不合理的方面。但总的说,这种变动也同经济增长有内在联系。例如我国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是增加的,但占社会总劳力的比重是下降的,1952年占83.1%,1980年占72.1%,工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以工业劳动者为1)1952年为1:13.9,1980年为1:5.6。工农业总产值中,1949年农业占70%,工业占30%,1980年农业占30%,工业占70%。这些变动是伴随着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出现的。从1940年到198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增长2.8倍,其中1977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产值比1952年增长24.8%,比1957年增长11.4%。再如从1952年到1980年我国积累额由130亿元增加到1195亿元,增加8.1倍,这同生产增长、国民收入增加有着联系,同期间国民收入由589亿元增加到3630亿元,增加5.1倍,每人平均国民收入由104元增加到372元,增加2.6倍。正是在这基础上,对工业进行了大量投资,才使工业有较快的发展。再如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也有了变动,这种变化也是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发生的。

综上所述,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经济发展速度影响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从而制约着经济结构的状况。但这不是说经济结构全是由经济增长决定的。事实上,决定经济结构的因素很多,例如产业政策就对经济结构有着重要影响。我们说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也不是说在经济增长等于零或出现负增长时,经济结构就不发生变动。



我国在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和这次调整时期,都曾有意识地降低发展速度,压缩某些部门的生产为扩大另一些部门的生产创造条件,以此来调整经济结构。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处于停滞或萎缩的情况下,虽然经济结构也发生变动,同时也会带来很多困难。因此,在调整时期应该争取客观条件所能允许的—定的发展速度,它是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化的基础。我们既要反对盲目追求高速度,又要防止和克服轻视速度,不去争取可以达到的速度的倾向。

应该指出,我们说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指的是历史上经济结构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动的长期趋势,并不意味着经济结构仅仅由经济增长决定,更意味着可以不顾经济结构和经济比例的状况任意决定增长速度。过去在计划工作中主张比例要服务速度,并且认为速度定得越高越好,把坚持综合平衡说成消极平衡,这是“左”倾指导思想的表现,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调整时期我们既要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又要争取一定的发展速度,这是不是可能呢?事实证明是可能的。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努力提高经济效果,提高经济效果将从很多方面对国民经济产生积极作用。首先,可以用现有的人力、财力、物力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可以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利用率,可以缓和当前能源供应的紧张状况;其次,可以增加盈利,为扩大再生产提供必要的资金,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使国家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可以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当前我国具有提高经济效果的很大潜力。因此提高经济效果不仅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要求,也是处理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是使国民经济走上健康迅速发展轨道的核心问题。

前面曾说经济结构不合理影响经济效果的提高,一定的发展速度是提高经济效果的有利条件,这里又说提高经济效果是促进经济



结构合理化并保证一定发展速度的关键。这种说法是否矛盾呢？不，因为影响经济效果的因素很多，除了上述经济结构、发展速度等因素以外，还有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经济管理体制、经济计划工作、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技术状况等等很多原因。现在有些企业在减产的情况下也增加了盈利，说明通过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就可以使经济效果有较快的提高，在今后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我们要从多方面努力提高经济效果。

注释：

-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143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47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20页。

（原载《福建论坛》1982年第3期，
前半部分曾载《人民日报》1982年7月26日，署名：彭昊）



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 战略的历史经验

经济发展战略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制订指导今后经济发展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一项重要工作是要认真研究过去制订和实行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

过去我们不常使用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有人因此怀疑我国过去没有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所谓经济发展战略，概括地说，就是关于一个较长时期内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措施的设想。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目标和主要措施不仅有设想，而且有些设想已成为党的方针和国家的计划。例如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党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根据这个总任务，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详尽地规定了这一时期的基本任务、具体任务和重要措施，这些任务和措施就体现了“一五”时期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其他时期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也都有过规定或设想。这些规定和设想很多事后证明是正确的，有些则被证明不完全正确甚至是错误的，但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

应该看到，我国在制订和实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一五”时期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制订出来的，它符合我国的国情，贯彻执行得到了显著的成效。周恩来同志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



时曾经指出：“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这些是我们当前也应该贯彻的战略思想。按照当时的规定，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来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就是说“一五”时期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是应该延续下去的。但是从1958年开始，在战略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都犯了错误，例如搞高指标、刮共产风等等，使“二五”时期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但是即使在“二五”时期，也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战略思想，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安排计划要以农轻重为序，要先生产后基建、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应该重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等等。这些重要的战略思想都是这个时期首次提出，直到现在也仍然有它的指导意义。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是为了帮助我们懂得今后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为此，我们还要加深对这些经验教训的认识，将其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例如，过去30年我们曾多次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当注意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实事求是地确定发展速度时，就能够提高经济效果，当盲目追求高速度时，就会导致比例关系失调，经济效果下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必然性，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我们应该系统地收集历史资料，探索发展速度和经济效果的相互联系，从中取得经验。类似的问题，如发展速度和经济结构的关系，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的关系，也要通过总结实践经验给以科学的说明。如果我们在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上掌握了规律性，并且学会了根据具体情况运用这些规律的本领，今后制订和实行经济发展战略就可以避免或少犯错误。

现在理论界对于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有关的经济理论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总结过去的经验，也有助于比较全面地认识这些问题。



例如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我们知道,“一五”计划根据当时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和实现工业化的要求,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实行的结果是好的。可见那种完全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看法是根据不足的。但是,后来片面实行这个方针,又确实带来了种种消极后果。这几年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则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就说明,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有条件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也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规律。我们应该探索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既要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又不要把这个规律绝对化。关于生产和生活的关系,我们曾长期犯过片面强调生产忽视人民生活的错误,而这几年一部分人中又存在一种离开生产的发展而片面强调改善生活的偏向。经验表明,我们搞经济建设既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又不能离开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来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五”计划规定“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至今看来也是正确的战略思想。

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也能帮助我们吧经济发展战略同社会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较好地结合起来。过去我们在社会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上也有经验教训。例如对于劳动就业问题,建国初期处理得较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城乡待业人员增加,这几年解决这个问题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于人口问题,我们曾长期忽视控制人口,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错误,后来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战略,有些地方已取得了成绩。对于这些社会问题,我们要从战略的观点进行总结。再如50年代我国曾制订了科学技术12年长期规划,这个规划是和经济建设结合得比较好的,对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后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对科学技术的作用重视不够,很多技术政策摇摆不定,科学技术工作和



经济建设结得不紧。我们也要对社会、科技发展战略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总之,要从历史经验中学习如何使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战略同步配套,形成最大的合力,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适合本国的国情。研究我国的历史经验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国情,认识基本国情如何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学会从国情出发制订经济发展战略。长期以来,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战略思想,一种是“持久战”,一种是“速成论”。这两种战略思想都经过不止一次的实践,证明“持久战”是切合我国国情的,而“速成论”则不符合国情。但是,不能认为“持久战”思想已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牢固地树立了。而且,“持久战”也绝不是不要多快好省,我们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正是为了使国民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有一个较快的、经济效益较好的经济发展速度,以便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我们要通过对历史经验和现状的调查研究,为“持久战”的战略树立科学的理论依据,并为它的顺利实现奠定思想基础。

为了制订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研究和借鉴外国的有关经验。现在已经开展了对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无疑还要加强。但是,研究和运用外国的经验也有一个和本国情况相结合的问题。研究我国的历史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外国经验和本国情况结合起来考虑,正确认识国外经验对我国的意义、局限性及如何运用它们。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发展出口或以加工出口的外向型工业为主,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人建议我国也采用这种战略。我国发展国民经济应该十分重视进出口贸易和国际交往,坚持对外开放的正确方针。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不可能主要依靠出口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的。



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还要解决几个方法论问题。

一、如何划分战略阶段。过去 30 多年我国经济发展有过多次战略转变,有必要分阶段地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分析研究。可以考虑根据战略转变即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的区别来划分阶段,把建国以来的历史分为六个战略阶段,即(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 (2) “一五”时期(1953—1957 年), (3) “二五”时期(1958—1962 年), (4)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 年), (5)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年), (6) 粉碎“四人帮”以后时期。应该说明,“二五”期间从 1960 年冬就开始改变大跃进时期的发展战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考虑到调整在 1962 年以后才大见成效,通常把 1963—1965 年作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因此我们把“二五”时期作为一个阶段,把 1963—1965 年作为另一个阶段。

二、如何确定各个战略阶段的战略内容。由于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人们对此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加上过去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战略,这就给确定各个阶段的战略内容带来了困难。作为一种探索,我们考虑可以根据各个阶段提出的方针、路线、计划以及它们的贯彻执行情况,来确定各该阶段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的内容。有些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战略思想及由此出发制订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因此,应该实事求是地确定各个阶段的战略内容,而不能简单化。

三、如何评价各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实践的结果是检验其正确与否和正确程度的客观标准。具体地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各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1) 生产关系的演变,(2) 经济效益的状况,(3) 经济结构的演变,(4) 经济发展速度,(5) 人民生活状况,等等。

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过多次曲折的过程,经验教训很多。这几



年进行了总结,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应该进一步分析研究的课题还是很多的。总结过去经济发展战略的经验不能局限于换一个角度重复一些已有的结论,而应该探索新的领域和新的问题,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并使之有助于制订今后的经济发展战略。

(原载《人民日报》1982年5月24日)



坚定不移地实现经济 工作的战略转变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指出：“七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进一步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为了做好这5年的工作，需要认真地总结和吸取“六五”时期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继续实现经济工作的战略转变。

(一)

用历史观点看问题，把“六五”时期和以前的、以后的时期联系起来看，可以说，“六五”时期是一个经济工作战略转变的时期。这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六五”时期已经开始实行经济工作的战略转变，取得了成绩和经验。另一层意思是说，战略转变还没有完成，转变还在继续进行着。

“六五”时期经济工作的战略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 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过去一个很长时期内忽视增加人民的收入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的偏向，“六五”时期开始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重视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 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过去一段时期内重视产值增长速度而忽视提高经济效益，存在着盲目追求速度的偏向，“六五”时期开始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确



定速度,速度要以提高效益为前提。(3)在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上,过去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实行的是不平衡发展战略,“六五”时期实行了农轻重平衡发展的战略。(4)在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上,过去重视基本建设而忽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实行的是以外延形式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六五”时期强调并开始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开始转向以内涵形式为主。(5)在积累消费关系上,过去长时期内重视积累而忽视消费,存在着积累挤消费的偏向,“六五”时期注意克服积累率过高的现象,改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6)在经济体制和对外经济关系上,过去是实行传统的过分集中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搞自给自足的封闭半封闭经济,“六五”时期开始着手改革传统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

“六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成就是同实行经济工作战略转变分不开的。例如,由于开始纠正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偏向,强调提高经济效益的意义和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六五”时期改变了过去增长速度时高时低、起伏极大的状况,出现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局面。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由过去 28 年平均每年提高 3.5% 到近四年平均每年提高 5.8%;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由过去 26 年平均的 20 元提高到近四年年平均的 35.6 元;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 1980 年为 16.3 吨,以后逐年减低,1984 年减少到 13.5 吨;国家财政收入也增长较快。

又如,由于克服了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偏向,加快了农业轻工业发展的步伐,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日趋协调,1978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 27.8%,工业占 72.2%;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 43.1%,重工业占 56.9%,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都嫌过低。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的比重提高为 34.8%,工业的比重相应降低为



65.2%，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的比重提高为47.4%，重工业的比重相应降低为52.6%。1985年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仍保持基本协调。

再如，由于端正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克服了重积累轻消费的偏向。“六五”时期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趋于协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78年我国国民收入使用额中消费占63.5%，积累率高达36.5%，显然积累率过高。经过调整，1983年积累率下降为29.7%，1984年提高到31.2%，虽然高了一点，但由于国民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居民消费水平仍有较快的提高，没有再出现积累挤消费的问题。“六五”时期的5年，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3.7%，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9%。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已坚决地确立了战略转变的思想，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人实行战略转变的自觉性还不够。有的问题上口头转了，实际未转；有的问题上中央转了，地方未转；有的问题上方针转了，措施未转；有的问题上转转停停，甚至出现反复。

突出的表现在速度问题上，由于有些地方和部门盲目追求速度，互相攀比速度，有的人错误地理解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要求，忽视翻两番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不顾条件地提出提前翻番，例如要求翻两番半、翻三番，甚至翻更多，这就导致1984年年底开始的经济过热现象，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也说明经济工作的战略转变尚未完成。例如，产业结构和人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的变化不适应，和扩大再生产的要求也不适应，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很不适应。现在我国工业企业的设备普遍比较陈旧，性



能差,效率低;经济效益总的来说比较低,等等,这些问题当然有很多主客观原因。但也足以说明还必须继续实现经济工作的战略转变。

(二)

在经济工作的战略转变中,既有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又有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变。前一个转变是经济建设问题,后一个转变是体制改革问题。下面谈谈在这两个方面实行战略转变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

1. 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发展从以速度为中心到以效益为中心,是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心。“六五”时期不少经济效益指标有所提高,尤其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益的提高,才使得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均衡稳定地发展。但是经济效益提高的情况并不十分理想。经济效益提高较快的只有少数项目和少数部门,而且有些指标增长不稳定,有些指标还下降了。当前,我国经济效益水平和历史上较好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和国外相比差距更大。以物质消耗来说,1981年每生产1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所消耗的公吨煤当量,我国为2.13,印度为0.80,日本为0.37,巴西为0.33;1979年每生产100万美元工业产值所消耗的钢(公吨),我国为451,印度为435,日本为213,巴西为203。由于各国产业结构不同,以上指标不完全可比,但也大致可以反映出我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经济效益上的差距。从“六五”的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效益还处于粗放经营的低效益型向集约经营的高效益型过渡的起步阶段。我国提高经济效益有不少有利条件,但是也有很多不利条件。例如我国劳动力多,使得外延扩张和粗放经营较为容易;传统经济体制在相当一段时间还将存在



并发生作用,使得提高经济效益缺少有利的社会经济机制;其他如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以及自然经济观念的影响等等,也都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我们要足够估计这些不利条件,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努力促进国民经济尽快过渡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2. 要十分警惕盲目追求工业产值高速度的现象

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尽管党的指导思想已经转变,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确定速度,把效益放在第一位。但是,广大干部思想的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仍有可能出现片面追求高速度尤其是片面追求工业产值高速度的现象。1985年1—6月份工业产值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23.1%,这种超高速增长包含着不正常的因素,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这是体制改革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必然带来的正常现象,这就充分说明人们对速度问题的认识还不一致。应该看到,片面追求速度有相当广泛和深厚的社会经济原因。经济落后使人们要求尽快发展经济,传统体制也会产生一种追求数量增长的倾向。同时当前我国还存在着其他可能导致盲目追求速度的因素。例如:企业发展生产的自主权扩大了;地区、部门、企业为了增加收入而努力提高速度;速度高了可以得到表扬、奖励和提升,因而大家互相攀比速度;缺少严格的责任制,速度过高产生了消极影响也不受惩罚,等等。

为了防止盲目追求高速度,要加强计划的科学性,使计划尽可能符合实际情况,发挥指导作用。制定计划时,对于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要按照它们的具体情况,在速度上区别对待,计划的贯彻执行也十分重要。“六五”时期的速度过快就全国来说,不在计划的制定而在计划的执行。制定计划时强调留有余地,这是正确的,但制定计划后不加分析地号召提前和超额完成计划,这就会导致片面追求速度。还要建立和完善考核经济建设成绩的指标体系,工农



业总产值这个指标虽有简明易行的优点,但缺陷也很多,以此为主要考核指标,必然导致片面追求产值而忽视效益。

我们反对盲目追求工业产值速度,并不是说工业不应该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速度和效益是相互制约的,速度过高不利于提高效益,速度过低也不利于提高效益。我们要把工业发展速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益联系起来考察,在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争取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协调稳定地发展。

3. 不仅要重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而且要重视整个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六五”期间重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通过调整使农轻重比例趋于协调,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但是,不仅农轻重各自内部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整,当前农轻重各占 1/3 的结构状况以及农业增长快于工业、轻工业增长快于农业的增长格局也带有经济大调整的烙印,需要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改造的要求进一步改进,在一段时期内大致形成工业增长稍快于农业、重工业增长稍快于轻工业的格局。

还要看到,产业结构包括多方面的内容,长时期来,我国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失调,突出的表现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1953—1980年第三产业平均年增长率为 5.3%,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大下降。“六五”时期开始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其增长速度开始加快。1981—1984年平均增长率为 11.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要求:“加快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逐步改变第三产业同第一、第二产业比例不相协调的状况。”这是完全正确的。

产业结构中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直接生产部门。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基础设施的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超前系数。我国由于基础设施欠账过多,更需要加快发展。“六五”时期



我国电力消耗系数为 0.64, 铁路货运系数为 0.31, 而按照要求, 前者不能小于 1, 后者不能小于 0.7。这些数字充分反映了我国能源和交通运输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七五”计划建议中要求: “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 高质量、高效率地建设一批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业的重点工程”。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我国农民在人口中占大多数, 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将有几亿农业劳动者转变为非农业劳动者, 这对产业结构将产生重大影响, 必须及早研究和安排。根据“六五”的经验, 农转非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又是一个长过程。农转非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的发展程度。正确地引导农转非将促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就要求农转非的速度要以不影响农业的稳定增长为前提。离开农业的劳动力不要单纯往工业中挤, 更不要过多地往大中城市转, 而要走“离土不离乡”, 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

4. 在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不能要求过高过急

“六五”时期在地区布局的战略上也有明显的转变, 纠正了过去偏重三线建设忽视东部地区的倾向, 注意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潜力, 并开始有步骤地开发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六五”期间, 在是否应该实行“梯度开发”上有过争论, 我认为, 机械地理解和实行“梯度开发”是不可取的, 但是又不能否认, 我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部三大地带, 并且在发展上呈现出逐步由东向西推进的客观趋势, 正确的原则是, 把东部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 使它们互相支持, 互相促进。有的同志提出“逆梯度发展”、“后进地区跳跃发展”, 同样是不可取的, 应该看到, 在我国这样疆域辽阔, 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 在经济建设的地区布局上必须确立有先后、有重点的指导思想, 不可能也不应该齐头并进, 全面开花。实行地区平衡发展作为方向是可以的, 但做到这



一点需要长时期的努力,决不能要求过高过急。

5. 技术改造要增加投资比重,走出一条新路子

为了加快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必须增加更新改造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我国当前技术改造投资的比重同国外相比是低的,例如,苏联1960年用于技术改造的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55%,1970年占58%,1980年达到70%。美国1971—1978年的投资总额中,技术改造的投资为69%。我们设想,有必要在2000年以前,把社会固定资产综合更新周期逐步缩短到10年左右,为此目的,“七五”期间需要把全民所有制单位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提高到45%左右。

企业技术改造还要走出一条新路来。过去长时期内,企业的技术改造由国家包办,企业缺乏改进技术的动力和压力。其结果原来比较先进的技术,过了一段时间也变得落后了。因此要在体制改革中增强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动力和压力,使之经常主动地努力改进技术。

6. 避免和克服国民收入超分配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六五”期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趋于协调,但是出现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共同膨胀、国民收入超分配的现象。在超分配的国民收入使用过程中,存在着挖用往年库存、多余货币购买力不能实现以及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等现象。

为了避免和克服国民收入超分配,首先要建立和完善投资调节机制,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六五”时期的情况是,1981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减少,规模比较适当。1982年投资开始膨胀。1983年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收到一定效果。但1984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又以更大的幅度增长。1982—1985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长22%,大大超过同期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结果又导致积累率上升。这是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最重要



的原因。

现在和过去相比,投资主体、投资形式和投资决策都起了相当大的变化。经过改革,过去以中央为主体的局面已有改变,开始形成中央、部门、地方、企业以及全民、集体、个人和外资纵横结合的多层次的投资主体结构,投资形式也改变了单纯由国家财政拨款方式,形成了贷款、自筹、集资、合资、股份投资以及利用外资等多种投资形式的格局,与以上变化相适应,投资决策也有分散化的趋势。“六五”计划执行的结果,预算内投资超过计划 14.2%,而预算外投资则超过 85.2%。这种变化增加了控制投资规模的困难和复杂性。

为了避免和克服国民收入超分配,还要注意控制消费基金增长幅度,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存在很多可能导致消费基金失控的因素,例如:企业有了一定的分配权,可以多发工资奖金;企业有了一定的定价权,可以通过提价增加收入;在当前双重价格条件下,企业和个人有谋取更多收入的可能性;企业在工资上互相攀比;职工收入和企业经营好坏挂钩后,宏观控制没有跟上,导致职工收入过多;职工生活还不富裕。提高生活水平要求很多,而收入高了就降不下来;多种经济形式经营方式共同发展,也可能导致消费基金增加过多。此外,宣传工作的片面性也会助长消费基金失控。可见,控制消费基金也是相当艰巨的。

当前,在消费基金的分配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在克服平均主义的同时如何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如何处理好物价和收入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要认真研究和妥善解决。

7. 在改革中要紧紧抓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个增强企业活力的中心环节

“六五”期间在增强企业活力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如何估计改革的形势,也有不同的看法。1985年讨论速度问题时,有的同志认为,传统体制已经无足轻重了,产生片面追求产值动机的体制



环境已在改革中逐渐消失。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首先,从企业的自主权看,虽然经过改革,一部分企业有了自主权,开始活起来了,但是在国民经济中起骨干作用的大中型企业绝大多数还没有真正活起来。其次,从市场的作用看,尽管这几年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收到了相当大的成效,但对市场的作用也不能高估了。例如生产资料市场还处于形成阶段,严格来说许多重要的生产资料还没有形成正常的市场,而且现在价格体系仍旧很不合理,难以充分发挥促使生产力要素配置合理化的作用。再次,从企业对于盈亏的责任看,国有企业一般还没有实行自负盈亏,吃“大锅饭”的情况依然存在。最后,从企业的行为看,尽管企业的利润动机、市场意识等都增强了,但是,由于政企职责不分、企业尚未实行自负盈亏以及卖方市场的普遍存在和市场上缺乏必要的竞争等等原因,传统体制下企业行为的特征并未根本改变。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一切改革的措施都要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看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企业不自主经营固然不行,不自负盈亏同样不行,只负盈不负亏更加不行。企业实行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才能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才能具有提高经济效益的强大动力,并经受到强大的压力,国家才有可能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促进企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但在改革中要不断把这个过程推向前进。

8. 改革要力争配套

“六五”期间,我国在大体明确了改革目标和方向的基础上,采取谨慎从事积极稳妥的方针,渐进地、分步骤地把改革推向前进。这种做法,在搞活经济的同时,避免了大的经济震荡,造成了有利于



改革的形势。但是,由于缺乏经验,有些改革措施不相衔接和配套,甚至相互矛盾,产生了消极作用。由于改革采取渐进的方式,势必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既有传统体制又有新的体制发生作用。由于新旧体制在运行机制、调控手段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别,也会产生很多矛盾。双重价格的矛盾就是突出表现。为了解决以上矛盾,要求在改革的各个阶段上力争各种改革措施协调一致,配起套来,这就要求认真研究各项措施的作用和利弊,研究如何使它们减少摩擦,发挥合力。

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了保证改革顺利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条件具备时需要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在中国这样情况复杂的大国里,要求在开始改革时就有一个周密可行的总体方案,是不现实的,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但是,这几年来改革已取得了很多经验,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也更加明确了,实践中也有很多问题要求从总体上加以考虑和解决。因此,现在已有条件着手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我们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改革的目标和步骤等问题,尽快制订出有科学根据并且切实可行的总体改革方案,更好地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三)

总结过去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经验,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战略转变,并且加快战略转变的过程。

为什么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战略转变呢?因为,这样做,才能巩固成绩,发展成绩,才能较好地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只有这样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有希望。“六五”时期的实践又一次表明,我国只有走提高经济效益的路,走技术



改造的路,走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路,才能保证国民经济迅速健康地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要求,加快现代化的进程。而为了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就必须同时实现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建设服务的。现在改革已成为世界潮流,社会主义各国都在进行改革。不改革,没有希望,不进一步改革,也没有希望。从我国当前情况看,已具备了把改革放在首位的条件。“七五”时期我们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促进。这是继续进行战略转变的要求,也是加快战略转变过程的要求。

完成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首先,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需要一个过程。从各国产业发展的历史看,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的任务不是短时期所能完成的,而我国原来的产业结构极不合理,同时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要在逐步现代化的基础上完善产业结构,这样,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就更更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其次,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一个过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次革命,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看,没有比较长的时间也难以完成改革的任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比较低,完成改革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再次,传统的战略还有影响。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世界性,在我国又宣传执行了近30年,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比较彻底地消除这种战略的影响,也需要一个过程。

还应该看到,我们在进一步实行战略转变中会遇到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存在着有利于外延扩大再生产的主客观条件;双重体制使得有可能用老框框老套套来解决矛盾和问题;战略转变涉及人们的利益,有的人会由于暂时的利益给转变增加这样那样的阻力;随着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转变的深入,会遇到一些更加困难的问题,等等。但是,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我们还是一定能够加快



战略转变的过程,胜利完成这个转变的。因为,一方面党的指导思想已实现了转变。事实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而且一定能够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已经从战略转变中得到了很大的实惠,衷心拥护转变,决心把转变进行到底。继续实行战略转变是人心所向,而人心所向的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怎样才能加快战略的转变过程呢?这要求在多方面努力。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努力学习。战略转变过程中出现不够坚决不够自觉的现象,有些是同学习不够有关的,因此,很有必要对全体干部进行一次新战略的再教育,要组织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和报告,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以及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有关文件。第二,认真总结经验,尤其要总结“六五”时期贯彻执行新战略的经验教训,通过总结,加深对新战略的认识,增强实现新战略的自觉性。第三,重视理论问题的研究。“六五”时期的经验也表明,研究理论问题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理论概括突破了传统理论否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框框,克服了很多模糊的乃至错误的认识,指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道路。这个事例充分说明,弄清理论是极其重要的,为了加快战略转变,我们也要更加重视理论研究工作。此外,还要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论经济建设还是体制改革,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安定团结则是最基本的条件。我们要消除一切不利于团结的因素,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和促进战略转变的完全实现。

(原载《思想战线》1986年第5期)



两个“转变”： 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战略指导思想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我强调一点，就是当前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贯彻两个“转变”的要求，尤其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战略指导思想，在制定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时认真贯彻。下面就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的意见：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

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有种种说法，例如：外延型和内涵型，粗放型和集约型，速度型和效益型，数量型和质量型，等等。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中的提法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认为这个提法比较确切和科学。

所谓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指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的增加；所谓集约型经济增长，是指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要素效率的提高，即靠提高要素生产率，或者说是提高效率。

现在我国经济增长的70%是靠投入的增加。国外有的国家经济增长中70%靠科学技术进步，而我国科学技术（包括管理）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只有30%。因此，我们说中国现在还是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向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我认为不能把粗放和外延、集约和内涵等同起来。笼统地说外延就是粗放，内涵就是集约，是不确切的。因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可能是粗放的，也可能是集约的，内涵扩大再生产可以是集约的，也可以是粗放的。

我们通常把建设新企业视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把改造老企业视为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并强调要改变重视新建忽视改造的现象。现在强调内涵是必要的，但有些新建也是需要的，而且内涵也可能是复制古董。所以，应该全面认识粗放和外延之间、集约和内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则是提高效率，即提高生产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中的贡献份额。经济发展战略和长期计划中应该提出这方面的具体要求和指标，真正落实和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进一步提高对“转变”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现在有些人的认识还很不够。这并不奇怪，因为长时期来我们追求速度而忽视效益，习惯于粗放经营。改变这种习惯并不容易。问题还在于，当前我们还缺少保证和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条件，至少这方面的很多条件还不充分和完善。所以，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应该认真领会这个观点。

二、经济体制要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表现。经济体制也要有利于经济



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保证这个转变的顺利进行。这里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问题。现在理论界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讲得不少,但对其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问题讲得不多。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需要条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苏联都曾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務。结果是日本转变了,苏联没有转变。原因何在呢?我认为主要是条件问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哪些条件呢?我认为至少要有六个方面的条件,即:1. 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有一定的基础,产业结构适应集约型增长的要求,并有较高的积累率和投资能力。2. 科学技术有一定的水平,而且进步较快。3. 重视经营管理,不断改进经营管理。4. 有一支素质较高的职工队伍和企业家队伍。5. 经济体制有利于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6. 政府实行促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这些条件都是很重要的,忽视任何方面的条件都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

那么我国是不是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呢?我的看法是,条件基本具备了,可是还有欠缺,还需要充实和完善。尤其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条件,不能说已经非常充分了。

应该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只可能实行粗放型或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实行集约型或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很快,有些部门技术进步也可以很快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技术进步受到很大限制,速度不快,水平也不高。到了一定时期,经济发展速度也会放慢,导致经济领域问题丛生,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只有进行经济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具备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时,才有可能实行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是因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靠企业,企业有了转变经



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和压力,才可能实现转变。这种情况,不管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一样,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在这里,社会制度的性质并不是转变的必要条件,但是说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保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则是有根据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才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同时才能存在竞争而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样企业才会有实现集约经营的动力和压力。加上其他必要条件,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现在我们还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还没有建成这种体制,这是现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主要的困难。因此,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中强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这是说得非常深刻的和正确的。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建议》中说的企业经营机制、技术进步机制、经济运行机制等三个机制具体内容是什么,如何才能形成这三种机制?

我认为形成这三种机制的基础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简称“四自”。有人反对企业“四自”的提法,我不同意这种主张,我认为企业必须“四自”,这样才能是名副其实的企业。

要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除了“四自”还要求企业善于管理,加快技术进步。当前还要进行企业改组,即做到“三改一加强”。可以说“三改一加强”是企业集约经营之路。



要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企业“四自”也是基础和前提。尤其要重视解决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问题,使企业有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和条件,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此外,还要形成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企业有技术创新的强大动力和压力。

要形成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配置的市场运行机制,则就要求更高了。因为这不仅是企业的微观问题,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问题。除了要求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要求建立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要求具有健全的市场法规和市场监督管理制度,即建立正确有效的宏观管理制度。而实行企业“四自”也是基础。

既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要靠企业,毫无疑问,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都要成为有活力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为此,除了重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管理问题,还要重视非国有企业乃至非公有企业的改革和管理问题。非国有企业、非公有企业也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这也可称之为现代企业制度。当前尤其要重视集体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非国有企业、非公有企业也有改组改造和加强改进经营管理的问题,也有增加活力、增加竞争力的问题。对非公有企业还有加强管理监督,使它们更好地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的问题。

我认为,要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结合起来。国有企业不是可有可无,但现阶段只能要求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不能要求它起主体作用。主导不等于主体,现阶段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在内的整个公有经济。从目前存在的问题看,还要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范围,退出一些不该国有的部门,加强必须加强的国有部门。因此要认真贯彻“抓大放小”的方针。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规划。改革中的有些问题看来需要最有权威的领导来解决。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反映上海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在建立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后，仍难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例如，国资部门所有者职能仍难到位，国资公司行政职能仍难转移，运行方式仍难改变。这些问题，国资部门和各主管部门都解决不了，需要更高的领导机构来解决。

三、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说：“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结合起来。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中需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难度也很大。据了解，全国省市制定的增长速度低于党中央《建议》的只有个别省市，其他的都超过《建议》，都在10%以上。因此，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问题还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要根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来处理好这个问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不要高速度，而是要在提高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争取高速度，要投入少、产出多的高速度，要持续稳定的高速度。现在就全国经济发展情况而言，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高速增长是有可能的，在资源、资金、技术、市场等等方面都具备长期高速增长的条件。

不过，也要看到当前和今后增长速度受到制约的一面。例如，受基数高的制约，受资源供给的制约，受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制约。所以，也不宜把增长速度定得过高。正确的做法是在提高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争取高速度，这样的速度是越高越好。而如果继续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把增长速度定得过高，势必会为了速度而妨碍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仍旧走粗放经营之路，违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也不会实现持续稳定的



高速度。

四、把城乡关系作为战略问题来抓

有些人往往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看成只是工业部门的事情,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任务,也就是各个经济部门都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工业中而且要在农业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要在城市中而且要在乡村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果我国的工业是集约经营了,而农业还是粗放经营,不能说我们已完成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

在农业中和在乡村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要靠工业发挥主导作用和城市发挥带动作用。这就涉及城乡关系问题。在长期规划中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研究和处理。

上面我曾说,今后中国能够长时期维持高速增长。原因何在?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广大而又不富裕并迫切要求现代化的农村。现在我国还是一个工业农业国,按人口构成说还是农业工业国,农村人口还占多数。我国农民比较穷,随着经济发展,如果农民达到现在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引起的市场需求就会使我们有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现在经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很低,主要是受市场需求的限制。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在于有无比广大的市场,这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农村市场。

注释:

- ①《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问题》。

(原载《市场经济导报》1996年第11期)



关于产业结构 调整和升级



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

近两年来,我国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为调整国民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应该承认,调整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这固然由于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复杂,同时也由于我们对调整的重要性迫切性认识不足,在行动上贯彻调整的方针不够有力。因此,从理论上对调整问题进行研究,以便提高认识,统一步伐,这对于进一步做好调整工作,使我国国民经济早日由被动转为主动,是十分必要的。

调整时期的主要任务

调整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需要一个调整时期?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在经济工作中,一般的调整是经常要进行的。我国当前的调整不属于这种情况,而是专门需要一段时期用来调整国民经济。原来估计需要三年时间,现在看来要更长的时间。

调整时期的主要任务不决定于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经济形势和要求。也就是说,应该从国民经济实际情况出发,从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出发,来确定主要任务。当前国民经济中的突出问题是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主要如:农业和工业的比例失调,表现在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尤其是很多轻工业所需的农产品原料供应



紧张；能源紧张，很多工厂由于缺乏能源无法正常生产；有些产品销售困难，积压严重，这表明不仅有生产不足，而且有生产过剩；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积累率还在30%以上，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和物力；财政有赤字，货币发行有所增加，物价也有上涨趋势。在这种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流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不仅扩大再生产难以进行，简单再生产也往往难以顺利进行。这种情况，决定了要把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克服严重比例失调放在首位，而这也正是需要一个较长的调整时期的原因。

粉碎“四人帮”以后，按理说我们就应该进入调整时期。但是，那时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尤其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及其后果认识不足，因而未能及时开始调整。直到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全国才进入调整时期。但是，对调整时期的主要任务也还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一种意见不同意调整时期把克服比例失调放在首位，而主张把速度放在首位，力争高速度，认为这样做才能解决比例失调问题。这种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是有表现的。例如，在基本建设上，1980年9月底比1979年年底，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虽然减少了200多个，而在建项目总投资规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同时，在挖、革、改的名义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基本建设项目。在生产上，盲目生产的现象非常严重，不少地方不顾全局性的经济效果，开办小棉纺厂、小烟厂、小酒厂、小糖厂、小纸厂等等，与大厂争原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同志还是把速度放在首位，而忽略了调整经济比例。

比例和速度的关系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1958年以后，为了论证所谓“大跃进”，就开始流行比例服从速度的说法，主张比例关系必须服从于高速度的要求。这种主张是经济战线上“左”倾错



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影响着我们的计划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前两年调整中盲目建设、重复生产仍如此严重，说明它现在还在对我们的经济工作起着消极作用。不弄清楚比例和速度的关系，调整时期的任务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是以国民经济比例的协调为前提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受国民经济比例制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曾专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再生产的条件。他指出：社会再生产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①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为C、V、M三个部分，分别研究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他还指出第一部类内部和第二部类内部也存在着“不断往返的运动”。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等著作中还假定了一些新的条件，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研究。马克思、列宁的这些分析，表明社会再生产只有在两大部类之间、两大部类内部、积累和消费之间等方面存在着协调的比例时，才能顺利进行。而且，仔细看一下马克思、列宁的再生产图式，也能发现，社会再生产的发展速度也是受两大部类之间、两大部类内部、积累和消费之间等等比例关系的制约的。

马克思研究社会再生产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对象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过程证明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在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下，国民经济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在危机时期，不仅不可能有高速度，而且会使速度急剧下降，甚至出现大倒退。如果认为社会再生产及其发展速度不受比例的制约，而可以由人们的主观愿望来决定，那岂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危机时期也不会产生速度下降的情况了吗？



马克思关于比例制约速度的理论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由于其固有的优越性，经济发展有可能比以往的社会快些。但这决不是说社会主义再生产不再受各种客观条件（比例关系也是一种客观条件）的制约。相反，社会主义经济要真正能够发展得快些，还必须以各种主要比例关系的协调为前提。马克思早就指出：“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②。

在比例服从速度这类错误理论的影响下，长期以来我们违背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盲目追求高速度，这样就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比例严重失调可能导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痼疾，是生产社会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的，是执行错误的方针政策，违反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结果。

所谓“积极平衡”就是为了把高速度放在第一位而提出的一种错误的方针。这个方针主张计划可以留有缺口，名曰按长线平衡，实际上是不搞综合平衡，并且把综合平衡贬为“消极平衡”。由于这个方针的影响，长期来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留有缺口，搞不好综合平衡。主张“积极平衡”的同志认为，在比例失调的情况下，这样做可以达到经济高速度发展。事实上，实行所谓“积极平衡”，必然加剧国民经济的不平衡，从而决不可能带来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那种持久的、稳定的、有最佳经济效果的高速度。1962年陈云同志就对这个问题的深刻分析。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材料和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



衡。”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是对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不幸的是，长时期内他的意见不仅没有受到重视，而且被当作错误观点来批评，从而使那种“积极平衡”的主张得不到及时的纠正。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还表明，盲目追求高速度必然使生产和建设的正常过程受到阻碍和破坏，必然使经济效果下降，从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我国生产的增长速度从总产值来看虽然不算低，但经济效果很差，而且有下降趋势。1979年与1957年相比，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收和利润由34.7元下降为24.8元，下降29%；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由19.4元增加为31元，增加50%。基本建设工程造价显著增加，“一五”时期与1976—1978年相比，每吨钢的综合投资由1360元增加为3497元，每吨煤的综合投资由56元增加为179元，每枚棉纺锭的综合投资由684元增加为1250元。增加1元国民收入需要增加的投资，“一五”时期为1.68元，“四五”时期为3.76元，1976—1978年为3.2元。也就是说，近年来增加1元国民收入所需投资比“一五”时期大致增加1倍。由于生产和建设中消耗大，浪费严重，经济效果差，虽然总产值增长速度不算低，但真正可分配的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增加并不多，加上积累和消费关系处理不当，人民生活改善很慢。现在我们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经过调整，我们要走一条速度虽不那么高，但经济效果有显著提高，即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有较多增长，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的路子。今后即使有条件加快速度，首先也要搞好综合平衡和考虑全面的经济效果，再不要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错误了。

调整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

为了做好调整工作，我们必须弄清楚调整工作的主要内容，当



前尤其要抓住调整的中心环节。中央指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是压缩基本建设,这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提出压缩基本建设已有多数,最近两年也取得一定成效,但任务远未完成。出现这种情况原因甚多,而思想上对压缩基本建设的意义认识不足,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认真研究当前调整国民经济为什么要抓压缩基本建设这个中心环节,是很有必要的。

为了从理论上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考察基本建设的特点及其对国民经济比例的影响。基本建设同其他生产活动相比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资。按照我国历年实际消耗水平估算,每百亿元投资,约需建筑安装钢材 120 万吨,木材 300 万立方米,水泥 500 万吨,此外还需要消费机电设备制造用钢材 100 万吨。此外,由于投入许多劳动力,还需要大量生活资料。第二,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一个大中型项目往往需要多年才能建成,这期间需要不断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如果工程不继续进行,已经在生产上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就会白白地耗费。即使以后工程恢复了,它在这段间歇时间里也会不断损坏。”^③第三,在这比较长的时间里,既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也不提供任何生活资料,因而也不会带来任何收入。第四,基本建设项目建成后,要真能发挥作用,还必须再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例如需要投入原材料和燃料动力,需要相应的运输条件,需要调配相当数量的职工等等。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条件,即使项目建成了,也难以提供产品和收入。由于这些特点,基本建设对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两大部类的比例、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以及对于物资平衡、财政平衡和信贷平衡等等,其影响往往超过其他某一个物质生产部门,并往往会对以后多年的经济活动发生不容忽视的作用。

马克思非常重视基本建设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比例的影响,深



入研究了基本建设规模膨胀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2卷中曾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基本建设规模突然膨胀对社会再生产发生的种种影响。例如,第一,使“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第二,使“社会的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压力”。“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第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价格都会上涨”。因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第四,导致“欺诈盛行,资本会发生大规模转移”。第五,“在那些生产可以急剧增长的企业部门,会发生突然的扩大,随即发生崩溃”,等等。我们过去对这些分析没有很好注意,而它对于我们认识基本建设的影响是有指导意义的。马克思还特别指出:在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里,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于基本建设而不致造成损害。“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④。这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处理好基本建设规模因而必然导致经济危机。我们由这里可以得到启示:新社会如果不处理好基本建设规模,同样“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又说:“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⑤这是又一次提醒我们,在新社会要吸取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训,正确确定基本建设规模。

为了说清楚为什么压缩基本建设是调整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还要考察当前基本建设规模的情况及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

我国基本建设不仅长时期来规模过大,而且经过两年整顿后现



在依然过大。

首先,它远远超过了国家可能提供的物力。1980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500亿元,实际不止此数。而国家可以用于基本建设的钢材只能满足431亿元投资的需要,水泥只能满足312亿元投资的需要,木材只能满足331亿元投资的需要。不属于以上投资的挖、革、改项目,钢材只能满足需要量的一半多一点。水泥只能满足42%,木材满足不到一半。

其次,它也远远超过了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的影响,财政收入的增加受到很多限制,而为了解决遗留问题都必须增加支出。这几年国家采取调整价格、增加工资、发放奖金、安排就业等措施,增加了职工和社员的收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基本建设规模却没有相应地缩小,这就超过了国家财力可能负担的程度。

如不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还有扩大的趋势。如上所说,1980年全国大中型建设项目数目虽减少了,总投资规模却增加了。小型项目也增加很多。1980年上半年在建的百万元以上的基础项目,比上年全年基本建设施工项目还多。

当前我国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从多方面对国民经济产生消极作用,导致或加剧比例失调。

首先,从对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影响来看。基本建设投资主要来自积累,投资规模过大必然导致积累率过高。“四五”时期积累率平均为33%,1976年、1977年分别为31%和32.3%。1978年基建投资由上年的364亿增加为480亿,积累率提高到36.5%,在我国历史已仅低于1959年和1960年。1979年仍为33.6%。1979年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为347元,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地区中名次是很后的。这既限制着消费,更限制着积累。这两年我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城乡人民的收入,基建规模却没有相应地压



来,从而导致积累和消费相加超过国民收入这种不正常的局面,这说明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是很严重的。

其次,从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影响来看。按理我们应通过基本建设逐步克服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但基建规模过大却加剧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例如1980年各地盲目建设了一批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厂,如小丝厂、小烟厂、小酒厂、小油漆厂、小肥皂厂等等,不仅同老厂争原料,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而且也加剧了农产品原料和加工工业的矛盾。基本建设过大还加剧能源供需的矛盾。这不仅是由于过多的项目在建设中考费能源,而且是由于很多项目建成后扩大了能源供需均缺口。我国过去引进的13套大化肥的装置,由于缺油缺气,1979年只发挥了六套半的能力。1978年又签约引进一批需油、气很多的项目,进一步加剧了能源问题。基建规模过大还会增加在部门间合理分配投资的困难。因为分配投资不能不照顾原来的建设摊子,往往使得不该增加投资的部门增加了,该增加的部门得不到增加。例如虽然我国交通运输是短线,但1979年铁道、交通的投资却都减少了。这是由于在建规模过大,合理安排有困难。

再次,从对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关系的影响来看。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这是发展生产的基本原则。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则违背了这个原则,不仅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简单再生产也要受到破坏。据统计,1979年达到了全部建成投产的95个项目中,有42个项目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充分发挥效果,这或多或少和基建规模过大有关系,例如因缺乏原材料燃料生产不正常的有12个,生产任务不足、产品没有销路的有13个。这是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的例子。我国现有企业有相当部分由于缺少原材料和燃料动力而开工不足,据估计因缺少能源全国有20—30%的生产能力闲置,而基本建设却挤了现有企业需要的原材料和燃料动力。这是简单



再生产受到损害的例子。

复次,从对于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影响来看。陈云同志曾指出计划工作随时随地注意组织物资财政信贷三个平衡,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必然破坏这三个平衡。由于基建需要消耗大量生产资料而又长期不提供产品,规模过大就会导致物资不平衡。我国不少物资供应紧张,就是由于基建规模过大。我国基本建设投资主要是靠国家财政拨款,基建规模过大,投资过多,不仅要影响其他财政支出,而且会导致财政赤字和发行过多的货币,影响财政平衡和信贷平衡。这两年我国财政有赤字,货币发行过多,基建规模过大是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从对国民经济效果的影响来看。建设规模过大将从多方面影响经济效果:一是建设过程中许多项目不能及时得到所需的资金和物资,因而拖长工期,提高造价;二是有些项目即使建成了,由于缺乏原材料和燃料动力也不能正常生产;三是基建挤了现有的生产,即扩大再生产挤了简单再生产;四是盲目建成的小厂产品质量差,消耗多,成本高,销路不畅,造成积压,而大厂则因原料被挤而减产甚至停产;五是基建规模过大难免导致许多项目被迫下马,造成浪费。

总之,如果不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国民经济中很多重要比例失调现象是难以克服的,一些基本比例关系是难以协调的,整个经济工作也难以由被动转为主动。因此,当前我们必须压缩基本建设,要使基本建设退够,并且要把这项工作当作当前调整工作的中心环节来抓。

有的同志担心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消极作用,尤其担心基本建设退够会带来消极作用。应该指出,我们主张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是压缩过大的部分,主张基本建设退够是使它和国家可能提供的物力、财力相适应。这样做,正是为了克服建设规模过



大带来的种种消极后果。还要看到,压缩基本建设的总规模,并不意味着各行各业都要退。相反,农业、轻工业、能源、运输等国民经济的短线部门,还应当有较快的增长。为了实现这种增长而必需的基本建设是不应当“一刀切”的。

当然,在压缩基建规模的过程中,是会发生许多问题和带来许多困难的,例如停建缓建项目需要维护,有些施工队伍可能窝工,有些部门和企业的产品销路可能发生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可能受到影响,缩减有些项目可能影响以后的扩大再生产,等等。这些问题和困难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不在于进行调整,而在于过去基建规模过大,经济畸形发展。为了使压缩基建的积极影响最大和消极影响最小,当前还要注意研究基本建设合适规模的数量界限,有了这个数量界限,我们压缩基本建设就有了比较科学的根据。总之,我们要认真研究和妥善解决压缩基本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困难。

除了压缩基建以外,调整国民经济中还有多方面的任务。例如调整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农业内部、轻工业内部、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比例关系,生产和流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经济和科学教育的关系等等,每一方面的具体任务也很多,而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各个时期也会有所不同。各个地区和部门都应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做好各项调整工作,努力提高经济效果。

加强和改善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计划指导

这次调整国民经济是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同时进行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为调整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扩大企业自主权,改变单一的计划调节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从而调动了企



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有可能改变生产和需要脱节等缺陷,这些都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的。但是,调整 and 改革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调整要求更多的集中统一,改革则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为了使调整和改革相互促进,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调整要为改革创造条件,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为调整服务。同时,还必须加强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计划指导,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改革的积极作用,防止和克服可能产生的某些问题,促使调整工作进行。

但是,现在我们对加强国家计划指导的意义认识很不够,存在着忽视计划工作的现象。有的同志把改变单一的计划调节看成是国家的计划指导不如以前重要了,不去改进和加强计划工作;有的同志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对立起来,放松了对国民经济的计划指导;有的同志认为计划指导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对立的,担心强调计划指导会妨碍企业发挥积极性。这些看法都不利于调整工作的进行。

为什么必须加强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计划指导呢?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和以往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优越性之一。只有加强了国家的计划指导,才有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计划化。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很多是计划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由于长时期来主观主义地对待计划,使我们的计划工作受到破坏,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放任自流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严重的比例失调由此而产生。调整就是为了克服比例失调,理所当然地要加强计划工作。我们所以要改变单一的计划调节,也是由于它违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尤其是违背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要求,因而不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也不利于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因此,总结过去经济工作的教训应该得出正确的结论:不容



许削弱国家的计划指导而是要改进和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

其次,实行市场调节要求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实行市场调节有利于把国民经济搞活,这样做不是减轻了计划工作的任务而是加重了它的任务。有的同志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对立起来,乃是由于不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在于它同时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渗透关系。商品生产总是带有一定自发性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自发性有可能被克服,这是以国家的计划指导为前提的。现在我们扩大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不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就难免导致自发性的加强,在生产、流通、分配等方面带来盲目性。从当前实际情况看,经济中的市场调节部分还没有完全很好地纳入国家计划,既给企业带来很多困难,造成企业生产任务不足、原材料不足、燃料动力不足和产品积压,又增加了国民经济中的自发因素,妨碍调整任务的完成。因此,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计划指导,实为当务之急。

再次,扩大企业自主权也要求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为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把企业的积极性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这就有必要加强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的指导。如果在放弃或者忽视自家计划指导的情况下扩大企业自主权,就会出现生产无政府状态,加剧国民经济的不平衡。为了不使基本建设失去控制,不使工资福利的增长失去控制,不使物价的变动失去控制,迫切需要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

从企业本身来说,也只有国家加强宏观经济的计划指导,使自己所需的设备、动力、原材料有保证,使产品有销路,也才能真正实现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而在当前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加强宏观经济的计划工作,才能保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顺利进行。

还要看到,当前计划工作中有严重的缺陷,亟待改进和加强。



例如,在指导思想,盲目追求高指标、忽视综合平衡的现象尚未肃清。在调整工作中,往往一般号召多,具体安排少,由于对发展什么、限制什么、压缩什么规定得不具体,因而出现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现象。有些正确的计划安排也未能得到切实的贯彻。

为了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计划指导,需要认真研究国民经济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增长速度,主要产业结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投资规模和方向,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等等。当前尤其要认真研究调整时期的重大经济问题,例如,基建必须退够,但退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就要研究压缩基建规模的各种方案,权衡利弊,进行选择。又如,各个部分基建情况不同,有的退下来不会影响以后的生产,有的现在就是薄弱环节,退下来会更加紧张,有的还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这些都要区别对待。再如,必须消除财政赤字,但究竟如何消除,也要周密考虑不同做法的不同后果。

根据当前的情况,各级计划部门有必要加强对市场的调查研究和预测,如生产趋势的调查和预测,市场趋势的调查和预测,购买力的调查和预测,消费构成的调查和预测等等。目前这方面工作非常薄弱,不仅影响对国民经济中市场调节这一部分进行计划指导,而且影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指导。现在出现的盲目生产和盲目建设,许多和对市场缺少调查和预测有关。

还有一个国家加强计划指导的方法问题。中央指出,调整国民经济,除了采取各种有效的经济手段以外,还必须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这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我们主要用行政手段甚至单纯用行政手段领导经济,把国民经济搞得很死,这样做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把单一的行政手段改变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因此,批评单纯采用行政手段并不是完全不要行政手段,强调经济办法也不是不要



任何行政手段。而且,经济手段也不是没有局限性,因为经济手段是以利用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而单凭价值规律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可见,在任何时候,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经济都应该把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结合起来,同时还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在当前调整时期,由于以下一些情况,更不能忽视行政手段的作用。第一,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刚刚开始,原来的经济体制还在发挥作用,市场机制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很多经济手段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第二,由于存在严重的比例失调现象,不仅限制着经济体制改革,而且直接限制着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第三,经济手段也有一个配套问题,只有把各种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利用,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经济手段的配套需要经验的积累,要有一个过程。第四,经济手段充分发挥作用还要求健全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这方面的工作现在一下子也难以跟上。第五,调整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时期,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要求尽快地解决,行政手段比经济手段更能适应这方面的要求。总之,在调整阶段,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把企业进一步搞活,把经济进一步搞活,也要在一些重大的关系全局的问题上,由国家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要使这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陈云同志 1962 年曾指出克服当时经济困难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另一条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这里所说的集中统一,就是在给地方和企业以必需的机动财力以后,把力量集中统一起来。”这两条办法,也应该成为这次调整中克服困难的指导思想。

注释: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438 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68 页。



-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257、350—351、396—397页。
-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257、350—351、396—397页。
-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257、350—351、396—397页。

（原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3期）



关于产业政策的几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产业政策是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和实行正确的产业政策，是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七个五年计划》，规定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向和原则，并对重要产业部门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为了贯彻这些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合理化，有必要加强对产业政策问题的研究。

必须重视产业政策的研究

在前一段时期，很多单位很多同志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研究产业政策的课题，这不是偶然的。加强产业政策研究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出的要求。就我个人突出感受到的，至少有以下几个重大问题的解决要以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为前提。

第一，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长时期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尽管一再要求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但迄今仍未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控制投资规模就会遇到投资在各个部门如何分配的问题，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每个部门都要求尽可能多地给自己增加投资，认为本部门投资少了而其他部门投资多了。可见投资规模问题是和投资结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过去投资结构上也有很多不合理的方面，控制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必须和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结合起来进行。这就要求有一个正确的产业结构政策,使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有所遵循。1985年11月马洪同志在“全国投资政策研究会”上指出:“正确的投资政策,主要取决于正确的产业政策。要对我国的产业进行系统的调查,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适合我国情况的产业政策”。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第二,加快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实现现代化必须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当前国民经济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改造应该成为每个企业自己的事情。但是,各个企业的技术改造即使就本企业来看是合理的,就整个部门来看也未必一定合理。而且,各个部门的安排还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排。例如,如果汽车工业没有一个通盘的技术进步规划,则很难判断各个汽车厂技术进步方案的合理性,而汽车工业的技术进步方案又决定于把汽车工业的发展放在什么地位上,这就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来考虑问题。从我国国情出发,在技术进步上不仅对各种类型的企业会有不同的要求,而且对各个部门也会有不同的要求。有的要求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有的要求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有的要求采用一般适用技术。这些要在制定全国的和各个部门的技术改造规划中解决,而制定有科学根据的技术改造方案,也要以正确的产业政策为依据。

第三,保证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这几年乡镇企业飞快发展,今后必将进一步发展。但是如何使乡镇企业进一步健康发展,也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以发展乡镇工业来说,就有一个处理好内部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处理好乡镇工业和城市工业关系的问题。现在乡镇工业在内部结构以及和城市工业的关系上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据调查,江苏苏州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中,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产值不到



10%，食品工业只占 2.16%，而以化纤原料为主的轻纺工业占 63%，机械建材工业占 26%。这种结构可能是不够合理的。在我国广大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应当放在农产品的初步加工和产前产后服务业上。如何贯彻这个指导思想，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总之，为了积极扶持和认真指导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处理好它的内部外部产业结构关系，也要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

第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发展对外贸易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尽管我国是一个大国，国内有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市场，但是发展对外贸易也仍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努力增加出口，创造更多的外汇，是更大规模扩展对外经济贸易与技术交流的基础和关键”。这是完全正确的。而要扩大外贸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就必须努力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现在我国出口的主要还是初级产品和粗加工制成品，应当逐步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制成品转变，由主要出口粗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精加工制成品转变。显然，改善出口商品结构要以改善产业结构为前提，因而要求研究产业政策。我国的进口商品结构也需要改进，例如前几年就过多地进口了一些高档消费品。正如有的同志所说：有些耐用消费品开始供不应求，“等到各地竞相引进成品和生产线，市场又趋于饱和，新的过剩马上来临”。为了克服这种现象，也要求把改善进口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政策结合起来研究。

我们提出应该加强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并非是说过去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有人认为中国过去没有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舶来品，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离不开产业政策。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明确规定了一整套产业政策。这个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表明当时制定的产业政策总的来说是符合客观条件的，是正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后，我国在制定和实现产业政策上也有很多好的



经验,这几年在产业政策的研究上更是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六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第七个五年计划》对于产业政策的规定,都充分说明了这方面的成绩。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又提出重视产业政策问题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一段长时期内,我国产业政策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例如,由于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提出过比例服从速度等错误方针,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经济效益下降。再如,由于过分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过分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导致农轻重比例失调。又如,由于片面实行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方针,不仅妨碍农业和工业全面发展,而且妨碍粮食和钢铁的发展。又如,由于重视生产而轻视流通,没有把商业、服务业放在应有的地位上,使得商业、服务业长期落后,等等。现在这些失误大都已经得到克服,有的也在纠正。但是,如何全面深刻地吸取教训,也还是值得研究的。例如,究竟如何处理好速度和比例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生产和流通的关系,都还有复杂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其次,过去的有些失误是有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深刻原因的。例如,由于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看成在任何时期都适用的规律,因而导致重工业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由于把流通领域的劳动一概看成非生产劳动,认为它们不创造价值,因而导致对商业服务业的忽视。过去对于产业结构的研究,偏重于两大部类的关系和农轻重的关系,对于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劳动密集产业、资金密集产业、知识密集产业的关系,则不仅没有重视研究,甚至还否认有划分一、二、三次产业的必要。重视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忽视一、二、三次产业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就难以全面掌握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从而会导致政策的偏颇甚至失误。这



些理论和方法问题,有的已经引起重视和得到解决,有的则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甚至还存在着束缚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有一个继续大胆探索、扩大思路的问题。

再次,过去的产业政策是以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为指导思想的,而现在和今后的产业政策则应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为指导思想。传统的产品经济论不仅是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也是过去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前面曾说我国“一五”时期的产业政策总的来说是正确的,这是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而言的。事实上,当时的产业政策并没有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没有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而是强调和力求扩大指令性计划和产品统一分配的,例如,在“一五计划”规定的“实现工业生产计划的必要措施”中,就提出要“加强国家的物质分配机构,有步骤地扩大国家统一分配的产品的范围”。在“机器制造业”的企业政策中也规定:“逐步地实现机器产品生产的统一计划,不断地扩大统一分配的范围”。这些政策从产品经济论来看是必要的,而从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来看,就未必尽妥了。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制定产业政策,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最后,当前研究产业政策还面临着其他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例如,由于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我国正处于由温饱阶段向小康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如何使产业结构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很不容易的。再如,现在处于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时期,新技术革命将对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影响,而中国又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建立起适应和有利于新技术革命的产业结构,也颇为不易。又如,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时期,坚决贯彻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也不能完全照搬了。而对于其他国家的产业政策尽管应该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但是也不能



照抄照搬。由于经济体制在变动过程中, 产业政策的有些部分还要随着这种变动相应地调整或改变。这些情况和问题, 都要求我们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

什么是产业政策

以上从一些方面说明了为什么要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那么什么是产业政策呢?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为了明确研究的范围和任务, 对此作些探讨也是必要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 产业政策就是研究发展重点产业的政策。例如有人认为, 产业政策就是规划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目标, 确定带动整个经济起飞的“战略产业”, 并通过政府的经济计划、经济方法和经济措施, 扶植“战略产业”的起飞, 并诱导经济按规定的目标发展。

这种看法强调产业政策要确定“战略产业”部门并规定扶植“战略产业”起飞的政策措施, 这是正确的。但是, 如果把研究产业政策局限在研究战略产业上, 就值得商榷了。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 其中有些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应该作为战略产业来扶植, 这是必要的, 但是, 战略产业的起飞也离不开其他产业的发展。所以, 对于其他产业(至少其中的主要产业)也要规定必要的政策措施。而且,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会出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一些部门向另一些部门转移的情况, 对于迅速发展的部门, 当然要规定正确的产业政策, 对于停滞或紧缩的部门, 同样也要规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再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来看, 1958年“大跃进”中曾试图以钢铁翻番为中心, 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即所谓“一马当先, 万马奔腾”。但最终钢铁不仅没有带动国民经济发展, 而且本身也未得到应有的发展。这里原因很多, 而脱离其他部门孤立地对钢铁生产提出要求, 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 研究产业政策不仅要研究发展重点产业的政



策,而且要研究发展(或调整)其他部门(尤其是其中的重要部门)的政策。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研究产业政策就是规划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提出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发展的目标。有人认为,研究如何扶植或抑制某一产业部门的政策措施,这是一般政策研究的任务,研究产业政策应该集中精力研究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和演变趋势,以便提出产业结构发展目标的设想。

这种看法强调研究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和发展目标的重要性,这也是正确的。但是,提出产业结构发展的目标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为此还必须研究实现目标必须采取的政策措施。从一些国家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的实践来看,它们产业政策的内容一般都是既包括目标设想,也包括实现目标的各种政策措施。例如日本的产业政策除了提出产业结构发展的目标外,还规定如下政策措施:(1) 补助金和税收优待措施,如由政府提供补助金,允许特别折旧,减轻税收负担。(2) 金融政策,如规定优惠利率,提供贷款。(3) 限制进口措施,如限制进口数量,提高关税。(4) 禁止垄断政策。(5) 行政指导。^①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也对重要产业部门规定了主要的政策措施,这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产业政策研究和一般政策研究是会有重复和交错的,但这也不能作为产业政策不研究具体产业部门政策措施的理由。至于在研究过程中进行分工,不作全面研究而着重研究某些问题,当然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产业政策是针对市场机制可能导致的失误而采取的政策。例如有人说:产业政策的中心课题就是针对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方面出现的失败采取对策。还有人说:产业政策是一组政府政策的总名称,它或者是用于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或者是用于对某些产业的组织形式进行干涉,以避免市场机制中的一些非限制功能所可能造成的对国家整体利益的损害。



这种看法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的,就是产业政策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个认识是正确的。过去我国的产业政策忽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带来了消极后果。针对这种情况,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是必要的。值得探讨的是,产业政策是否只是补充市场机制的不足。上述看法可以作多种理解,包括这样理解:产业政策是补充市场机制的不足的。就是说,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产业政策则起着补充作用。如果这样理解问题,那至少是根据不足的。因为,从历史看,单纯(或者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成功的产业政策不仅是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而且还利用其他机制,包括计划机制。说产业政策是针对市场机制可能导致的失误而采取的对策,这种说法也是太笼统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产业政策来说,固然不应该片面强调计划机制而忽视市场机制,同时也要避免片面强调市场机制而忽视计划机制。在这里,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是起着指导作用的。这里还涉及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建议学术界开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还有人提出问题:研究产业政策和研究经济发展战略是什么关系。有人说:这几年研究经济发展也曾研究重点产业等问题,现在提出研究产业政策,两者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呢?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就是要确定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措施、战略步骤等等,其中确定战略重点包括确定重点产业部门和重点行业,确定战略措施包括制定促进这些部门、行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可见,研究产业政策和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在内容上也是有重叠的。两者的共同点主要在于:它们都是研究未来的问题和对策的,都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发展和对策。但是,两者又是有区别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研究经济发展战略涉及的时间长,研究产业政策涉及的时间短。如前者的时间跨度一般在10年以上,后者的时间跨度则一般没有这样长。



第二,研究经济发展战略不以研究产业结构为主体,研究产业政策则以研究产业结构为主体。如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时,20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产业结构政策是作为战略措施提出来的,而产业政策则必须以研究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为主。第三,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只涉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研究产业政策不仅涉及这些产业部门,而且涉及其他产业部门。所以,后者涉及的产业部门广泛得多,涉及的产业政策具体得多。第四,研究经济发展战略不一定要求制定全面的系统的具体的产业政策体系,而研究产业政策则最终是为了制定这样的产业政策体系。有人认为研究产业政策是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化,我认为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不过应该看到,研究产业政策还有着新的要求和任务。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产业政策是对于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和目标的设想,同时规定各个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实现这些设想的政策措施。这里说的一定时期不宜过长,例如不宜长于一个战略阶段。这里说的各个产业部门指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包括农业、工业、采掘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服务业以及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等等。农业、工业等部门还要进一步细分。这当然不是说一切大小部门都要立即制定产业政策,但是主要部门(不同于重点部门或“战略”部门)则是都应该制定产业政策的。这里说的规定地位作用指确定优先发展产业、重点发展产业、一般发展产业、控制发展产业等,即规定产业部门发展的优先次序和提出有关要求。这里说的政策措施可以分为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投资政策,技术政策,税收政策,劳动工资政策,贸易(包括国内贸易、国际贸易)政策,整顿企业政策以及其他有关的各种重要政策。



为了明确什么是产业政策,还有必要谈一谈产业政策的特点。产业政策的特点很多,当前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产业政策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有明确的产业政策,有的则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迄今为止,产业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可有可无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产业政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产业政策,社会主义经济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了。那么产业政策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政策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过去我们的经济政策体系曾以速度政策为核心,事实说明这样做是不妥的。看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政策体系应以产业政策为核心,这样既可以保证产业结构合理化,也可以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使国民经济以较高速度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第二,产业政策涉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大多数产业是由一个个企业构成的,规划和指导产业的发展就要设法影响企业行为。所以,产业政策必然要影响甚至干预企业的活动。在社会主义传统体制下,企业不成其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很多产业政策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这种情况现在应该改变了。为了使企业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制定和贯彻产业政策时,必须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办事。这种要求对其他政策也适用,但对产业政策尤为重要。

第三,产业政策本身也是一个政策体系。有人把产业政策归结为产业结构政策。我认为产业结构政策在产业政策中是特别重要的,但把产业政策归结为产业结构政策则不全面。也许可以说,产业政策是以产业结构政策为核心的一个政策体系。还有人认为产业政策是供给管理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这样说也有道理。但是作



为一个政策体系，产业政策既涉及供给，也涉及需求。而且，确定产业结构也不只是考虑供给方面的因素，同时还要考虑需求方面的因素。

在西方经济学中有所谓需求管理供给管理之分，这种分类对我们也有参考意义。但是，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实行经济计划、产业政策是为了弥补他们所谓的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西方经济学家有的主张需求管理而反对供给管理，有的主张供给管理而反对需求管理，实际上是把两者对立起来的。而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指导作用，因此，就不能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对立起来。根据这种情况，把产业政策说成供给政策，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管理政策截然地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些说法做法是否妥当，似乎也可以研究。

第四，产业政策有很大的风险性。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很多。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越来越复杂，它的发展趋势也越来越难以预见和掌握。而且，产业政策不仅涉及产业结构，而且涉及经济发展速度，涉及经济效益。因此，为了某一目标，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很多，确定产业政策的风险性很大。战后英国工业以发展纺织、采矿、造船、冶金等传统部门为主，尽管原来在这些部门有优势，结果却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和现代化的步伐，这是选择战略产业发生失误的一个例子，而日本则由于选择战略产业比较正确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如何减少产业政策的风险性，使之有更多的科学性和切实可行，有赖于研究工作的加强和政策水平的提高。

产业政策的作用

产业政策的作用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明显的，在资本主义国



家也是明显的。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经济所以发展较快，是同它制定和实行比较正确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沃格尔在《日本名列第一》一书中，提到美国必须向日本学习时，认为首先应该学习日本的产业政策。沃格尔说：“日本的产业贸易政策，确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欧洲各国近年争先求教于日本。美国现在的资源储备富庶而洋洋自得，然而倘要在今后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保障国民的幸福生活，就应当在贸易产业政策上发挥领导作用才是。”^②

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作用也有不同看法。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曾说：“在战后日本产业的发展中，日本政府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本政府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为民间企业完善了活动的场所即竞争性市场机制的环境。关于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在战后时期以及在所谓高速增长时期，它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产业的发展主要还是以民间为主进行的。”我们当然不应该夸大日本产业政策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产业政策的作用必然会受到种种限制。同时，日本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也确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取得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市场机制不可能及时地在各个产业部门间合理分配劳动，从而也不可能保证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只有依赖正确的产业政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统观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还是应该承认产业政策对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确实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日本的产业政策至少在以下诸方面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使产业结构和国内消费结构以及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关系大致协调，并保证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化和现代化。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对抗性矛盾，日本正是采取一系列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生



产和消费的矛盾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日本在战后初期实行所谓“重点生产方式”，着重复兴电力、钢铁、煤炭等基础产业。50年代中期实行“产业合理化政策”，大力扶植汽车、石油化工、机械、电子、飞机等工业的发展。60年代实行“产业结构高度化政策”，选择了重、化学工业的发展方向。70年代采取向知识集约型产业结构转变的政策。80年代又酝酿进一步向高度技术与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力相结合的“创造性的知识密集化”方向发展。这些政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现代化。

第二，保证国民经济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日本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其原因很多，产业政策比较正确是主要原因之一。总的来看，日本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趋于大致协调，有利于扬长避短，发扬优势，有利于缓解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而产生的种种问题，这些都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事实上，日本在这段时间采取的一整套产业政策，其目的也是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

第三，保证和促进技术进步。日本在确定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时，是充分考虑世界技术进步的态势和本国科技发展的需要。日本产业政策中的许多政策措施是为了促使技术进步，而且，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也是技术进步的前提和有利条件。沃格尔曾这样介绍日本的经验：“日本人懂得，为了吸收新技术，必须把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提高到世界性水平。与此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获取外国的技术，通常要比自己进行基础研究便宜得多。”“他们在实践中发现，与其最先进行新产品的市场化，不如待相关技术的发展日臻完善时，以改善设计和建立在成熟的先进生产技术基础上的低成本为武器，迅速打进市场更为有利”。^③可以说，没有比较正确的产业政策，日本技术进步也不会取得这样大的成就。

第四，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日本资源缺乏，国内市



场也比较狭小,所以,日本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外贸易。日本制定产业政策充分考虑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进口产品的需要。事实证明,这些考虑是有远见的。沃格尔说:“日本掌握了把产品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全部方法。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输成本,日本把重工业企业建立在太平洋沿岸地区。这样,在原材料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方面,使运输线趋于最短。另一方面,由于努力发展造船和海运事业,因而在降低了海上运输成本的同时,还成功地把远洋运输对外国的依赖程度控制在最小限度内”。“日本在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免受国外企业竞争威胁方面做得真可谓天衣无缝。对于海外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为了保护本国有发展前途的战略产业,日本总是尽可能拖延到本国拥有了充分的竞争力时才开放”。^④这种评价不见得都很妥当,但是,应当说,日本在对外贸易上的成就,很大功劳应该归于它的产业政策。

日本是运用产业政策很有成效的一个国家,而资本主义国家决非只有日本运用产业政策取得成效。沃格尔在《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一书中说:“据说,在美国,政府并不偏袒某个特定的产业,也不裁判孰胜孰负,而是听任市场去做选择。但在实际上,翻翻美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到,政府曾屡次采取振兴特定产业的政策”。^⑤他列举了美国产业政策成功的四个例子,即 1. 宇航工业, 2. 农业, 3. 住宅建设, 4. 北卡罗来纳州经济的现代化,并且总结了经验。使人感兴趣的是,这些例子表明,即使以自由放任为标榜的美国,在某些领域也是有产业政策的,而且有些产业政策也取得了成功。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我国 30 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地说明了我国的产业政策指导着产业结构的演变。我们要坚决贯彻实行《第七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产业政策,保证产业结构向合理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注释：

- ① 参见《现代日本经济事典》，第 193—195 页。
- ② 《日本名列第一》，第 220 页。
- ③ 《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第 170 页。
- ④ 《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第 170 页。
- ⑤ 《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第 213 页。

（原载《中国工业经济学报》（季刊）1986 年第 3 期）



论汽车工业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规定：要把汽车工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为了实现这个决策，需要解决很多认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够，对汽车和公路运输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发展小轿车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而不提高这些方面的认识，是很难做到真正把汽车工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加快汽车工业的健康发展的。现在，进一步发展我国汽车工业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正在深入讨论汽车工业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问题。本文拟就几个有关汽车工业地位作用的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汽车工业的技术经济特点

汽车工业的地位作用同它的技术经济特点有着内在联系。发展汽车工业必须认识和掌握这些特点。汽车工业有哪些主要技术经济特点呢？

（一）汽车工业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

汽车是由1万多个零部件组成的产品，它需要多种多样的原材料和制造工艺。日本生产1台小型轿车需要的原材料中，铁占2.2%，普通钢钢材占59.5%、特殊钢钢材占14.3%，非铁金属占



5.6%，非金属占 18.4%，非金属中有橡胶、玻璃、涂料、纤维等等。因此，汽车工业同钢铁、有色金属、橡胶、塑料、玻璃等原材料工业及机械电子工业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量使用汽车还涉及运销、商业、金融、保险、修理等行业。由于汽车工业是具有广泛关联产业的综合性工业，它的发展一方面能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以这些关联产业的发展为条件。

（二）汽车是一种方便灵活的交通工具

汽车同火车、船舶、飞机等相比有更加方便灵活的优点。火车受铁路车站的限制，船舶受河流港口的限制，飞机也只能从机场到机场飞行。而汽车只要有公路，就可以实行“从户到户”的运输。因此，汽车运输可以弥补铁路、船舶、航空等运输的局限性。有人称铁路、船舶、航空等运输是“线”的运输，称汽车运输为“面”的运输，这话有一定道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往的增加，诸如公务出行、商务洽谈、迎送客户、推销商品、上门服务、传递商情、就诊治病、走亲访友等等，不可能都用定时定线定点的集体交通工具，而也需要使用有利于个别活动的交通工具。有人对客运量分析，认为那种出行时间不同、抵达地点不同、旅行目的不同的分散旅行活动一般占总客运量的 2/3 以上。而只有汽车尤其是小汽车才能较好地完成这种使命。

（三）汽车工业是技术密集产业

汽车是技术密集度很高的产品。在加工工业中，产品的零件数可以衡量技术密集度。人们通常把纺织品、自行车、电视机、汽车、发电设备、大型客机作为零件数为 10^1 、 10^2 、 10^3 、 10^4 、 10^5 、 10^6 的代表产品。汽车的技术等级固然比发电设备、大型客机低，但它的产量远大于这些技术等级比它高的产品，它是世界上零部件数以万计、产量以千万计的唯一产品。早在 50 年代，美国就有人指出，汽车已经历了装车汽车时代、设计汽车时代而进入了科学汽车时代。



所谓科学汽车时代就是指汽车工业中运用的各项基础理论、基础技术、计算技术、测试技术、设计和试验方法、制造技术以及相关行业的技术,使之能够按照使用要求、市场需求以及其他特殊要求来设计和制造汽车。现在,汽车工业中已广泛应用数控机床、机械手、电子计算机、柔性生产线,成了自动化等先进科学技术的集合体。

(四) 汽车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

汽车工业需要大量的投资。按我国统计资料分析,当零部件自给率在40%左右时,每产一辆汽车所需投资约为人民币2—15万元不等。也就是说,建设一个年产15万辆的汽车厂,最少需要投资20亿元。这里还不包括相关产业需要的投资。日本汽车产业的投资,1965年为1459亿日元,1970年为3723亿日元,1975年为3366亿日元,1980年为10998亿日元,1985年为11179亿日元,分别占当年制造业投资的13.9%,10.5%,8.8%,23.6%,18.1%,占全产业投资的9.6%,7.8%,5.6%,11.2%,8.5%。汽车企业还要花很大的经费在科学研究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975年销售额为345.3亿美元,科研费用为11.39亿美元,占3.1%。福特汽车公司同年销售额为231.7亿美元,科研费用为7.48亿元,也占3.1%。日本的丰田、日产、本田、大发公司一年的科研费用为9.6亿美元,占销售额的2%。

(五) 汽车工业规模经济效益明显

规模经济效益是指随着生产批量增加发生的成本降低效益递增现象。许多工业都存在这种现象,而汽车工业尤为明显。据英国人马克西和西尔伯斯通对汽车生产线长期平均费用所作的分析,就一种车型的生产批量同成本的关系而言,当年产量由1000辆增加到5万辆时,单位成本下降40%;由5万辆增加到10万辆时,单位成本下降15%;由10万辆增加到20万辆时,单位成本下降10%;由20万辆增加到40万辆时,单位成本下降5%;当年产量超过40万辆时,成



本下降的幅度急剧减少；在达到年产量 100 万辆的水平后，再加大批量就超出了效益递增的极限，效益就下降了。美国人贝恩认为，汽车生产的最佳规模是年产 30 万辆到 60 万辆；罗慕尼则认为每日一班生产年产 18 万辆到 22 万辆是最佳规模，每日两班生产年产 36 万辆到 44 万辆是最佳规模。看来，最佳经济规模决定于工艺方式、工艺水平、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而我国目前一些汽车工厂年产量仅为几千辆甚至几百辆，则肯定是违背规模经济效益的要求的。

（六）汽车工业竞争激烈

汽车工业历来存在激烈的竞争。美国原先生产汽车的工厂很多，后来只剩下少数垄断集团，就是激烈竞争的结果。现在世界汽车市场竞争尤为激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汽车专家一致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汽车行业出现了大量设备过剩，促使这种过剩能力增加的主要因素，是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其他竞争者也不断加入这场竞争。在韩国现代汽车公司的埃克塞尔汽车的出口取得成功之后，韩国起亚汽车公司也计划在 80 年代末向世界出口汽车。南斯拉夫正在向美国出口南斯拉夫牌汽车，马来西亚也打算将其普罗通隆加牌汽车运往美国。泰国也在出口汽车方面跃跃欲试。日本一些专家认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企业应具有如下条件：① 高度的研究开发能力。② 高度的商品规划能力。③ 高水平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技术。④ 强大的经销网。⑤ 综合经营管理能力。这是颇有见地的经验之论。

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作用

汽车工业的特点决定了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汽车工业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发展的各个阶段，它的作用也有所不同。汽车工业只有成为支柱产业，才能充分发挥其作



用。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汽车工业开始成为支柱产业时,产量一般在200万辆左右。美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汽车工业已和钢铁工业、建筑业一起成为支柱产业。其他一些国家的汽车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成为支柱产业。联邦德国1960年汽车产量达205万辆,英国1963年汽车产量达201万辆,法国1966年汽车产量达202万辆,日本1966年汽车产量达228万辆,苏联1976年汽车产量达202万辆。一般把这些年代看作这些国家汽车工业开始成为支柱产业的标志。汽车工业成为支柱产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汽车工业成为支柱产业后,其产值在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均在5%以上,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1%以上,日本、联邦德国高达3%以上。1965年日本汽车工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6.8%,汽车工业就业占制造业就业的4.2%,1975年分别提高到8.3%和5.3%,1985年进一步提高到11.9%和7%。1975年美国汽车工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7.3%,汽车工业就业占制造业就业的4.7%,1985年分别为8.7%和4.5%。1975年英国汽车工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6.5%,汽车工业就业占制造业就业的6.1%。1984年联邦德国汽车工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9.4%,汽车工业就业占制造业就业的10.1%。

(二) 波及范围广,波及效果大

汽车工业成为支柱产业后,对其他部门的影响很大。1978年美国汽车工业消耗全国钢材的28%,橡胶的61%,铝的17%,锌的30%,铜的80%,收音机的50%。1983年日本汽车工业消耗全国普通钢材的11.8%,特殊钢材的13.1%,橡胶的46.7%,铝合金铸物的83%,铝压铸物的59.8%,亚铅压铸物的42.2%,弹簧的60.5%。汽车工业就业人口加上关联产业的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美



国约为 1/6, 日本约为 1/10。1981 年日本机械工业各部门对主要产业的波及效果(指该产业增加 1 单位时对有关产业生产的波及系数)是: 汽车为 2.465 6, 一般机械为 2.331 8, 重电力机械为 2.412 6, 其他电器机械为 2.376 8, 精密机械为 2.053 1。可见, 汽车工业的波及效果在机械工业中是最高的。由于本身比重大和波及效果大, 因此汽车工业的发展速度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有重要的影响。日本 60 年代国民经济高速增长, 联邦德国 50 年代国民经济高速增长, 都同它们当时汽车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有内在联系。

(三) 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 公路运输也发展起来, 并改变着交通运输结构。汽车工业成为支柱产业以后, 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将会缓和, 交通运输的面貌将会改观。日本旅客运输 1960 年总量为 2 433 亿人公里, 其中汽车运输为 555 亿人公里, 铁道运输为 1 844 亿人公里, 航空船舶运输为 34 亿人公里, 分别占 22.8%, 75.8%, 1.4%。1983 年总量为 8 218 亿人公里, 其中汽车运输为 4 641 亿人公里, 铁道运输为 3 214 亿人公里, 航空船舶运输为 363 亿人公里, 分别占 56.1%, 39.1%, 4.8%。货物运输 1960 年总量为 1 389 亿吨公里。其中汽车运输为 208 亿吨公里, 铁道运输为 545 亿吨公里, 内航海运为 636 亿吨公里, 分别占 15%, 39.2%, 45.8%。1983 年总量为 4 223 亿吨公里, 其中汽车运输为 1 935 亿吨公里, 铁道运输为 277 亿吨公里, 内航海运为 2 007 亿吨公里, 分别占 45.8%, 6.6%, 47.6%。汽车运输在短途运输中的作用尤为突出, 原先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体系已改变为以汽车为中心的交通体系。

(四) 增加外汇收入, 促进对外贸易

汽车有巨大的世界市场, 目前世界汽车出口竟达 1 300 万辆左右。而且汽车出口换汇率高, 很多汽车工业发达的国家, 汽车出口在总出口额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日本汽车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



1965年为5.1%，1970年为9.7%，1975年为14.5%，1980年为21.9%，1984年为21.7%。1984年日本汽车出口金额达369亿美元，占主要出口商品的第一位，几乎获取了进口石油所需的全部外汇。美国汽车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1975年为9.5%，1985年为9.4%。英国汽车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1975年为8.7%，1982年为6.3%。联邦德国汽车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1975年为12.3%，1984年为17%，韩国、巴西等国家也在积极出口汽车，1982年韩国汽车出口占总出口额的4.8%，巴西占4.6%。

（五）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发达的汽车工业不仅要求本行业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而且要求有关产业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例如，大批量生产汽车要求钢铁工业能够保证供应各种规格质量合格的钢材，要求机械工业能够提供各种高精度高性能的机械设备，要求轮胎工业能够生产具有高速性能、安全可靠、耐重压和耐久性强的轮胎，要求玻璃工业能够生产强度高、安全、吸热力强的玻璃，要求石油工业能够生产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发动机性能而又不损害耐久性的高品质的汽油，等等。适应汽车工业的发展，钢铁、机械、橡胶、玻璃、石油等关联工业的技术水平也会不断提高，有关的科学研究也会发展起来，有名的泰罗制首先是在汽车工业中应用的。亨利·福特曾说：“大规模生产，就是把动力、准确性、经济性、系统性、连续性和高速运转等原则运用到制造一种产品的生产上面，……其正常结果就是这样的一种生产组织，即用最少成本，大量生产出按标准化设计、标准化工艺和标准化材料制成的有用商品。”^①汽车工业不仅是技术发展的关联产业，而且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先驱产业。

（六）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

汽车工业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汽车工业的附加价值高，波及效果大，汽车工业的发展对增加人民收入有重要作



用。随着人民收入的增加,小轿车由奢侈品成为生活必需品,扩大了经济活动和生活的范围,并给个人的职业选择、就业机会、社交活动、文化娱乐以重要影响。汽车的普及还改变了城市的面貌,缩小了城乡差距。美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街道和公路的建筑是政府经费中第二项最大的支出。劳动力的新的流动和长途卡车运输使工厂的厂址由集中走向分散,使太平洋沿岸地区和西南部地区在商业上得以发展,并使区域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汽车更进一步使郊区的地产业繁荣起来,并且促使许多新的小商业成长,如汽油加油站和旅游者的膳宿供应等”。到“70 年代中期,通过扩大消费者分期赊购办法使几乎所有人(十分贫穷者除外)都拥有汽车,大大加速了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就可以看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向”。“城市的快速干道穿过了一度紧密连结的一些邻近地区,城市由于有了更大的停车场,更宽的街道和更长的街段而可以容纳这些车辆。由于人们变得愈加依赖汽车,汽车直接驶入的设施扩大了,从汽车电影院和汽车饭馆一直到汽车银行,甚至汽车教堂”。^②当然,资本主义国家汽车的普及也带来不少问题和消极后果,有人说小汽车的泛滥是现代世界的最大错误之一。但是,汽车工业对方便和提高人民生活的积极作用是无可否认的。正如《工业化史》一书的作者所说:“在上一世纪末前不久,汽车工业才初见端倪,从此后开始迅猛地发展起来,它最有意义的篇章载入我们时代的史册。人们的生活由于有了汽车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③

轿车生产在汽车工业中的地位

在汽车工业中,轿车生产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没有轿车生产,就没有现代汽车工业的发展。我们过去对汽车工业重视不够,对轿车工业更重视不够。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是,轿车是单纯



的消费品和奢侈品,轿车的普及是资本主义文化的表现,企图不发展轿车工业而发展汽车工业。

其实,汽车最初是作为载人的工具而发明出来的,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就是轿车。尽管后来载货汽车迅速发展以来,但轿车工业在汽车工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并起着主导作用。全世界汽车产量中轿车产量约占3/4。1950年世界汽车产量1058万辆,其中轿车为817万辆,占77.3%;1960年相应的数字为1649万辆,1284万辆,占77.9%;1970年为2927万辆,2275万辆,占77.7%;1980年为3850万辆,2857万辆,占74.2%;1985年为4503万辆,3291万辆,占73.1%。从一些国家汽车工业的发展历史看,有的起初轿车的比重不大,但在汽车工业发展起来以后,轿车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美国轿车产量占汽车总产量之比,1960年是84.8%,1970年是79.1%,1980年是79.6%;日本相应的数字为37.1%,60.1%,63.1%;联邦德国相应的数字为88.4%,91.8%,90.8%;法国相应的数字为85.8%,89.4%,87%;英国相应的数字为74.7%,78.2%,70.4%;苏联相应的数字为26.5%,39.8%,60.5%。

从世界汽车保有量看,轿车约占3/4左右。1950年世界汽车保有量为6897万辆,其中轿车保有量为5116万辆,轿车占74.2%。1960年汽车和轿车的保有量分别为12716万辆和9872万辆,轿车占77.6%。1970年汽车和轿车的保有量分别为24476万辆和19251万辆,轿车占78.7%。1980年汽车和轿车的保有量分别为41318万辆和32183万辆,轿车占77.9%。1984年汽车和轿车的保有量分别为47001万辆和36141万辆,轿车占76.9%。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趋势看,世界汽车产量中轿车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汽车保有量中轿车的比重则是增加的。

汽车工业在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很多是由轿车生产承担的。由于轿车是交通工具,又是耐用消费品,人们要求它安全可



靠,价格便宜,使用经济。轿车普及以后,就同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个人发生紧密的关系,消费者对轿车的可靠性、经济性、安全性和其他性能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促使轿车工业开发和和使用先进技术。加上轿车工业竞争激烈,企业只有应用先进技术才能在竞争中获胜,这就成为加快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汽车工业中应用先进技术往往先从轿车生产开始。例如,50年代利用电子技术,70年代利用微型计算机,轿车工业都是走在前列的。一些新材料也是轿车生产采用得最早最多。有人预测,2000年轿车将使用整车重量25%的铝合金,8%的镁合金,25%的塑料,22%的高强度低合金,普通材料制成的零件将只占总量的20%,油耗将降到3升/百公里,比现在排量250毫升的双轮摩托车还省油,最高车速可达200公里/小时。专家认为,轿车的水平代表着汽车的最高水平,轿车工业的水平代表着汽车工业的最高水平。轿车工业在技术进步中起着主导作用。

在汽车工业中,轿车工业的经济效益也是较高的。据有人调查,在所有机械产品中,汽车是附加价值最高的产品,大约相当于一般机械产品的1.3—1.6倍,但是如果把轿车工业除外,汽车工业在附加价值上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所以重视轿车工业,最主要的是由于轿车工业经济效益高。我国轿车工业很落后,产量很低,但轿车生产的经济效益也相当高。如上海轿车厂的经济效益就大大超过国内汽车同行的水平。1984年上海轿车厂的劳动生产率为全国汽车工业平均水平的2.7倍,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2.1倍。上海轿车厂人均实现利税1.8万元,全国汽车工业平均为0.35万元,第二汽车制造厂为0.73万元,上海轿车厂为全国汽车工业平均的5.2倍,为第二汽车制造厂的2.4倍。上海轿车厂工资利润率为1468%,全国汽车工业平均为398%,第二汽车制造厂为445%,上海轿车厂分别为它们的3.7倍和3.3倍。

把轿车看成单纯的消费品是片面的。轿车作为载人的交通工



具,人们把它称为耐用消费品,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轿车不仅是消费品,它的作用也不仅仅在消费上,它对生产流通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轿车比一般汽车波及范围更广,波及效果更大,更适合于大批量生产。事实表明,轿车工业的发展能够促进有关产业部门的良性循环,即生产内部的良性循环。轿车工业的发展带来交通运输的发展,交通运输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条件,是发展商品流通的重要条件。所以,轿车工业的发展也能够促进生产和流通间的良性循环。轿车的购置费较高,是实现购置力的重要商品。美国与轿车有关的个人消费品,约占全国零售额的 25%。所以,轿车工业的发展也能够促进需求和供给、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此外,轿车生产对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对促进企业经营管理进步的作用,也都不可忽视。总之,不能把轿车看成单纯的消费品,而应重视它在社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把轿车看成奢侈品更不符合当前实际情况。在轿车工业不发达、轿车使用不普及的时期,只有少数人购买和乘坐轿车。在有些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里,轿车只有权力很大的官员和财富很多的富翁使用,成了权力、地位、财产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把轿车看成奢侈品并非没有根据。但是,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情况看,轿车早已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需品了。美国 1980 年每千人拥有轿车 537.4 辆,平均每两个人有 1 辆轿车。联邦德国 1981 年每千人拥有轿车 383.7 辆,法国同年每千人拥有轿车 365.7 辆,这两个国家平均不到 3 人有 1 辆轿车。英国 1981 年每千人拥有轿车 273.7 辆,大约每 4 个人有 1 辆轿车。日本 1981 年每千人拥有轿车 208 辆,大约每 5 个人有 1 辆轿车。在这些国家里,轿车已经普遍进入家庭消费,每个家庭平均有 1 辆甚至 1 辆以上的汽车,居民大都有了自己的汽车。这时,就决不能再说轿车是奢侈品了。事实上,轿车普遍进入家庭消费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经济发展



使大家需要轿车；另一方面，收入增加又使大家买得起轿车。这样，轿车的使用就会日渐普及，轿车就会成为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成为工作生活的必需之物。如果再把轿车看成奢侈品，就不仅违背事实，而且有碍于汽车工业的发展。

把轿车的普及看成资本主义文化也不妥当。轿车确实先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普及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也在轿车的使用和普及上打上了烙印。但是，决不能把普遍使用轿车看成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明显的理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而且必然会普及轿车的使用。例如，苏联过去不主张轿车进入家庭，但从60年代中期开始大力发展轿车生产，每年已生产140多万辆轿车，由于购置的人多，还是供不应求。1984年波兰生产汽车33.4万辆，其中轿车27.9万辆，占83%；南斯拉夫生产汽车27.2万辆，其中轿车23.6万辆，占86%；捷克生产汽车22.7万辆，其中轿车18万辆，占79%；民主德国生产汽车22万辆，其中轿车18万辆，占83%；罗马尼亚生产汽车17.2万辆，其中轿车10.7万辆，占62%。另据统计，按人均汽车保有量计，苏联是14人1辆，波兰是10人1辆，南斯拉夫是7.5人1辆，捷克是5.2人1辆，民主德国是5人1辆，匈牙利是7.3人1辆，保加利亚是12人1辆。虽然这里的人均汽车保有量不只是轿车，但从中也可以看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普及轿车的过程中。由此可见，不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都有普及轿车的趋势。深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轿车的普及是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所以，把轿车的普及和资本主义制度硬联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相反，资本主义制度给轿车使用带来的一些消极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普及轿车时要注意防止和克服，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汽车工业成为支柱产业的条件

汽车工业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支柱产业的，它成为支柱产业需要一定的条件。有的同志认为，发展汽车工业不需要什么条件，只要国家的支持和鼓励就行了。这种说法不够全面。汽车工业的发展确实需要国家的支持和鼓舞，但这不是充分条件，特别是，汽车工业成为支柱产业是必须具备必要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

事实上，汽车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才发明出来的。1876年，德国人奥托发明了汽油发动机，才使现代汽车的制造成为可能，而汽油发动机的发明又是由于煤气业的发展。18世纪煤气业在欧洲已有一定的发展，所以有的学者说，今天在技术博物馆中展出的古老汽车及其零件，其历史可上溯到18世纪。在汽油发动机发明以后，1885年德国人本茨制成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戴姆勒将汽油发动机装在马车底垫上，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橡胶工业在汽车的发明和改进中也起了作用。1839年，美国人古德伊尔把巴西的天然橡胶与硫磺混合起来发明了橡胶的硫化法，以后才制成轮胎。19世纪末轮胎开始应用于汽车。1898年发明的低压电磁点火装置，1902年发明的高压电磁点火装置，解决了汽车上发动机的点火问题。此后又发明和改进了火花塞、起动机、车头灯、喇叭和加强器材等，这些都对汽车制造技术的成熟作出了贡献。

一般来说，汽车工业成为支柱产业需要具备以下这些方面的条件：

1. 相关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首先要有比较发达的钢铁工业。汽车制造中由钢铁制造的零件约占总重量的70%，其中30%是冷轧薄钢板。塑料工业也要相应发展。1985年每辆小轿车使用的塑



料已超过 50 公斤,随着汽车电子化的发展,塑料用量会越来越大。其他如有色金属工业、玻璃工业、橡胶工业、油漆工业等也应满足汽车生产的要求。

2. 相关机械设备工业的发展。大批量的汽车生产需要大量新的机械加工设备、模具和电子设备,这些都要由机械工业提供。

3. 石油工业的发展。一辆小轿车每年大约需要汽油 1 吨,轻型载重车大约需要汽油 2 吨多,中型载重车大约需要汽油 4 吨或柴油 3 吨,重型载重车大约需要柴油 7 吨。汽车的普及使用要求石油工业有相应的发展,保证油料供应。

4. 发达完善的公路网和有关设施。没有发达完善的公路网,使用汽车不方便,也会影响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的普及使用还要求加油站、停车站、汽车修理厂等相应的发展。

5. 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轿车的国内市场受人口多少和人均收入水平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国外市场则有一个扩大出口、增强产品竞争力的问题。

6. 投资。发展汽车工业需要大量的投资。1953—1977 年的 24 年中,日本汽车工业的设备投资总额达 47 293 亿日元,其中前 6 年(1953—1959 年)平均每年 106 亿日元,60 年代(1960—1969 年)平均每年 1 315 亿日元,70 年代前 8 年(1970—1977 年)平均每年 4 174 亿日元。

7. 技术管理人才。汽车工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只有具备了各种必要的人才,才能解决作为支柱产业的汽车工业的技术问题、管理问题以及销售问题。

以上这些是发展汽车工业需要具备的客观条件。当然不能说只有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发展汽车工业,有些条件是要在发展汽车工业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而且一个国家并不需要自己生产汽车的全部零部件和有关原材料。这里要善于利用国际分工



和国际贸易。有些国家汽车燃油也靠外国供应。开拓国外市场、利用外国投资引进外国技术对发展汽车工业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不过,作为一个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大国,要使汽车工业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最终是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原材料、零部件、资金、技术和人才来发展汽车工业的。

汽车工业成为支柱产业,除了要有客观条件,还要有主观条件。所谓主观条件,是指对汽车工业的地位作用有正确的认识,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上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从一些国家的历史来看,如何看待汽车工业和采取什么政策措施,对汽车工业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日本按客观条件来说发展汽车工业并不有利。它国土狭窄,资源贫乏。1955年钢产量为940万吨,原油产量31万吨,汽车产量6万辆。但就在50年代不利的条件下,日本通产省的官员们认为应该把汽车工业作为战略产业予以扶植,使之迅速发展。虽然当时也有人鉴于欧美国家生产的汽车已占领了世界市场,认为日本不宜再发展汽车工业,但日本政府还是采取了通产省官员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扶植促进汽车工业的政策,终于使日本汽车工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8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大国。这是主观上重视并采取正确政策促进汽车工业发展的很好例证。

又如,苏联在客观条件上是有发展汽车工业的有利条件的。它土地辽阔,资源丰富。1955年苏联钢产量为4527万吨,原油产量为7079万吨,汽车产量为44万辆,和日本相比,在很多方面苏联发展汽车工业条件优越。但是,传统观念重视铁路运输而忽视公路运输,尤其对小轿车存有偏见,认为小轿车只能供官员们使用,甚至把普及小轿车看成资本主义文明。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汽车工业不可能放在应有的地位上,也不可能采取正确的政策促进它迅速发展。这样,1960年苏联汽车产量(52万辆)就低于日本汽车产量(76万



辆),以后差距更加扩大,1965年苏联汽车产量为61万辆,日本为192万辆。6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重视汽车工业,1966年从意大利引进轿车技术,汽车工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苏联这一段历史是主观条件影响汽车工业发展的又一例证。

主观条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客观条件需要人去创造,去利用。发展汽车工业需要多方面的客观条件,任何国家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具备有利条件,而需要人们设法创造必要的条件,并善于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的条件。为了做到这一点,有必要认真总结各国发展汽车工业的历史,吸取其经验教训。例如,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是在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机械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汽车工业及其零部件工业的,不需要专门扶植零部件工业,而是机械工业自然发展形成了汽车工业。而日本则是在一般机械工业尤其是制造汽车零部件的机械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发展汽车工业的,因此日本采取的是通过发展汽车工业,扶植和促进零部件工业,从而促进一般机械工业的发展。韩国发展汽车工业时工业基础更为薄弱,因此它靠进口汽车零部件进行组装起步,把汽车工业迅速扶植为出口工业,在出口急剧增长中,研究设计自己的车型,并扶植零部件生产和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体系。各个国家解决市场、资金、技术的途径也有所不同。国内外学者曾对世界各国汽车工业的主要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我们要深化这种研究,促进我国汽车工业的健康发展,加快汽车工业成为支柱产业的过程。

注释:

① H. N. 沙伊贝、H. G. 瓦特、H. V. 福克纳著:《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96页。

② 王垂仍编:《汽车工业、制造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第



83、71 页。

③ [德] 鲁道夫·吕贝尔特著,戴鸣钟译:《工业化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第 131—132 页。

(原载《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7 年第 9 期)



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坚持 “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

1988年10月邓小平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以后，他又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战略任务。当前中国正在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必须认真领会邓小平的思想，真正把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放在重要战略地位上，促进两个转变的顺利实现。

一、开发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意义

高新技术产业是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的，指的是随着新技术的应用而出现的新的产业部门。所以，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钢铁工业是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那次技术革命产生的高新技术产业，汽车工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那次技术革命产生的高新技术产业。现在我们说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指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



列新产业部门。相对于这些新技术、新产业而言,钢铁工业、汽车工业也被认为是传统产业了,尽管它们的技术也是在不断进步的。

人类的产业发展史表明,高新技术产业一般是在传统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否认传统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无疑是不正确的。但是,还要看到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更复杂的关系。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仅受传统产业的影响,而且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一些后进国家虽然传统产业没有发展到先进国家的水平,但是有可能利用先进国家科学技术的成果,使某些高新技术产业先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并利用新技术、新产业改造传统产业。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只有先发展传统产业才能建立高新技术产业,不能把发展传统产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截然地对立起来。

人类历史还表明,新的技术成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应用,总是要体现在产业中的,或则体现在传统产业的改造上,或则体现在新产业的建立上。而且,一般来说,新技术只有在建立新的产业以后,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例如,蒸汽机技术发明以后,形成了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等新产业,才改变了当时产业的面貌,实现了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又如,内燃机技术发明后,形成了汽车工业、飞机工业等新产业,才使产业结构发生又一次急剧的变化,改变了许多国家生产和生活的面貌。当前,我们面临着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也是由于信息技术等新技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一系列新的产业部门,它们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根据需求和可能,建立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重要战略任务。

(一)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需要

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条件是产业结构现代



化。现在中国产业结构还比较落后,这不仅表现在农业的比重和服务业比重小等方面,还表现在没有形成和发展必要的新的产业部门。高新技术产业占一定的比重是经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重要特征,也是产业结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们要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在这方面缩小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建立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非常必要的。

(二)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改造传统产业的需要

现在我们的传统产业不仅不发达,而且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也比较低。因此,我们必须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包括用新技术使传统产业跳过某些可以跳过的阶段,加速传统产业的现代化进程。为此,我们当然需要从国外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然而又不能只是依靠外国的新技术、新设备,而必须有计划地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使改造传统产业需要的新技术、新设备逐步立足于本国。

(三)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

当前,中国经济效益比较低,而提高经济效益需要从多方面努力,主要是要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技术水平。当代高新技术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它表明知识越来越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依靠高新技术,可以利用更多的知识来创造更多更好的产品,并减少产品中物质消耗的绝对量或相对量,降低成本,增加盈利。而只有在形成高新产业后,有关的高新技术才能得到充分地利用。

(四)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是在其他方面使高新技术对社会经济生活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需要

高新技术将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动,而新的产业的形成,能吸收新的就业人员。又如,高新技术将引起人类劳动方式的重大变化。以往的技术革命使人类能够利用机器代替体力劳动,这次新的技术革命则使人类能够利用机器代替部分脑力劳动,从而有可能使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而只有这些高新技术形成了强大的产业,才



有可能较大规模地实现这种劳动方式的转变。再如,高新技术提供了许多新产品,如电视机、录音机等,从而有可能大大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应该指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邓小平曾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不够格”指的是中国生产力极其落后。因此他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首先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能够迅速提高生产力,使中国搞的社会主义可以逐步成为“够格的”社会主义。“够格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产品非常丰富,劳动生产率很高,人民都可以过比较富裕幸福的生活。显然,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够格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新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建立在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更要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机遇,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人民才能更加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而当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生产水平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时,社会主义制度就真正巩固了,“和平演变”就不易得逞了。

二、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

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需要认真研究和掌握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特点。高新技术产业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一) 这是一种开发性的工作,带有较大的风险性

从事高新技术的单位和个人就要有创新精神,要有冒险精神。



有的经济学家用创新精神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籍经济学家熊彼得的经济发展理论就以“创新理论”为核心。美国企业联合会会长莱维特和主席艾伯丁花了两年时间研究怎样才能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结论是：企业家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有远见卓识、冲天干劲和无限耐心。他们说：成功的企业家富有创造力的火花，独立的行动和大胆追求的欲望。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激励、发扬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培养大批社会主义企业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二) 一项高新技术从研究到应用要经过很多阶段和较长时间，因而取得收益也要较长时间

从一种新思想的形成到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一般要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生产技术研究等阶段。当然，不是每个单位都要进行所有阶段的研究，但既然是研究，它比原先的生产就要多花时间。能够鼓励生产发展的制度和措施，未必一定能鼓励新技术的利用和开发。

(三) 高新技术一般是知识密集型技术，依赖于知识，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当然，一般生产和一般技术改造都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但高新技术更是离不开知识和知识分子。如何培养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也是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提出来的新课题。此外，高新技术的开发一般都需要较多的资金，而且这些资金未必一定带来理想的收益，亦即属于风险资金。如何保证开发高新技术的单位较为容易地筹集必要的资金，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高新技术的开发利用还要求及时得到信息(包括市场信息)和作出决策，即决定进行某项高新技术的开发利用工作，这就决定了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利用的单位比一般生产单位要有更大的决策权。

(四) 高新技术的成果不仅使开发者受益，而且使利用这项成



果的所有单位受益,使整个社会受益

发明创造一种节能机械,就有利于所有用户和整个社会。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开发高新技术的单位往往受益较少甚至没有受益,而其他单位和社会则受益较多。也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高新技术成果虽然有益于社会,却不一定对用户有利。这样,就可能影响开发者或使用者的积极性,妨碍高新技术的开发利用。因此,高新技术成果的收益分配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五) 高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涉及很多部门、很多单位

当然,生产也会涉及很多部门、很多单位,但毕竟要少一些或简单一些。例如,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离不开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所以,为了发展高新技术新产业,还必须处理好企业和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关系。

高新技术产业还会有其他特点。这些特点既要求企业具有开发高新技术的强大动力和充分的自主权,又要求科研机关和大专院校充分发挥研究开发高新技术的作用。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现代科学技术要求大量投资和大量专门人才,同时具有很高的社会性和极为复杂的分工协作关系,这就要求加强政府的领导和参与。如何做到既充分发挥政府的领导和参与作用,又充分发挥企业和研究单位的主动性和自主权,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管理工作的两个基本要求。

企业在利用推广高新技术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改革中必须使企业对利用高新技术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足够的自主权。企业的作用不只是利用推广高新技术,在开发甚至研究高新技术方面,企业的作用也不能低估。美国的大型企业一般有一个或几个研究中心,负责开发高新技术和新产品。小企业也通过各种途径进行高新技术的开发研究工作。这是它们技术和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已经明确了要逐步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这是十分必要



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企业在发展高新技术中的作用。

我们尤其要重视国有大企业在开发利用新技术中的作用。中国一些国有大企业具有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有利条件,我们应该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和潜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优势和主导作用。对于中小企业,同样应该发挥它们开发利用高新技术的作用。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在信息时代,绝大部分革新成果出自小企业”,“小企业规模小,毋需投很多资本就可进行试验,因此不必担心造成巨大损失,一旦试验成功,即可转让给大企业”。因此,我们也不能低估中小企业利用开发高新技术的潜力。

为了发展高新技术,必须十分重视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科技力量及其作用。要通过改革科研管理体制、教育管理体制和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扩大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自主权,充分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并使它们同企业紧密结合,促进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很多国家在开发电子计算机等高新技术的过程中,很注意政府、科研单位、企业和大学力量的结合。日本曾实行所谓“官民学合作体制”,就是在国家资助下,由科研机关牵头,组织企业的科技力量和大学教师进行合作;大学的重点是新技术的基础研究,研究单位主要搞应用研究,企业则把重点放在开发新产品上。中国有些地区和部门也创造了类似的经验,值得研究和总结。

这里要谈一谈正确处理引进外国技术和本国研究开发生产的关系问题。各国间的科学技术交流是生产力发展的普遍规律,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步伐的有利条件和必要措施。对于发展新技术和新产业来说,引进技术更加必要。这样做,可以争取时间,加快应用,节省投资,提高效益。由于国际竞争非常激烈,技术进步十分迅速,因此,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包括中外合资经营、外商独资经营、补偿贸易、合作生产、举办经



济特区、举办新技术开发区以及开放沿海城市等,加快对外资的利用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在重视引进的同时,也要十分重视国内的研究开发工作,这不仅是发展本国科学技术的需要,也是消化吸收外国技术的需要。引进技术同国内的研究开发生产是存在一定矛盾的。要处理好这个矛盾,协调它们的关系,并对国内的研究开发生产采取有限度的适当的保护措施。所谓有限度的保护,一是要有保护,二是并非无限的保护,目的在于扶植国内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生产事业,提高其竞争能力。

三、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

(一) 中国建设新兴产业应该采取的方针

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要求在所有新技术、新产业方面迅速赶上并超过经济发达国家,建立中国完整的新技术、新产业体系,这可以称之为“全面赶超、自成体系”的方针;另一种是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选择有限目标,集中力量支持重点,有重点地开发新技术,建设新产业,这可以称之为“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前一种方针单纯从主观愿望出发,脱离实际,是错误的;后一种方针既考虑需要,又考虑可能,是正确的方针。

1. 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中出现的不是一两种新技术而是一群新技术,不是一两个新产业部门而是一群新产业部门。显然,现在我们不可能在所有这些方面齐头并进。

2. 在新技术群和新产业群内部,也有着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其中某一或某些新技术和新产业会成为主导(或关键)部门。我们必须首先抓住这样的新技术和新产业,以此来带动或促进其他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3. 建设新产业也应考虑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防建设的



需要。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经济包括传统产业还不发达，因此要根据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需要，根据改造和发展传统产业的需要，来确定新产业的重点部门。我们也要重视巩固国防的需要。

4. 建设新产业还要考虑具备的条件，包括财力、物力、技术水平、科研力量、原有基础、市场需要以及引进先进技术和外资的机会，等等。要考虑形成新产业的可能性和前景，不仅要国内考虑，而且要从国际上考虑，选择的重点应该是能够尽快掌握国际上已有的和我们在近期、中期有可能应用的成果。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在建设新产业上也要有重点，做到扬长避短，利用优势，创造优势，发挥优势。

我们过去在开发新技术、新产业上有过“全面赶超”、“自成体系”的教训，例如曾提出“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以及当年“超声波化”、“管道化”等不切实际的口号。这种教训现在仍要认真记取。有的同志说，那时是政治路线问题，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似乎这些教训没有实际意义了。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诚然，那时的错误主要是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现在我们已经克服了这种错误，端正了指导思想。但是，应该看到，即使在指导思想正确、政治路线正确的情况下，在开发新技术、新产业上仍有可能出现要求过高过急的偏向。由于人们要求改变贫困面貌心切，加上缺少经验和对情况了解不够，就有可能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特别是我们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更助长一些人在经济建设包括开发新产业中不切实际地贪多求快，好大喜功。例如，一讨论项目，就什么都想上，从局部看也不无理由，从全局看则很不合理。因此，我们既要反对对开发新技术、新产业持消极态度，也要注意防止重犯“无限目标”、“一哄而上”等错误。

（二）中国建设新产业的重点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



我们认为,应当以发展信息产业为重点,同时把生物工程和航天技术、核技术、海洋工程放在重要地位。正如党中央关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所指出的:“要把握世界高技术发展的趋势,重点开发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等方面的高技术,在一些重要领域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把信息产业特别是半导体工业和微电子计算机生产作为重点。信息技术是当代高新技术中应用最广泛,效益最显著的领域。尤其是微电子技术将对人类社会产生全面的极其重大的影响。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技术革新是节约资金、节约劳动力的革新,为自动化技术的普及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中国利用微电子技术已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把以微电子为中心的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作为重点进行开发和建设,尽快形成健全的集成电路工业,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建立软件产业,研究和生产电子计算机,特别是切切实实地把微型计算机作为重点加以发展。还要加快现代通信网的建设,开发光导纤维通信技术。

2. 把生物工程放在重要地位。生物工程又称生物技术或生物工艺,是70年代初在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技术领域。人们利用生物工程,可以在医药、食品、化工、能源、农业和环境保护领域中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生物工程特别对农业生产有重要影响,我们现在还是个农业大国,必须重视生物工程。我们在生物工程方面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要加强基础研究,有选择地进行技术开发。从长远看,应当把农业方面的应用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3. 大力发展航天技术、核技术和海洋工程。自从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来,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很快从探索试验进入实用和商品化阶段,取得了很大的效益。现在,可从航天技术直接受益的领域有卫星地面站、计算机终端、广播电视、资源考察、



气象预报、大地测量、地图绘制、导航定位等。可以间接受益的领域还有新材料、特殊工艺、能源新技术、真空低温技术、温控技术、遥测遥感技术等。因此，在国民经济中应用航天技术有广泛的前景。现在中国航天技术已有一定基础，当前要重点发展通信卫星、广播卫星，相应发展国土普查和资源卫星、气象卫星。我们还要重视核能的开发利用，这是改善中国能源结构，特别是解决华东、广东、辽宁等地区能源紧缺问题的最现实而有效的途径。同时，要重视同位素和核技术在各方面的应用，它投资少，效益大，具有广阔的前景。中国海域辽阔，资源丰富，因此也要重视海洋开发。同时，还要重视新材料的开发利用。

开发新技术、新产业要突出重点，这决不是说对其他非重点的新技术、新产业可以不予重视。我们应该处理好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处理好研究开发体制，把国家、企业、科研机关和大专院校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包括允许集体和个人经营新兴技术的小企业。这样，在开发新技术、新产业的过程中，就完全可能做到既抓好重点，又兼顾一般，使它们相互促进，各得其所，共同发展。

四、高新技术产业要积极为改造传统产业服务

我们必须积极应用新技术来改造和发展传统产业，尤其要应用新技术来促进农业、能源、交通、通信、科学、教育等战略重点的发展。新技术为传统产业服务，不仅是改造和发展传统产业的需要，也是高新技术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高新技术产业一般都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了比较发达的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才能较为顺利地形成和发展。所谓传统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包括多方面的含义。例如，开发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传统产



业提供劳动手段和原材料。以集成电路的生产来说,就需要高质量的单晶、超纯的化学试剂、超纯水、超纯气体、精密机械设备和高精度自动化测试仪器,这些材料和设备、仪器的获得,涉及到冶金、化工、机械、仪表等不少传统工业部门。新产业赖以形成的科学研究工作,也需要传统工业提供各种实验手段。又如,新产业要以传统产业为重要市场甚至主要市场。高新技术产业只有在产品有广阔市场的情况下,才能有强大的发展动力和压力,而在国民经济以传统产业为主体时,新产业主要是为传统产业提供产品或服务,传统产业就成了它的重要市场。再如,开发新产业还要传统产业提供资金。开发新技术、新产业是需要大量资金的,在新产业有了相当发展后,自己也能够积累资金,但在开始阶段往往要依靠传统产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不足,限制新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产业不够发达。此外,就技术发展的规律来看,新技术的形成固然有突破的因素,但是同原有技术也有继承的关系,新技术一般是以原有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我们从许多国家的历史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离开为传统产业服务,新技术、新产业一般是难以顺利发展起来的。

(一) 在中国当前条件下,更加需要重视新技术为传统产业服务的问题

1. 中国的传统产业一般都不发达,需要大力发展。开发和利用新技术将为传统产业的发展提供极有利的条件。中国按人口平均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工业品产量很多还远不能充分满足发展社会经济和提高生活的需要。党中央把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部门作为战略重点,要求大力发展。利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为这些传统产业服务,既是当务之急,也是大有可为的。现在流行所谓“夕阳工业”、“朝阳工业”的说法,把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部门称为“夕阳工业”。这种说法需要分析。在美国、日本和西欧一些



国家，钢铁、汽车等在国内市场上日趋饱和，加上国际市场的变化，使得有关的产业发展缓慢，甚至趋于衰落。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产业是“夕阳工业”，可能不无道理。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现在的情况决非如此。在中国，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等传统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决不会是“夕阳工业”，它们和微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一样是“朝阳工业”。有的同志把重视传统工业的战略一概称之为“夕阳工业战略”，这种看法也是欠妥的。

2. 中国的传统产业急需进行技术改造。利用新技术可以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步伐，跳越某些可以跳过的阶段。中国农业、工业和其他产业的生产技术都比较落后。由于长期忽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业中多数行业的装备大体上是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冶金、石油、化工、电力、机械、纺织、轻工等部门多数设备陈旧，性能差，效率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在中国正在加快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怎样进行技术改造呢？是亦步亦趋地照人家走过的路从头走起呢，还是跨越一些可以跨越的阶段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呢？显然，我们要走后一条路。我们利用世界新技术革命成果，建立某些最新产业部门，这是跨越一些可以跨越的阶段。与此同时，我们要在传统产业中加快利用新技术，这也是跨越一些可以跨越的阶段。当然，我们不能违背经济和技术发展规律，任意超越那些必须经过而不能超越的阶段，但是却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世界上已经成熟的科技成果，跨过一些可以跨过的阶段。例如，用电子技术改造老设备，可以使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走出一条新路。在铁路运行调度方面采用计算机，也可以大大提高其综合能力和经济效益。

3. 我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以传统产业为主要市场。中国新产业当然需要重视开拓国际市场，但是从当前国际市场的情况和我国的条件来看，中国新工业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今后长时期内传统



产业仍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因此中国新产业一般要以传统产业为主要市场。有的同志举中国电子工业以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为主要市场为例,反对传统产业是新兴产业的主要市场的观点。我们认为,对某些新产业的一定发展阶段来说,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作为市场是极为重要的和不能忽视的,但据此不能否认传统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甚至主要)市场这个一般规律。事实上,过去中国电子工业以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为主要市场这种状况,正足以说明它还比较落后,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发达的产业。中国工业、交通、商业以及农业等部门,在生产的过程控制和经济管理等方面,对于电子产品的需要是很大的,电子工业怎么可以忽视这种需要,怎么可以不以传统产业为主要市场呢?

4. 新技术要为传统产业服务,也是由于这样做才能加强新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新产业形成和发展的一个严重困难是传统工业落后。以集成电路生产为例,正如有的同志所说,集成电路的设备和材料是支持集成电路产业的“两翼”,集成电路设备的发展有赖于传统的光学、真空、精密机械技术和产业的支持,集成电路材料的发展有赖于传统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材料技术等产业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为了使自己有较好的物质技术基础,也要加强为传统产业服务。

(二) 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范围是极其广阔的

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比较值得重视的有以下这些方面:① 用微电子技术改造老机床,这是推广微电子技术和微型电子计算机,发展机械—电子一体化产品的重要内容。② 研究和开发数控机床、柔性生产线,这是发展机械—电子一体化产品的另一项重要内容。③ 在一些行业中利用机器人。④ 发展智能仪表,加快仪器仪表的更新换代。⑤ 在汽车上应用微处理机。⑥ 发展机械电子结合的家用电器、日用机电产品。⑦ 利用高新技术,革新传统工艺。



⑧ 开发和运用新型材料,促进产品更新换代。⑨ 在农业中利用新技术,例如把常规技术同现代生物技术结合起来,进行生物治虫和新型农药的开发。⑩ 在生产过程控制、工程设计、企业管理等方面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新技术,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个传统产业为了加快自己的改造和发展,除了重视电子等新技术的应用外,还要十分重视本部门的新技术。当代世界技术革命的成果决不是仅仅表现在上述新兴技术上。传统产业部门本身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表现。在这方面,中国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例如,在国外,钢铁工业在发展连铸、炉外精炼新技术;建材工业在发展水泥窑外分解技术、平板玻璃浮法工艺技术;铁路运输业在改革牵引动力、发展重载列车运输、提高行车密度,等等。其中,有些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等新技术有关,有些则是传统技术的发展,推广这些技术也会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我们一定要把高新技术和常规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

(原载马洪主编:《跨入新世纪必由之路: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研究》,江苏科技出版社,1998年)



美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的经验和问题

1988年9、10月间,我和几位同志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州访问,主要是考察美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情况。访问回国后,又查阅了有关资料。现将收集到的材料,归纳成几个问题,整理如下。

美国高技术产业的现状和趋势

我们在美国会见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大学教授,都谈到美国发展高技术面临着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剧烈的竞争,尤其是日本的竞争。在奥斯汀和旧金山,我们参观了好几家高技术产业的工厂和研究单位,接待人员告诉我们,日本在半导体和计算机等方面是他们的严重威胁,表现出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

他们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不是没有根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长期在高技术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而这种领先地位目前已受到严重挑战。美国的高技术贸易一直是顺差,而1986年首次出现逆差。美国计算机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1980年是47.1%,1986年下降为30.9%,日本的份额则由1980年的3.8%增加为1986年的19.7%。美国半导体产品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1980年是22.5%,1986年下降为18.3%,日本的份额则由1980年的11.3%



增加为 1986 年的 21.6%，日本已超过了美国。

1987 年，由美国前空军参谋长艾伦等 21 位专家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在高新技术领域，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已成为美国的激烈的竞争者。一些技术领域的具体竞争情况是：

1. 半导体。美国在半导体技术的几个重要领域已经丧失优势。日本占据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高密度存储器世界市场一半以上，在低成本、高性能的 1 000 K 和 4 000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的技术方面，日本也超过了美国。只有日本公司能大批量生产所有型号芯片所需要的优质大容凝石英玻璃。在半导体生产设备的技术方面，日美已经旗鼓相当。

2. 光纤。日本在光源技术方面明显领先，在光纤应用方面也是领先的，而在其他器件技术方面也在与美国角逐。

3. 空间。美国相对于欧洲国家的领先程度在下降。欧洲航天局已掌握了民用非载人航天发射能力，从而结束了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垄断地位。在美国航天飞机失事前，法国已能从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夺走生意，美国对卫星生产的长期统治能力也在削弱。

4. 飞机。美国工业长期统治世界民用飞机市场。70 年代中期，美国夺走世界航空公司定货的 95%。美国的航空研究开发经费从 1975 年起开始下降，而欧洲逐年增加，研制成功了“空中公共汽车”。1980—1985 年期间，“空中公共汽车”夺走了世界市场的 17%。

5. 计算机。虽然美国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生产方面仍然领先，但日本在处理器和磁盘等方面已赶上和超过了美国。日本正在开发第五代计算机系统，企图在这方面超过美国。

为了在国际竞争中争夺主导权，美国已经确定了高技术研究开发的重点：美国商务部 1987 年 6 月 9 日宣布，它经过历时一年的研



究,确定了17项新开发的技术。这些技术的商品化将决定未来美国经济的兴旺发达。其中包括:

1. 聚合物复合材料。这些材料是高强度的、纤维增强的塑料树脂。它们由于具有较高的强度、重量比及挠性,能用于航空航天及工业建筑业。

2. 陶瓷。根据最近超导研究上取得的进展,新型电子陶瓷可能有助于大大提高世界上电力利用的效率。

3. 遗传工程。经过改良的药物可能减少不治之症的数量。新的作物杀虫剂和动物用添加剂可能极大地改善食品生产和加工。

4. 光电子学。使用光纤和光波处理可能改善通讯和计算机系统的速度、体积、容量和安全可靠性。

5. 先进的微电子设备。几种新一代半导体芯片可能用来加快并扩大电子系统、信息处理和发电。

6. 制造自动化。在制造过程中使用装备计算机的灵活系统可能加强所有的生产操作。

7. 计算机设备。超级计算机和并行处理机的研制可导致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计算。

此外,还有改进金属的磁特性,采用毫米波技术扩大电信容量,把计算机更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办公系统及商业服务,改善对生物化学处理的控制,等等。

报告说:美国开发新技术的一个重要障碍是高利率和征税法结构,这些规定使美国公司的资本成本大约是他们日本对手的两倍。解决办法是减少联邦政府预算赤字和增加鼓励存款的税收刺激。这样做将增加美国的存款额,既可降低利率,又可增加新的高风险商品化生产可以利用的资金。

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如下建议:

1. 政府和工业部门在分享技术进步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更



大力地共同把这些技术进步从研究开发阶段推入制造阶段。

2. 商业学校使课程现代化,训练学生掌握全面制造过程,从研究、开发到销售和维修服务。

3. 工业公司在把技术和其他智力财产转让给外国公司时持谨慎态度,美国的贸易法必须加强对智力财产如商标和专利的保护。

4. 美国公司在研制出口产品过程中更充分地考虑外国的爱好习惯和销售制度。

5. 减少和简化法规,使之对工业部门采用新技术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

6. 不再管制那些不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美国技术。

尽管很多美国人有危机感和紧迫感,但他们对于发展高技术的前景还是有信心的。美国《幸福》杂志 1988 年 10 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2000 年的科学技术——纪年上的黄金盛世》。文章说:仅仅在过去 12 年中,个人计算机已改变了办公室的面貌;盒式录像机和激光唱片已使家庭娱乐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生物技术已给人类带来了基因工程疫苗和许多其他好处。今后 12 年世界将进入 2000 年,这 12 年中我们将会看到至少 10 倍于过去 12 年中所看到的进展。作者预测 2000 年时将出现下列情况:

1. 在你周围的将是外形和作用都不像计算机的计算机——衬衫口袋和笔记本式的装置,它们能回答书写和口述的问题和指令,甚至可以对手势作出反应。

2. 在公司的研究中心,功能比当今的超级计算机大 1 000 倍的超级计算机将计算分子中电子的相互作用,以制造出以前从未有过的材料。

3. 你出外旅行时可以携带一本电子书,这书一打开,便在两个面对的屏幕上显示出原文。这本书的存储器将会有多达 200 部小说或非小说的内容,只要写出你想阅读的书名,它便会立即显示



出来。

4. 医生让你走过一架诊断机,便可检查你的心脏。

文章认为,现在与过去不同,人类已处于“洞察时代”的开端时期,这是一个了解事物如何运转和如何使其运转得更如人意的新时代。计算机正在被人们从一种运算巨量数字的机器变成一种洞察和发现事物内情的机器,它将成为一种甚至比显微镜或望远镜更具革命性的手段,能够窥视未来。基于以上认识,有人强调应该依据技术飞速进步的趋势调整经济结构。

美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经验

一、联邦政府重视和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发达,首先是同联邦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分不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美国国防部资助了许多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成果首先用于武器交流。而到了70年代末期,许多军民两用高技术找到军事用途以前就已在商业上应用了。

以计算机工业为例,美国计算机工业发展初期,联邦政府为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所有方面都提供了资金。当这项技术发展以后,私人提供的资金大大加强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风险较大和商业性最少的基础研究项目中,政府的资金支持仍起着重要作用。

1950年左右,美国一些计算机研究计划得到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数额在1500—2000万美元之间,而1950年由私人提供的工业计算机研究发展工作的资金总共不到500万美元,约占计算机研究发展经费总额的20—25%。1954年,计算机研究活动由公司提供的资金增加了两倍,每年达1500万美元。但直到50年代后几年,私人工业研究活动的经费与联邦政府开支相比,仍然相形见绌。60年代,计算机技术日益商品化,但是政府提供的资金仍有重大意



义。1965年,工业计算机研究发展工作开支总额中联邦政府资助的部分减少到大约占1/3,60年代和70年代继续减少,1975年占21%,1979年减少到8%,80年代又开始增加。

即使到70年代,联邦政府在计算机研究方面的作用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工业的研究发展工作中研究所占比例极少,力量主要集中在发展上。如果不考虑发展资金,政府在计算机研究工作中的作用仍不可低估。据《以计算机为目标》(1987年出版)估计,在过去十年,美国整个计算机研究工作大约有40%是由联邦政府筹措经费的,而在基础研究中,联邦政府的开支大概占60%到75%。政府的研究开支主要集中在大学、学院及政府自己的实验室内。

就同计算机有关的全部研究发展资金而言,联邦政府的开支50年代大约为75%,60年代中期为50%,70年代后期为15%,80年代中期又增加到20%以上。由于私人占有基础研究的成果极其困难,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仍处于显著地位。

政府采购是影响美国计算机工业的另一重要因素。50年代初,政府是计算机工业的大部分市场。1953年,联邦各机构使用了普通计算机存货的54%。70年代政府使用的普通计算机所占比例减少到5%左右,这种减少不是由于政府使用计算机减少了,而是商业计算机销售量大大增长了。在工艺水平最高的高性能计算机方面,政府采购的数量仍然是最多的。

国家的立法对计算机工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以计算机为目标》一书的作者认为,1984年国会通过的联合研究与发展法,鼓励公司从事合作性研究。这是近年来影响高技术产业市场结构的最重要的立法。仅从1985年看,已有14个联合研究企业请求司法部批准,工业—大学联合研究中心的数目也在增加。

在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商品化方面,美国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这同政府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美国联邦政府主要是通过国



立卫生研究院、美国科学基金会、农业部、能源部和国防部大力资助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这是美国能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联邦政府 1983 年投资生物技术研究的经费约 16 亿元,1984 年为 18 亿元,1986 年增至约 21 亿元。此外,美国政府还在创造有利于加快生物技术商品化的条件,以加快生物技术商品化的步伐。

二、依靠企业发展高技术产业

尽管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发达是同政府重视和支持分不开的,但政府又是依靠企业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尤其在高技术的商品化方面,起作用的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前面说过联邦政府在计算机工业发展初期曾从各方面加以支持,但当计算机技术发展成熟和商品化工业增长后,私人研究费用大大增长,联邦政府就主要依靠企业进行应用研究、发展活动和计算机技术的商品化了。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也说明依靠企业是美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经验。

1973 年,美国两位科学家发明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组技术。1976 年美国遗传技术公司诞生,这是世界上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它揭开了生物技术革命的序幕。接着,这类以风险资本为依托的、由科学家主办的生物技术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据统计,1979 年底,美国有 14 家遗传工程公司,1982 年 1 月增加到 145 家,1984 年底增加到 300 多家。这些小型的高技术风险公司,以其技术力量和创新精神,很快地推出了一批高技术产品。1982 年,用基因方法生产的人胰岛素和动畜腹泻疫苗上市;1983 年,基因工程人生长激素投放市场。在 1985 年以前,这些公司是推进美国生物技术商品化的主力军。1985 年以后,许多小公司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陆续破产、倒闭或被大企业兼并,剩下的少数小公司则从事一些高难度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并实行战略转移,改变单纯进行技术转让的经营方针。

在多数小型公司纷纷倒闭时,一些大型企业对生物技术发生了



极大的兴趣。它们调整经营战略,投入大量资金,广聘科学技术人才,把生物技术作为重要发展领域。例如,杜邦公司投资 8 500 万美元建立了一个生物技术研究所,聘用了 700 多名科学家,每年投入研究开发经费 2 亿美元以上。孟山都公司投资 1.6 亿美元建立了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有 250 个现代化实验室、26 个温室和 123 个种植物,计划聘用 1 200 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以及 800 名职员。通用化学公司、柯达公司等化工企业,菲利普石油公司、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等石油企业,伊莱利利公司、默克公司等医药企业,海因茨公司、坎咀尔羹汤公司等食品企业以及康宁玻璃公司、国家蒸馏器公司等许多大企业也都参与了这场世界性的生物技术竞争。就连一向与农业关系不大的阿尔科公司也在加州投资 1 000 万美元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很多大公司建立了自己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或与大学共同进行研究,或与风险公司合作,或买入风险公司,积极进行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它们以雄厚的财力、人力、物力,构成了美国生物技术研究开发的主要力量。

从根本上说,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美国企业的活力是紧密联系着的。前几年美国经济衰退,有人曾怀疑美国企业还有没有活力,提出了一些悲观的预言。例如,美国一些公司变成了仅仅销售其他地方生产的产品的“空心”组织。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美国企业还是有活力的。美国《幸福》杂志 1987 年 8 月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大企业纷纷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文章,指出美国公司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加强产品竞争能力,正在组织和管理风格方面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改革主要表现在:① 拆散大型综合企业,以便把力量集中在为数不多的机会上,而不是分散力量和资本。② 纵向一体化的公司正在解体,因为它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③ 扬长避短,集中优势。例如,有的公司把弱的部门卖出去,而买进较强的部门。④ 变正式职工制为雇用部分时间职工制。这是一种比较



灵活的雇员制度,适用于从事多种经营的公司。⑤ 大力发展合资经营。这是分担风险和使资本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途径。由于进行根本变革,不少企业恢复了活力,出现了一批最精干的公司。

美国不仅大公司仍享有巨大优势,用一位著名商业史学家钱德勒的说法,“要规模有规模,要经营范围有经营范围,要经营管理有经营管理”,而且很多中小企业也具有竞争活力。前引文章中曾说,美国仍然在强有力地产生小型生产企业,现在小型企业已经把财力、人才从传统的制造业转向高技术工业。可见,美国的小企业和大公司一样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基础。

三、大学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中起着重要作用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斯托会见我们时曾说:美国大学和欧洲大学不同,它有和生产紧密结合的历史传统。美国高科技的发展,同这种历史传统也是密切相关的。美国的大学一直是新技术的重要发源地,计算机、机器人、激光等最初都诞生于大学实验室。

美国《生物技术:学工联合体》一书曾概括美国大学有三个为社会服务影响工业发展的职能。① 为社会训练劳动力。在国际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大学的训练更加重要,缺少训练的劳动力将使国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② 从事研究工作,创造社会知识。这就是发展基础科学,为社会提供洞察力敏锐的科学家。③ 通过社会科学创立意识形态,使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取得合法地位。这些职能对社会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前两个职能对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更起着关键作用。

70年代后期,创新成为美国的热门话题,大学被认为是创新的重要源泉,要求在大学和工业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在美国,加强学工关系不仅是大学和公司的要求,也是政府的要求。在过去10年中,联邦政府反复提倡加强学工关系。

学工关系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教员个人基础上的关系,如大学



教授承担公司的研究课题,为公司进行咨询服务,成为公司的股东或董事;另一类是基于机构性质的关系,这是由校领导或系的领导安排和认可的,比较正规。通过这些关系,实现从大学到工业的“技术转移”。

大学和公司的关系又有多种形式。《生物技术:学工联合体》一书介绍的主要形式有:公司捐款。大学与公司之间最流行、最不受非议的是间接捐款,但这类捐款数量不多。伙伴关系和直接拨款在工程和物理学领域特别盛行,在生物学领域不断增多。在许多情况下,教授为公司进行某项研究,公司的拨款就部分直接拨给这些教授的实验室。捐款公司和教授的关系类似主人和顾客的关系。

公司购买服务。公司往往希望大学提供专门的服务,如高级培训或合同研究。公司也可以选送雇员去接受培训或学习大学课程。如斯坦福大学通过电视为硅谷的电气工程师上学位课程,学费是该校普通学生的两倍。

工业入伙。在美国各大学首创了许多工业入伙计划,比较有名的计划有麻省理工学院工业联络计划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入伙计划。麻省理工学院的计划很成功。每年从 280 家公司获得成员费 480 万美元以上,入伙的公司能收到当前研究的课题目录和论文复印件,并能得到参观的方便,应邀参加专为他们准备的专题讨论和座谈会。

联邦资助的合作研究中心。这是创造条件吸引公司提供资金进行研究的中心。从 1973 年以来,国家科学基金会一直支持一所大学和多家公司合作研究问题的中心,它对这些中心一般资助五年以后,中心就能够自力更生,最成功的中心是麻省理工学院聚合物加工实验室。它有 12 家公司参加,每家捐款 2—8 万美元不等,这些公司可以获得研究成果商业化的优先机会。

私人出资或校办的研究中心。许多大学已经不依赖国家科学



基金会来奖励,而利用本校资金,或者成功地从工业、基金会,或州政府获得资金来创造研究中心。此外,在大学还有独家出资建立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由大学兴办的科学园和企业孵化器对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有重要作用。斯坦福工业园是科学园的鼻祖,开创了把工业公司引进大学校园的先例,发展了大学与工业密切合作开发高技术产业的机制,造就了举世闻名的高技术产业地区——硅谷。由于科学园是富有活力的高技术公司集中地,能不断推出新产品、新工艺和新公司,因此也被称之为新技术、新产品、新公司的孵化器。不过它不同于通常说的企业孵化器。它们的区别在于,科学园不仅孵化小企业,而且接纳新诞生的小企业,它还接纳迁入的大公司,凡迁入科学园者不受居住期限的限制,都可以是“长期户口”,不像企业在企业孵化器内规定有时间的限制。

通常说的企业孵化器,与孵化鸡的孵化器一样,是对那些尚处于“卵”状态的企业,有组织地适时地供给其“成长”期所需的“营养”条件,促使其茁壮成长。企业孵化器一般应具有以下这些功能:① 鼓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② 发现潜在企业家。③ 评价与选择企业家。④ 训练企业家,使之具备创办公司所必需的经营技巧和知识。⑤ 帮助受训的企业家制定经营计划。⑥ 对企业家提供市场扶植。⑦ 帮助企业家得到所需的技术和设备。⑧ 帮助企业家筹措资金。⑨ 进行专业服务。⑩ 提供孵化场地。⑪ 提供各种后勤服务,包括文件收发、电话电传、秘书服务、会议室及食堂等。⑫ 帮助新创办公司发展业务,等等。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创新和投资研究所史密罗副所长曾向我们介绍了企业孵化器成功成长的十项因素:① 具有对企业的专门知识。② 能帮助企业家筹集资金。③ 能提供实物的支援。④ 能得到社会支持。⑤ 能形成企业家网络。⑥ 能对企业家进行



培训。⑦ 具有深刻的洞察力。⑧ 按照合理准则选择承租企业。⑨ 依靠一所大学。⑩ 具有明确的政策和步骤。他认为,企业孵化器对高技术企业的成长是必要的和大有好处的。

四、风险资本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有人说,风险资本是美国新技术革命的催生婆。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企业家根据新的科学构想来开辟新的技术领域时,往往需要大量资金。但是,这种构想能否实现,实现后产品有没有销路,能不能盈利,都还难以肯定。因此,投向这个新领域的资本便常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可能会失败,也可能会成功,故称为风险资本。

美国的一些重要科技成果和著名的高科技企业,都是首先依靠风险资本的帮助才发展起来的。例如,半导体集成电路,就是利用风险资本从实验室转到实用阶段,并在工业中广泛应用。著名的半导体企业英特尔公司、苹果计算机公司以及新兴的生物技术企业基因工程公司、罗姆公司、集成工艺公司都是在风险资本资助下创业成功并获得高速发展。风险资本虽然只占新企业资本总额的2%,但是它对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一比重。有人认为,没有风险资本的支持,新的科学技术便难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美国众多的高技术产业也难以诞生。

《硅谷热》一书详细考察了一个典型的硅谷公司诞生的过程,认为它要经历以下阶段:① 灵感。② 追求。③ 建立一个班子。④ 使企业初步“成型”。⑤ 制订企业计划书。⑥ 搞交易。⑦ 开办一个新企业。⑧ 走向社会。后三个阶段要求风险资本的支持。在搞交易阶段,大多数创业班子没有足够的资本创办一个新企业,他们必须寻求外界资本。由于大多数高技术企业的投资都有很大的风险,这个班子必须要找到一个风险资本家提供资本。公司开办以后,当新公司的规模和销售额扩大时,创业家往往又得找风险资本家要求进一步提供资金,以便壮大自己,在竞争中取胜。在公司开办五六



年后,如果获得成功,风险资本家就会帮助它“走向社会”,办法是将它的股票广为销售。这也是风险资本家的投资得到报偿的真正时刻。“这时,风险资本家往往收拾起装满了的钱袋回家,到另一个有风险的创新企业去投资”。

《硅谷热》是这样描写风险资本的特征和作用的:“风险资本与创业精神形影相随。”如果不知道风险资本家如何经营,就无法了解硅谷这样的高技术“体系”。风险资本家决定一个新建的公司是否可以办成,不仅如此,他们的作为比这还要多得多。他们在一个公司的早期发展阶段,向其提供管理方面的帮助和技术咨询。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会解雇公司经理,亲自接管公司,直至找到新的公司领导人。不过他们尽量避免抛头露面,而是作为一个往往为公众所误解的影子或实体。“许多美国人甚至不知道风险资本的存在,也很少有人认识到他们在领导技术创新方面的力量”。

风险资本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来源:富有的个人;养老金;大学和类似的机构;银行机构、保险公司和其他大公司。这些投资者所以选中风险资本这种投资形式,是因为它带来税收方面的种种好处,并有得到很高收益的机会。最成功的风险资本投资的年收益率达50%以上,而年收益率达35%是很平常的。

但风险资本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积累的一种新形式。美国在20世纪初就开始出现风险资本,但到战后五六十年代,随着新技术领域的扩展,风险资本才有可能迅速扩展。不过在10年以前,风险资本又一度处于衰落中,1969年,美国国会把长期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从28%增加到49%,这给风险投资带来严重影响,使投资的刺激大大减少了。1969年,有1.7亿美元的新的私人资本投到风险公司,而1975年新税法生效以后,这个数字下降到1000万美元,1978年硅谷和其他地方的高技术公司进行了大量的院外活动之后,国会撤消了原有的决定,把资本收



益的最高税率重新降到 28%。其后,美国劳工部又作出决定允许把养老金用作风险资本投资。1981 年,国会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进一步降到 20%,其结果,1982 年投到风险资本公司的新的私人资本超过 14 亿美元,是 12 年前的 8 倍,足以开办 2 800 家小型高技术公司或 350 家规模可观的公司。1984 年美国的风险资本基金估计达 67 亿美元,最赚钱的风险投资领域是高技术。

五、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98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一些同志访问加利福尼亚等州以后曾有这样的印象:美国地方政府历来的主要职责是提供服务,几乎很少参与经济活动。但 70 年代以来,随着联邦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幅度地减税和减少联邦政府开支,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功能普遍增强。一批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才能的人当了各州州长,他们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努力解决本州的经济衰退、财政拮据、城市衰败、失业率高等问题,改变了地方政府长期在经济中无所作为的形象。

看来,说地方政府长期在经济中无所作为,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至少有些地方政府早就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功能确实是增强了。我们在得克萨斯州考察时也深感州政府和市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得克萨斯州为了加强对经济发展的指导,1987 年专门成立了州贸易局。该州还设有先进技术办公室,负责领导州内发展高技术和促使高技术商业化等工作。有人说美国南部和西部各州的州和地方政府才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从一些材料看,美国西部和南部有些州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更显著一些,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关心和努力促进经济发展则可能是全美国的普遍现象。

《日本名列第一》的作者在《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一书中



曾介绍了北卡罗来纳州政府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作用。书中说：“美国传统上一直给予州以很大权力。因此，美国要保持国际竞争力，州就不能不充当重要的一翼。北卡罗来纳就是走在其他州前面，推进了产业现代化并取得硕果的州之一。这个州经济现代化的中心是庞大的科研三角公园，这个研究基地在为经济上最落后的北卡罗来纳州吸引重点研究开发的尖端企业上，起到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把研究开发与地区开发结合起来，这一设想的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20年代。在南方各州中，北卡罗来纳的地区开发研究是走在最前列的。”1958年12月，财团、管理公司和科研三角研究所正式成立，称为科研三角。70年代中期以后，科研三角开始起飞了，5年时间里，规模扩大了将近1倍。到1981年，共有五个联邦研究所、一个州研究所、三个非营利的民间研究所、四个大学的附属设施、两个全国行业组织总部和20个企业研究所迁入了这一地区。由于产业界、政府和学术界的合作，这个曾经只有从事传统产业的低收入工人的州已成了拥有现代化产业部门的州。

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B·小亨特说：“最近，人们经常议论关于政府、学术界与工业界之间协作的问题。我相信这样的协作是必不可少的，而协调这种协作关系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州政府来领导。”他列举了以下原因：①在美国184所从事研究的大学中，有119所是公立大学，而大多数公立大学是由州政府资助的，其他许多私立大学也获得州政府的某种形式的资助。②办好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也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义务，只要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就会取得重大的改善。③工业公司、商场、银行、批发商和零售商，运输系统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经济机构都是存在并活跃于州界之内，而且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在选址问题、劳工关系、环境管理、资本筹集（包括人力和物力）、雇员生活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须由工业界与政府进行磋商的经济活动方



面,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主要的联络机构。④ 民众是生活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管辖范围之内。同距离较远的联邦政府相比,民众更容易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接触。如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在科技改革方面起更大的作用,这种改革将会更加切合民众的意愿和取得成功。

小亨特州长还说:“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于科学的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今日自然科学组织管理的新领域。面对这种新的现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州政府担负领导作用。”他介绍北卡罗来纳州的经验有:

1. 建立必不可少的州一级的组织机构。该州大多数战略计划是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的。通过执行这些计划,在高等院校开展了科研工作,并发挥科研三角园区的作用。还成立了由本州商界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与商业界、研究所、公司和州内外个人有着密切的工作联系。

2. 对民众进行智力投资,特别是对年轻一代。在中小学中,建立了任教能力测试制度,提高了教师工资。改善了对他们的培训工作,并采取其他措施改进普通教育。还创造了北卡罗来纳自然科学与数学学校,这是为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天资出众的学生所开办的住读大学。

3. 创办微电子中心和生物工程中心。成立微电子中心的目的是使北卡罗来纳州六家主要的研究机构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利用最先进的微电子研究设备进行研究。这些设备非常昂贵而且更新换代速度甚快,由于不可能为每一个研究机构都配备同样先进的设备,建立这一中心能使这些研究机构共享先进设备,有可能保持研究和教育的领先地位。

4. 提供研究和开发资金。例如,州议会给微电子中心赞助了2 440万美元,还为企业的研究开发提供近2 000 万美元的赞助,这



比联邦政府向该州提供的农业研究资金高出 3 倍。

尽管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增强了,对高技术产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政府并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也不直接经营企业,而是从各方面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为高技术产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包括实行税收优惠,建设基础设施,培训熟练工人、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提供资金、资助中小企业以及帮助选择厂址和提供各种咨询服务,等等。高技术产业兴旺发达的地区一般不仅有较高的科技水平,而且基础设施较好、生活质量较高、生活费用较低、居住环境良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还从税收、资金、场址以及生产生活服务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吸引所需的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安家落户。

美国发展高技术产业存在的问题

一、用于军事研究的费用过多

我们在和得克萨斯大学创新和投资研究所的专家座谈时以及在和斯坦福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专家座谈时,都有人说到美国用于军事研究的费用过多,认为这是不利于美国高技术的发展的。

从美元总数来看,美国用在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开支,比它的竞争对手日本、联邦德国和法国三国的总和还多。但是,根据美国科学基金会收集的数字,这三个竞争者近几年来一直在大幅度地增加研究和发展的经费。1986年,美国用于研究和开发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8%,仅比 1970 年的 2.6% 略有增加,而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则增加很快。日本 1970 年研究和发展方面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9%,1985 年已上升到和美国的 2.8% 不相上下的水平。联邦德国 1970 年占 2.1%,1985 年增至 2.6%。法国 1970 年占 1.9%,1986 年增至 2.4%。



许多分析家说,美国经费虽高,但水分不少,因为美国研究和发展的经费中有 1/3 用于军事研究,比日本、联邦德国的比例大得多。如果减去军事开支,美国用于研究和发展的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9%,而日本为 2.6%,联邦德国为 2.5%。

据另一材料,10 年来美国联邦政府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军事研究项目,尤其是符合军事目的的研究与开发。美国的国防预算自 1980 年以来在增长,1987 年可能高达 2 700 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 6%(1980 年占 5%),其中 320 亿美元用于军事研究。再加上战略防御计划提供的大量资金(从 1985 年的 16 亿美元增加到 1987 年的 35 亿美元),美国军事研究费用总共约占联邦政府研究与开发预算的 70%。

对美国军事费用多是否阻碍民用技术发展的的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

1. 如何看待军事研究对民用技术的附加效应。有人强调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是相互促进的。如军事上对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导致民用技术的发展和民用市场的开放,有关发动机和机舱的军事研究项目使新一代大型民用喷气式运输机迅速发展。对半导体技术的研究最初是工业界支持的,后来国防部对硅晶体管技术尤其是与导弹技术有关的技术项目产生了兴趣,开始资助一些重大研究项目,使硅晶体管和集成电路两项重大技术创新得以长期维持下去。而为研制这些集成电路所需开发和改进的许多技术(如集成电路的印刷技术、测试方法等)都具有附加商业价值。1971 年,由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资助的一项研究表明,1959—1969 年期间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花费的 280 亿美元将为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带来 2 070 亿美元的增值。但也有人不同意以上看法,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上述研究就受到空前激烈的批评,人们指责这种当事人作出的评价未必可信。



2. 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是否更加困难了,有人认为,是更加困难了。这种困难多半是由应用技术复杂程度的增加造成的。同 60 年代的武器相比,拥有电子技术和特殊的引导和定向方法的新一代武器系统,尤其是以导弹为基础的武器系统,需要更复杂技术,从而需要更加雄厚的研究力量,以集中研究那些刚开始并不明显地具有民用潜力的技术。在基础技术这一层次上(如在材料、程序设计方法等方面),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基础技术的应用上,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仍是很复杂、很困难的。民用领域和军用领域越来越具有不同的技术需求,民用产品要在成本上有竞争力,军用技术还附有一些保密条款,这些都使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过程复杂化。

为了使美国军事研究有利于民用技术,有人建议依靠由国防部牵头的项目来帮助民用技术的开发,也有人建议成立国家技术署,通过给美国工业内部合资企业提供优惠来促进美国技术竞争力的提高。更多的人则认为应该减少军费支出来增加科研经费并充分发挥这些经费的作用。

二、忽视科研成果的应用

不久前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表报告,要求重视技术商品化问题。该委员会是由工业界、工会和教育界的 151 名负责人组成的无党派非盈利机构。委员会发表的题为《加快速度:迎接商品化对美国技术革新的挑战》的报告,建议联邦政府采取新政策,促进技术的研究、发展和商业性使用。

委员会主席、惠普公司总经理约翰·扬说:“外国竞争者在技术商品化方面常常比我们做得多。我们常常是技术的发明者,而外国人常常成功地将这些技术投入市场。”报告指出了下列情况:美国公司在许多高技术领域所拥有的国内市场份额大大减少。从 1970 年至 1987 年,美国制造业公司在国内电唱机市场拥有的份额从 90%



下降到 10%，在彩电市场拥有的份额从 90% 下降到 10%，在电话机市场拥有的份额从 99% 下降到 25%。到 1986 年，日本已夺走国际计算机芯片市场 65% 的份额，美国拥有的市场份额不到 30%。报告对于外国技术创新日益增多深感不安。例如，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创新者 1987 年取得了美国将近 47% 的专利权。五年来，日本已向国际市场投放了 60 种新药，而美国只有 58 种。报告说，美国必须克服多年来自鸣得意的情绪，改变目光短浅的政策，以便重新夺回它一度拥有的把科技成果用于商业方面的领先地位。“如不采取果断行动，其结果将是劳动生产率下降，美国在全球市场失去竞争力，美国生活水平下降”。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8 年 7 月 11 日发表的题为《在研究和试制方面落后吗？》的文章中，也指出了美国工业生产产品从实验室进入市场方面落在日本和联邦德国后面的原因。文章说：“从支出的美元总数来说，美国公司花的钱还是比竞争者多，但是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仍然是：美国支出的钱为它带来哪些竞争优势呢？”文章引用一个人的话说：“从支出的美元总数中找不到衡量研制效果增减的真正标准。问题主要是赖以进行研究的商业习俗、宗旨和基本政策。”

海湾石油公司的前研究室主任罗伯特·沃尔德说：许多公司是管理部门的自满情绪和“惰性”的受害者，决定研究工作价值的首要因素是人们用他们取得的知识去做什么。人人都同意，美国现在欠缺的方面不是能否产生知识，而是工业界不愿意冒险把新知识结合到企业中去。到目前为止，日本人由于把新知识引入企业，已经超过了我们。

美国国会研究部门——技术评价局提出的一份报告说：在十几家日本跨国制造公司大力研究高温超导体应用的时候，大部分美国公司都采取“等着瞧的态度”。《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援引



这份报告说：“日本管理研制工作的人员认为高温超导体是一种可以使他们的企业发生根本变化的真正革命性技术。美国人通常对此采取的怀疑态度，这在日本是不会看到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文章归纳各方面的意见，认为下面这些问题妨碍美国公司提高研制工作的效益：

惰性。自满情绪和基于强调盈亏的短期思想使得各公司不会得到华尔街投资管理人员的投资。人们也不愿意投资购买工厂和设备。

在管理研制工作方面没有重点。许多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公司研究部门进行的工作，对技术发展与公司竞争能力、新产品和带来的利润有什么关系了解不够。

官僚主义。一家公司的董事长说：“你可以到大厅里遛一圈，数数站在实验室内做实验的人，然后再数数坐在写字台后面的人。坐在写字台旁谁也发明不出任何东西。”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科学的差异有日益缩小的趋势。因此，重视科技成果在商业上的应用就更为重要了。《纽约时报》1988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现在科学和技术正开始合二为一。在一定程度上，科学正在变成技术。为了在商业性技术创新的国际竞赛中竞争，发明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依靠程度大大增加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布洛克说：“毫无疑问，从发明到商业上付诸应用之间的时间正在缩短。我们必须懂得如何进一步缩短这段时间”。“发展的步调正在急剧加快。我们需要让各大学同工业之间转让知识的速度比通常快得多，做法也要好得多。”

三、企业之间缺少合作

美国是强调个人主义的，企业之间也是强调竞争而缺少合作。当然这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的。1986年1月，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教授在哈佛大学举行“思想意识与经济发展问



题”讨论会,有的发言者就检讨了这方面的缺点。

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教授乔治·洛奇说:市场竞争的一个特色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是要确保竞争不受任何限制,因此必须打散大企业。小企业好,大企业不好。也就是说,街面上有10个加油站,要比只有一个加油站好。但今后的国际竞争、经济规模及新的科技,却迫使工商企业联合、扩大、合作,才能符合国家利益与团体需要。而这些却违背了过去个人主义的想法,即由个人竞争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过去的想法是往内看的,是以美国国内市场为主,而现在世界才是市场。所以,过去的思想意识阻碍了美国工业与经济的竞争能力,我们正在改变这种想法。他还说,世界上经济成功的国家,都是有团体主义精神思想意识的国家。

《日本名列第一》的作者沃特尔说:西方国家需要改变某些思想观念。“我不是说应该改变他们基本的价值观,比如美国人仍可以有许许多多个人主义思想,但需要更多的合作,加强团队精神,才更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和现实环境。”“如果你只是任由开放市场自由竞争来决定一切。就不会有某一项工业能有国际竞争力。”“政府如果什么事都想自己动手做,是很糟糕的。我还是认为日本是最好的例子,主要由民间企业提供建议,与政府一起开会、协商,经过一段相处时间后,自然而然他们会在一起开始探讨新的问题和新的合作方向,而这都是以前没想到过的。当企业只顾自己的利润时,他们不会想到共同研究、制订零件统一规格、共同推销。一旦他们一起商讨,就会想到各种合作的方式,然后与政府官员一起讨论,由政府去推行民间企业的这些合作想法,政府接受来自民间的意见,会使计划易于付诸实行,会比政府闭门造车要好。”

可能是基于以上认识,美国企业在高技术领域已经重视合作研究。这次我们在奥斯汀访问的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公司(MCC)和



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Sematech)就是这种合作的表现。

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公司是 1982 年酝酿成立的。创始人是控制数据公司当时的总经理威廉·诺里斯。他从美国技术界对日本政府资助的大型研究项目“第五代计算机”表示的担心中感到美国企业也要联合起来,因此控制数据公司同另外 9 家公司联合起来组成了这个公司。他们制订了四个领域内的长远研究计划,这四个领域是软件技术、半导体组装和互连、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体系结构又分为四项:人工智能、数据库、用户机的相互作用和并行处理(超级计算)。公司决定,新研究的技术一旦得到证明并达到质量保证标准,就交付给各成员公司。到 1983 年 5 月选定奥斯汀为总部时,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公司的成员已增加到 12 个,以后又有 9 家公司加入。成员公司多了增加了预算收入,但也带来了矛盾,曾任该公司负责人的博比雷·英曼曾说:“最早 10 家公司的目标无一是一短期的,都是长期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有了较多的短期目标。”最初的计划有些方面在执行过程中也遇到困难,导致了一些内部争吵。如公司原计划从成员公司抽 65% 的研究人员,但成员公司不愿调出最有才华的研究人员。看来这个比例减少了,大约有 65% 的人员是从外面招来的。公司还规定,只有参加某个项目(并且每年为某个项目支付 100 万美元的费用)的股东公司才有权得到该项目的研究成果,这意味着研究人员不能自由交流信息,而他们的研究项目往往是有重叠的。我们访问该公司时,接待人员曾谈起公司组织结构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尽管存在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它还是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已经有几十家新的合资研究企业以它为榜样建立了起来。

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是 1987 年由美国一些大半导体制造厂家在政府资助下组成的。成员中包括两个代表现有工艺水平的规模最大和竞争最激烈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它



们联合起来是为了改进生产微型硅晶片所需的极其复杂的制造工艺。它们认为,正是由于日本在半导体制造技术方面拥有优势,它的芯片制造商才在竞争中享有优势。日本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取得优势也是靠同行业的合作和政府支持,这家公司已选择在奥斯汀兴建试验工厂,从成员企业选用雇员,努力研究和试验制造技术、工具和设备。然后,成员公司都可以利用研究出来的一切技术,用以生产自己的产品。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将向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提供4兆位的动态存储芯片作为一种试验工具,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将提供64 000位静态存储芯片。“两家公司都处于大大领先的地位,并为发展这些芯片投入数亿美元”。美国在今后6年中每年将花费2.5亿美元,其中国防部每年提供1亿美元,得克萨斯州和奥斯汀市支付2 500万美元并捐款实物。另外,1.25亿美元由各成员公司提供。该公司宣布,到1990年要使美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提高到与日本并驾齐驱的程度,1993年美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将跃居世界首位。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查尔斯·斯波科说:“日本人一直说美国公司根本不可能联合在一起,而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的成立是一项重要的实验,它将为美国其他行业树立一个榜样。”

四、急功近利

美国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上的另一个缺点是急功近利。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经济地位逐渐衰落,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创新能力。很多美国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科技革新的先导,问题出在提出新设想之后,往往不能把新的设想转变为产品,而这又同急功近利有关。

有人拿盒带式录像机为例分析这个问题。盒带式录像机是美国的一项发明,然而,今天没有一家美国公司生产盒带式录像机。1986年美国销售的1 320万台盒式录像机都是日本和韩国生产的。为什么美国是发明者而日本却在竞争中取得胜利。一些分析家说:



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抛弃了美国创新精神的传统，而是因美国工业界的经理人员不愿意投入人力物力，没有长时期地应用这种独创性，使好的设想取得成果。哈佛大学的技术和政府政策专家哈佛·布鲁克斯说：美国的一种习惯作法是，避免投资生产没有很大把握能很快获益的新产品；只要原来的产品畅销，就不推销现有产品系列中新发展的品种。直到最近为止，美国的公司还没有认真计划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而日本则把全球保持经济优势作为全国的目标，在研究和发展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并将其最优秀的工程技术力量用于先进的制造方法。这些因素使得日本处于优势地位。

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内森·罗森堡说，随着高技术革新费用的增加，经济利益将落在模仿者手里，因为他们能省去基本研究的开支，从革新者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很快将改进了的产品投放市场。布鲁克斯说：“当一个国家在竞争力方面落后时，革新方面的落后出现在最后，最先落在别国后面的是制造和销售。”罗森堡和其他许多人都说，在美国，工业界已失去了一种能力，即不去利用好的“下一代改进”的设想，不管这种设想是哪个国家最先提出的。

有的人认为，不同的文化也在起作用。美国工程师往往喜欢从事研究和发展工作，而不喜欢从事制造工作。在美国，发明一种新产品的工程师，其地位和薪金都比研究如何按照高标准把它制造出来，并使其成本低得有利可图的工程师来得高。美国工程学院的一个专门小组在1985年发表的一项报告中说：“美国制造业人员地位和报酬相对来说比较低，这种情况是吸引第一流人才的障碍。大专院校的工程系直到最近为止基本上还是忽视这个领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欧洲和日本，技术教育和从事制造业的人员的地位都比较高。”日本人和欧洲人由于在制造业中有着比较优秀的人才，因而能够研究出更高超的制造方法和技术。



一位美国人和一位日本人对计算机制造厂家共同进行调查后写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说,美国的产品之所以质量较差,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工程师能够容易地在研究开发领域与制造领域之间来回流动。美国从事研究开发的工程师不仅提出对新产品的设想,而且还确定各种最后的规格,然后把它们交给一个制造部门就算了事。而日本从事研究开发的工程师对产品的设计只限于初步的原型阶段,而把最后规格留给制造业的工程师去确定。在日本,一名从事研究开发的工程师往往随后便随同这项产品转到制造部门,这在美国是罕见的,但是在许多日本公司,却是逐步晋升的一级阶梯。根据日本的制度,制造技术方面的专家可以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先进制造方法,自由地完成设计。他们可以修改产品设计,以确保制成后的产品质量更加可靠。他们甚至可以发明新方法来制造这种产品。因此,日本的产品制造起来就比较容易,成本比较低廉,质量缺陷也少。

他们还谈到日本与美国的另外一些区别。例如,日本的公司为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深造所投入的时间和金钱比美国的公司多得多,原因是日本公司几乎不用担心杰出的人才会被竞争的公司挖走。终身为一个雇主服务是日本工程师的传统,数百名工程师被派到国外去学习,时间或是数月或是数年。又如,无论哪个国家的工程师往往都从事“捞外快的研究”,利用公司设备资料业余研究个人的项目,但是美国的公司却设法阻止这类活动,因为那些工程师到时候便会离开公司,到新成立的企业去开发他们的新设想。日本的公司则鼓励这种附带的研究,因为它们深信,这些工程师会留下来,将那种新设想转变为对公司有价值的产品。

也有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公司往往由专业经理人员管理,这些人不懂工程技术,他们作出的决定是尽可能多地获取短期收益。而日本由于没有商学院,高技术公司往往是由既有管理才能而又在公



司里已跃升到相当地位的工程师管理。他们对未来的规划要长远得多,并且情愿为了长期利益而放弃短期的收益。所以,日本的公司更愿意较长时期地花本钱,以使某种新产品设想开花结果。

(原载《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9年第5期)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生产关系问题是根本问题

一、当前经济领域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如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营管理不善，群众生活困难等等。

主要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所有制结构和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同生产力不相适应。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巨大的优越性，发展生产的潜力是很大的，问题是现在潜力难以充分发挥出来。为什么？主要是生产关系存在问题。

有些好的措施，如发奖金，实行后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还出了许多新问题。好的主意贯彻起来往往走样。为什么？主要也由于生产关系存在问题。

从历史看，为什么“一五”时期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主要是生产关系问题处理得比较好。当时经过了土改，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方法、步骤上比较恰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因此经济发展快，人民生活提高快。

后来经济中怎么出现一大堆问题的？从哪里开始出问题的？远一点说，是从合作化高潮开始，近一点说，是从公社化开始。公社化中农村大刮共产风，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因此整个国民经



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比例失调是必然的。加上工业中破坏经济核算和按劳分配等制度,生产必然上不去。三年调整时期经济好转,首先也是由于调整了生产关系。

我不主张把什么都归结到生产关系上来,但是我们应该重视生产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看到这些问题的多方面的影响,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解决问题要有准备,有步骤,不能仓促行事。

二、生产关系中是否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我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应该肯定。但是,当前不仅所有制结构存在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存在着某些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

大锅饭,铁饭碗,即平均主义,就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搞平均主义就是破坏按劳分配,因此危害极大。它把劳动者的进取心都窒息了,把人们的聪明才智窒息了,使人们变懒、变蠢、变穷。不克服平均主义,我们的国家、民族就没有希望,四化也实现不了。

现在批判政治思想领域的封建残余,这对我们经济工作也是很必要的。既然有封建思想,它就不可能不在经济领域中有所表现。

林彪、“四人帮”搞的社会主义就是封建社会主义。列宁说:封建徭役经济有四个特征: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二、劳动者束缚于土地;三、超经济强制;四、极端低下和墨守成规的技术。“四人帮”反对商品生产,反对科学技术,反对经营管理,搞什么政治办厂,用专政的办法搞农业,完全是封建的那一套。

现在“四人帮”垮台了,封建残余却还存在。昔阳“西水东调”工程,“渤海二号”事件也表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不应该夸大这种封建的东西,它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中毕竟是残余,同时,也不能看



到某些和封建特点有类似的现象，就不加分析地扣上封建的帽子，现象相似内容可能不同。但是封建残余确实还是存在的。

封建残余对经济的影响表现在哪里？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在生产中，表现为用家长制的方法进行领导。又如，在流通中，表现为用行政方法封锁市场，阻碍商品流通。又如，在分配中，表现为凭特权进行分配。再如，在经营管理中，表现为厌恶现代管理和现代技术，轻视经济效果，等等。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有封建残余呢？这个问题也值得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影响深；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忽视了对封建的批判；加上林彪、“四人帮”曾大搞封建复辟；这些显然都是原因。我们过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也助长了某些封建的东西。

总之，彻底克服社会主义经济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是我们面临的严重任务。

三、怎样改革国营经济管理体制？

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中心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已取得明显的成效，应当坚持进行下去。

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国营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有一种意见主张现在取消国家所有制，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国家所有制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是大势所趋。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所有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既要保持国家所有制，又要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是否可能？可能的。这就是使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西欧国家的国营经济都按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原则进行经营，就是这样做的。

作为一种远景，可否这样设想：



(1) 国家把生产资料作价交给企业，资金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由企业负责经营，国家不对企业颁发指令性指标。

(2) 劳动者总体作为经营者，根据国家计划和市场情况自主地作出有关生产和销售的决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3) 国营企业对国家除了完成同其他企业一样的义务外，应该把一定数量的企业收入交给国家，作为国家投资的利息。

(4) 企业对于缴纳税收和利息后的收入有完全的支配权，有权依法决定积累和分配给劳动者个人的部分的水平，决定企业扩大再生产投资的方向和规模。

(5) 劳动者个人收入和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联系，经营好的企业劳动者收入也多。

(6) 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通过对国有企业资料的占有和使用原则作出规定，通过运用自己掌握的投资，通过价格税收利息等经济杠杆，保证社会主义原则的实现。

这种体制的特点是：

(1) 和现在不同，企业成了独立的经营者。

(2) 和资本主义企业不同，企业没有剥削关系，全体职工都是主人，当家作主。

(3) 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不同，国家所有制依然存在，国家所有权不仅通过上缴利润得到实现，而且可以通过诸如指派经理等办法等到实现。也不能排斥有些企业仍像现在这样经营。

企业为什么必须有独立性呢？因为：

(1) 不管社会性质如何，企业必须有独立性，才能完成自己作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和任务。我们的企业所以没有资本主义企业那样的活力，根本原因可能在于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2) 企业作为法人，也必须有独立性。

(3)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并不因为是国营而失去独立性。



其实,公司形式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

(4) 社会主义企业有了必要的独立性,许多问题(如政企不分,企业缺乏内在动力、缺少横向联系、滥发奖金、评工资困难等等)就易于解决了。

有一个问题要研究和说明:过去经济学教科书都是从企业没有独立性或只有很少独立性来论证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企业有了独立性,社会主义还有没有优越性?我认为,只有企业真正有了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对于处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几点意见

(1) 以后一个长时期内,在我国各种经济成分中,主要是要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就是合作社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有强大的生命力,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市场适应性强,可以和机械化的生产力相适应,也可以和自动化的生产力相适应,因此能在长时期内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这样做会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当然不会。我们过去认为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于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以后全民所有制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变化,集体经济又要大发展,对社会主义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要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现在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不会威胁社会主义。

(2) 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依靠谁?当然要依靠国家的指导和帮助,但主要要依靠集体和个人来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

(3)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规模和经营方式应该多种多样。不仅农村的集体经济(生产队)可以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和其他经营管理制度,城镇集体经济也可以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和经营管理制度。当前农村的集体经济应该通过灵活的经营管理方



式,调整生产关系,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4) 为了鼓励投资和促使企业合理使用资金,可以允许(不一定提倡)集体所有制企业用一部分利润作为红利,按股份分配。

(5) 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营得好,职工的工资福利可以高于国营企业。要通过立法、司法使集体所有制企业坚信所有权有保障,积极扩大再生产,不搞分光吃光,正确处理积累消费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职工工资福利高了,没有什么害处。

五、怎样对待个体经济?

虽然我们已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如何对待个体经济还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原因是我们的生产力还落后,个体经济在某种条件下还有一定的生命力。而且,正确对待集体经济和正确对待社员家庭副业,也要求正确对待个体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专门分析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家庭劳动”,指出它同原来的那种个体经济,“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已经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和商店的分支机构”。个体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是随着周围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体经济,和旧社会个体经济在性质上的区别。现在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汪洋大海的包围中,我们没有理由害怕它们,而应该积极引导,发挥它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

六、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经济更优越的自动调节机制?

社会主义制度要充分发挥优越性,国民经济必须有一个自动调



节的机制。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要有强大的动力,能够自动地建立和发展最优的经济结构和达到最佳的经济效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调节机制,我们现在还难以完全实现。现在看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还需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正确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这就要求给社会主义企业独立性,努力发展商品生产,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资本主义经济是依靠价值规律自动调节的,因此它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的自动调节机制有严重的缺陷,必然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注意克服价值规律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在这里,应该充分发挥计划平衡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现在存在着忽视计划平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历史经验表明,计划平衡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社会主义经济自动调节机制的重要组织部分,这也正是社会主义调节机制优越于资本主义调节机制的地方。

我们社会主义有一个根本优点,就是消灭了剥削,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使我们有可能建立起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的自动调节机制。至于如何建立起这样的自动调节机制,是一个应该认真探讨的问题。

(本文为 1980 年 8 月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简论经济管理体制的 内涵、模式和演变

我国正在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从理论上探讨经济管理体制的内涵、模式和演变等问题，是很必要的。本文准备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内涵

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经济管理体制是上层建筑。例如有的同志说：经济管理体制就是国家组织领导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另一种意见认为经济管理体制是生产关系。例如有的同志说，一定形式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体现，它属于生产关系。经济管理体制究竟是生产关系还是上层建筑？它和生产关系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和上层建筑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为了说明这些问题，需要分析它包括哪些内容。我们通常说的经济管理体制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所有制体系和结构。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各种经营方式的体系和构成。
2. 国民经济运行的体系和机制。包括国民经济如何组成，如何运行。



3. 经济组织及其管理机构的责、权、利划分。包括企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的责、权、利的划分,以及企业内部责、权、利的划分。

4. 调节系统和监督系统。包括国家以及各级领导部门如何调节和监督国民经济的运行,使之达到自己的要求。

根据以上的内容,经济管理体制可以说是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以及管理国民经济的基本制度。它既是生产关系的体现,又包括一部分上层建筑的内容。

经济管理体制实质上是生产关系问题。因为,不仅所有制结构是生产关系问题,而且经济组织及其管理机构的责、权、利的划分,也涉及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例如,由于责、权、利的划分不同,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企业同职工的关系也会有不同。运行体系、调节系统、监督系统也都包括生产关系的内容。

但是经济管理体制和生产关系又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第一,经济管理体制不仅是生产关系问题,也包括上层建筑的内容^①;第二,经济管理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它们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既研究经济管理体制也研究生产关系,但这是从管理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而政治经济学则是把生产关系作为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来进行研究。

生产关系包括很多层次,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等。这些本质特征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例如,计划经济可以表现为单一的计划调节,也可以表现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还可以表现为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表现为企业完全没有独立性,也可以表现为有较少的独立性,还可以表现为有较多的,但又是相对的独立性。这些就是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了。经济管理体制还研究管理国民经济的基本制度(包括管理的方式、方法等等)。所以,经济管理体制与生产关系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管理体制除包括生产关系问题外还包括上层建筑问题。例如,经济组织及其管理机构的责、权、利划分,这里的管理机构,有的是政府机构,这显然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又如,经济管理体制往往是由国家机关通过法律法令规定的,这也涉及上层建筑问题。但是,这里的上层建筑现象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涉及生产关系的变化。所以,经济管理体制实质上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经济管理体制实质上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但又不只是生产关系问题,而且包括上层建筑问题。看不到经济管理体制是生产关系问题,这是不对的;看不到它还包括上层建筑问题,也是不全面的。

第二,研究经济管理体制主要也是研究生产关系问题,不过它不像政治经济学那样把生产关系看成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体来进行研究,而是从管理的角度来研究生产关系,研究如何通过管理来完善生产关系。

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有没有区别?有的同志说有区别,认为后者包括所有制结构,前者不包括所有制结构。这种意见值得商榷。因为,就整个社会而言,国民经济总是要进行管理的。纵观人类历史,人们还难以发现完全没有管理的国民经济。所以,经济体制也就是经济管理体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也是经济管理体制,因为资产阶级的国家及其政府也在管理经济。下面将提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问题。

至于说经济管理体制不包括所有制结构,这也不能成立。难道管理经济的方式方法能不涉及所有制问题吗?有的同志认为,经济管理体制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方式方法,但他们却否认经济管理体制



包括所有制结构,这不是矛盾的吗?其实,所有制结构也有一个不断调整的问题。如何调整所有制结构,也正是现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也是管理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即使我们同时使用这两个名词,但作为经济管理科学的范畴,它们的内涵应该说是相同的。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模式

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模式,指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模型。就是说,这些经济管理体制在模式上是有区别的,但是都是社会主义性质,而模式的区别也是某种重要的实质性的区别。例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存在,是否允许市场调节发挥一定的作用,在这些方面做法不同,当然会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区别。这样,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就有了不同的模型。

我们是承认社会主义有不同模式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但是也有人否认社会主义有不同的模式。国外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每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由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民族特点所决定的。对于一种现象,只能存在一个客观真理,社会主义制度,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建立的,都要具备某些基本特征,否则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持这种意见的人借口社会主义制度都要具备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特征,因而否认存在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缺乏理论依据的,而且也不符合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际情况。

第一,社会主义所以是社会主义,确是有共同的特征的,如共产



党领导,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公有制占统治地位,实行按劳分配等等。不具备这些特征,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假社会主义。

第二,但是社会主义各国除这些共同的特征外,还有自己的特点。上述说法也承认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有特殊性,而有些特殊性是带有实质性意义的,如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允许一定的市场调节,这就是不同模式存在的依据。

第三,所谓实质性的意义,也就是带有本质性的特征。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等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特征,但不能说除此以外社会主义就没有本质性特征了。什么叫本质呢?本质就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巩固的(保存着的)东西”。^②列宁还说过“初级本质”、“二级本质”的问题。^③这就是说本质也是有层次的,如自然科学先发现物质由分子构成,这是认识了本质。以后又发现分子由原子构成,这就进一步认识了本质。以后原子核又进一步分解为各种粒子。现在我们只能说发现了更深一层的本质,不能说以前发现的分子、原子、电子等都不是本质了。

至于说对于一种现象只能存在一个客观真理,这也不能成为否认存在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由。问题在于,真理的内容是具体的,丰富的,而且认识真理是一个过程。过去我们曾认为只有苏联的模式是唯一的模式,其他的模式都不成其为模式,甚至不允许其存在。事实说明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已经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而建设社会主义总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的国情结合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不同的模式是必然的。

那么,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有几种模式呢?根据对于模式的理解不同和研究的目的不同,说法也不一样。如格鲁奇在《比较经济体制》中,把共产主义经济分为四种模式,即:1. 动员的共产主义经济。2. 正统的或斯大林式的命令经济。3. 改革了的命令经济。



4. 分散的面向市场的共产主义经济。布鲁斯则认为,应该按照运行机制来划分经济模式,而运行机制又决定于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决策方式。他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决策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次是宏观经济活动的决策,这个层次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第二层次是企业经常性经济活动的决策,包括企业生产的规模和构成,投入的规模和构成,供给的来源和销售方向,劳动报酬的具体形式。第三层次是家庭或个人经济活动的决策,包括个人消费决策、职业的选择等等。根据上述三个层次经济活动决策的不同,布鲁斯把社会主义经济分为这样几种模式:第一种,集权模式,即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都由国家集中决策。第二种,分权模式,即第一层次由国家决策,第二层次由企业决策,第三层次由个人决策。第三种,市场社会主义,即三层决策都是非集中化的,都由市场自发调节。布鲁斯赞成第二种模式,认为匈牙利实行的就是这种模式。

布鲁斯认为经济模式和社会经济制度是有区别的,经济制度反映生产关系,而经济模式则是一种运行机制。这种看法也需要商榷。应该说经济模式也是反映生产关系的,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上面曾说经济管理体制是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以及管理国民经济的基本制度,根据这个定义,把它归结为运行机制也不全面。

在划分经济模式时,考虑运行机制,考虑两种调节手段(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作用范围和方式是很必要的,但是还嫌不够,还要包括所有制结构,国民经济组织形式,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条条和块块的关系,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当然会反映在两种调节手段的作用上,但是,诸如经济形式的构成,经营方式的选择,中央和地方职权的划分,乃至经济组织形式的确定(如建立哪些经济组织,城市起什么作用)等等,同调节手段相比较,对于经济模式的作用,是同样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如果仅仅依据运行机制,依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来划分模式,可能会导致片面



性,因而是全面的。

我国一些经济学家赞同布鲁斯划分经济模式的意见,并且主张把他的第二种模式作为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目标模式。根据上面的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究竟可以分为哪些模式,似还值得进一步探讨。因此,还不能说我们必须在布鲁斯的三种模式中选择一种模式作为目标。而且,从我国情况看,和实行上述第二种模式的匈牙利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例如我国的国土面积大得多,人口多得多。在我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条条和块块的关系,就比匈牙利复杂得多。上述第二种模式并没有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现成办法,还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包括探索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办法。邓小平同志说:“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别国的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我们要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管理体制模式。

应该指出,为了掌握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规律性,研究经济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一种经济模式并不直接就是某个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而是舍弃具体的细节特征而得出的理论概括。研究经济模式是为了把握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性。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经济模式则涉及另一个层次的本质,这里仍旧是研究本质,掌握规律。不能把理论模式和具体实践完全等同起来,例如,我们要在计划经济中发挥市场调节为辅的作用,但哪些商品由市场调节,则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和变动的。

关于影响经济管理体制变化的因素

经济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为了掌握其规律,探



讨改革的客观依据,需要研究影响经济管理体制变化的因素。根据前述经济管理体制的内涵,总结历史经验,影响经济管理体制变化的因素是很多的,主要的有:

第一、生产力的状况

生产力的状况最终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因此对经济管理体制也有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农业中,和在生产力较为发达的工业中,不仅所有制结构不同,其他如经营形式、运行机制、调节系统、监督系统等等也有很大区别。在我们当前的农业中,除粮食棉花等少数产品外,是不可能用指令性计划来指导生产的,而在工业中,随着生产力的变化,经济管理体制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

为什么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曾促进生产迅速发展,而后来则越来越暴露其弊端,不仅导致效益差,而且速度也上不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生产发展了,社会化程度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更加要求走集约化的道路,走提高效率的道路,这样,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就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

第二、生产关系的性质

既然经济管理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生产关系的性质当然要影响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变。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就有根本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是依靠企业追求利润,调节机制主要是依靠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即使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制订和实行经济计划,也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如联邦德国实行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并以社会(因素)为补充和社会保障为特征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的自由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相结合”的经济制度。战后法国历届政府也坚持市场经济,实行计划调节是以此为



基础和前提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般则在计划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市场的作用，在我们国家就是在计划经济中发挥市场调节为辅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之间，经济管理体制也有区别。不能把全民所有制的一套体制照搬到集体所有制去，也不能把集体所有制的一套体制照搬到全民所有制来。现在集体企业实行统负盈亏，很多是违背集体所有制性质的。

第三、政权和政治的状况

政治制度对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例如美国 1776 年独立以后，一直到 1789 年联邦政府成立，当时国会没有什么权力，政权的组织中心在州政府，与此相适应形成了以州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1789 年国会通过了《美国宪法》，确立了联邦、州、地方的三级政权体制，宪法赋予联邦以极大的经济权力，联邦权力日益扩大，因而才形成了以联邦政府为中心的经济管理体制。

又如在英国，是工党政府上台还是保守党政府上台，对经济管理体制也会发生某些重要影响。工党政府主张搞所谓国营经济和计划调节。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却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更多地发挥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撒切尔夫人强调“把作出经济决定的权力从官员手中转移到企业家手中”，他们的政策主张也是有区别的。

再看苏联，政治情况的变化对体制也有影响。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对体制作了变动，后来勃列日涅夫又作了新的变动。苏联改革体制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至于改革的成效，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国的情况也说明政治情况对经济管理体制变化的影响很大。最明显的是，如果不粉碎“四人帮”，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前这一场改革也不可能实行。从我国的实践还能看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是必须结合起来进行的。



第四、经济管理的传统

经济管理体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历史传统必然对当前的体制及其发展有重要影响。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欧和日本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制订了经济计划,因而形成了一种制订计划和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计划调节的传统。而美国则没有采取中央制订计划之类的办法管理经济,美国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预算,银行集中管理等办法来控制国民经济。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约占全部收入的60%,地方占40%,联邦政府凭借充裕的财力对州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进行干预。同时美国对银行的管理是高度集中的,十分重视利用银行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些也是有历史传统的,在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后就这样做了。美国十分重视对农业生产进行干预,通过拨款给农民各种补贴,干预农业生产,这也是有历史传统的。

日本不仅企业管理比较好,宏观经济管理也比较好,有一套制度和办法,这也是有其历史传统的。

我国目前的经济管理体制也受历史传统的影响。例如革命根据地实行的供给制,就对我们分配流通领域的管理有重要影响。又如我们历史上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优势,也在经济管理体制中有表现。再如封建思想残余,文化水平低等等也影响我国经济管理。可见各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特点,往往都同历史传统有关。

第五、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

经济管理体制是人们建立的,因此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有密切关系。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及指导思想尤其有重要作用。

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是承袭苏联的,而苏联这一套体制又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这一套体制和斯大林的理论有内在



联系。例如，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农业上主张全盘集体化，集体农庄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和义务交售。这一理论导致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同时影响我国近30年。又如，斯大林否认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强调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导致经济管理体制中过分集中和忽视利用价值规律，排挤市场调节等等缺陷。

从资本主义国家看，理论对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也很大。如30年代以前，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中起指导作用的理论是传统的自由放任理论，认为依靠市场供求能自动调节经济，主张国家不要干预或少干预经济。30年代以后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理论，认为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避免经济危机。罗斯福实施的新政策就是这个思想指导下提出来的。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一般都依据这个理论制订政策。70年代以来，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里根、撒切尔夫人等是信奉货币学派的理论的。

从世界历史看，经济理论对经济管理体制变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但理论要人来掌握，因此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对体制变动的影响也不能低估。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提高群众思想认识，对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健康发展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其他影响经济管理体制演变因素还很多。重要的如外来的影响。我国的体制就受苏联体制的影响。有的国家的改革，由于其他国家的反对而失败，这里外来因素就起了决定的作用。

注释：

①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实质是生产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79年第8



期。该文没有明确说明经济管理体制也包括上层建筑的内容。本文的观点是对该文的补充。

②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58—159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78 页。

（原载《求索》1983 年第 6 期）



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一、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制订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完全必要的。从我国当前情况看，这种必要性在于，第一，经济体制改革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自觉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制订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才能增强自觉性，防止或减少盲目性。第二，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种改革措施必须配套进行，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才有利于配套改革。同时，改革还是一个长过程，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第三，这几年我国改革已取得了不少成绩和经验，同时也遇到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制订目标模式也是总结经验教训和研究解决面临问题的过程。第四，现在对于体制改革还有种种不同看法，通过制订目标模式，也是统一思想认识的过程，可以经过探讨，使人们的思想统一到比较正确的认识上来。

在我国当前条件下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也是可能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为制订计划体制的目标模式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决定》中还对我国新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基本点作了概括，指出：按照这些基本点改革现行的计划体制，就要有步骤地适当缩



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这些概括实际上已相当具体地勾划了我国计划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轮廓。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也使得制定改革目标模式是可能的。

二、一种研究经济体制模式的比较好的方法

无论研究经济改革的目标还是步骤,都要解决如何划分经济体制模式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划分经济体制模式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根据所有制结构来划分,有的主张根据决策结构来划分,有的主张根据调节机制来划分,还有的主张根据动力结构、信息结构或者综合以上各种结构来划分,等等。以上划分方法各有优点,但也都存在问题。在巴山轮会议上,科尔纳提出应该以调节机制为标准把经济体制划分为 I A、I B、II A、II B 等四种模式,并且主张中国可以把 II B 模式作为改革的目标。但是很多中国专家认为,由于 II B 模式的很多内容还不清楚,因此还不能轻率地把它作为改革的目标。所以,如何划分经济体制模式,也还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党中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要是抓好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第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 and 调节经济运行。这里提出的“七五”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项主要任务,也正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管理体制的三项基本内容。这就启



示我们,可以根据企业状况、市场状况和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状况这三项内容来划分经济体制模式和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根据以上三项内容来研究经济体制模式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第一,可以抓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传统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导致一系列弊端。实现政企职责分开必须为企业创造有利的环境,即为企业提供竞争的市场。同时,发展有计划的商品也要求建立以间接管理为主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因此,这种方法抓住了经济体制的基本环节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第二,可以抓住各种经济体制模式的特征和区别。各种经济体制模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企业、市场和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等方面,弄清楚了企业状况、市场状况以及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状况,也就可以弄清楚各种经济体制模式的区别和联系。当然,经济体制模式的特征还有其他种种表现。但是,企业、市场和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等三方面的特征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第三,可以掌握各种经济体制运行的规律性。经济体制的运行基本上决定于企业、市场和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状况,掌握了这些方面的状况,就可以掌握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第四,可以弥补其他方法的某些不足。例如现在一般从所有制结构、决策结构、调节结构、动力结构、信息结构等方面来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样虽然也能清晰地描绘出目标模式的一些重要方面,但是给人以割裂的感觉。也有人单纯从决策结构或调节结构划分经济体制模式,这种方法突出某些方面,其他方面则给人以不明确、不确定的印象,人们对科尔纳在巴山轮会议上提出的目标模式就有这种印象。根据企业状况、市场状况和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状况来划分经济体制模式,可以克服这些缺陷。因此,所有制结构、决策结构、调节结构、动力结构、信息结构等等将具体而又综合地体现企业、市场和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三、使社会主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

从一定意义上说,使社会主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是我们进行经济改革的最主要的任务。为什么说是最主要的任务呢?第一,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而如果社会主义企业不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则不仅难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甚至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成其为商品经济。第二,传统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因为缺少活力,企业缺少活力,整个国民经济就难以搞活。通过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搞活。第三,经济改革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健全市场体系正是为了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健全的市场体系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四,经济改革的再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以间接控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而这种宏观经济管理制度要以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为基础。只有企业是名符其实的企业,间接控制才能实现预期的要求。

这几年改革中企业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行为,如滥发奖金等等。有人把这归之于自负盈亏。我认为这至少也是误解。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一般远未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又怎么能把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归之于企业自负盈亏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决定》中要求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我们不能把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割裂开来,也不能把负盈和负亏割裂开来。现在有些企业中出现的只负盈不负亏的现象,是违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的。事实上,只有企业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再加上其他条件和措施,才有可能改变传统



体制下企业的行为特征,使企业行为合理化。

社会主义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意味着它们有扩大再生产的经营自主权。《决定》中说,要使企业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个规定是正确的,社会主义企业既应有实物量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也应有价值量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说:要“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使企业真正具有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在“自我改造、自我发展”之前加上“自我积累”。就是明确了企业有价值量扩大再生产的经营自主权,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十分必要的。

实现企业的目标模式还要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保证企业行为合理化的自我调控机制。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由于存在股东、经营者、工人等不同阶级阶层,因而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企业滥发工资奖金等现象,投资也不会不考虑利润率的高低。现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所以存在滥发奖金以及投资不认真考虑经济效益等情况,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内部缺乏健全的调控机制。理论界讨论的国营企业中谁代表国家利益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这个问题。如果国有企业内部不建立健全的调控机制,很难设想能够解决好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企业自负盈亏以及企业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等等问题。对于如何建立这种机制,很多同志已经提出了主张,例如实行股份制,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实行和完善厂长任期责任制,厂长经理工资和企业积累挂钩、由上级决定,对职工工资奖金的最高限额作出法律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等。尽管对每种主张都有不同看法,但进行探讨是有益的,应该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总要求出发,进一步开展讨论。也可以进行试点,创造经验。

上面是我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企业目标模式的一些设想。



我提出使社会主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实现以上的设想,也不会损害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首先,如上所说,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性质和自负盈亏决不是不相容的。而且,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才能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其次,企业具备扩大再生产的经营自主权是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要求,也不会损害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将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次,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制度的变化,有些是会影响所有制的内涵的,例如实行股份制和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会使所有制的内涵和结构发生变化。但是,当股份和资产仍属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不仅不会改变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不会改变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又次,社会主义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也是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和表现。当然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还要由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来保证。下面将探讨社会主义市场和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目标模式问题。

四、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是互为条件的,和建立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也是互为条件的。

我们尤其应该重视完善市场体系对增强企业活力的重要意义。上面曾强调企业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健全的市场体系则是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前提条件。因为,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必须按照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和流通,市场是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舞台,没有健全的、正常的市场体系,企业在产品销售、



生产资料供应以及资金融通等方面都会遇到困难,即使名义上有了经营自主权,也往往难以实现这些自主权。在市场体系不健全和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下,企业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经营和开展竞争,要求它们自负盈亏也是不现实的。而且,离开了市场,企业也难以开展竞争,从而也就没有促使它们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的压力。过去由于产品经济论和自然经济论的影响,我们很不重视市场的作用,现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不能再忽视市场的作用了。

作为目标模式,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市场呢?

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市场体系。通过改革,我们不仅要建立发达的商品市场,包括资金市场、技术市场等等,并要允许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建立和健全资金市场是这几年提出来的。这当然不是说过去我们没有任何资金市场。所谓资金市场也可以称之为金融市场,它包括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两个方面。间接金融是指各单位通过金融机关融通资金,直接金融是指各单位直接发生借贷关系。过去我国银行实行信用纵向分配,用指令性分配的办法规定资金的流向,同时排斥直接融资的合法存在。所以,即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过去也存在资金市场,但严格一点说它不是真正的资金市场,而只是资金分配。

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我们要争取在一定时期内建立一个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为辅,即以银行信用为主体,多种信用方式、多种信用工具并存的信用体制,充分调动地方、企业、个人积累资金的积极性,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动,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形成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和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市场。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关系也要改革,要创造条件,使专业银行实行企业化。有的同志担心,允许当前已经出现的直接融资形式(如企业集股)会



减少银行存款。这种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银行的角度看问题,而应该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看问题,全面认识开放资金市场的作用。而且,据一些地方的调查,现在集资单位吸收的股金中有一部分来自银行的储蓄存款,另一部分则是银行未能动员起来的社会闲散资金。可见,即使是暂时减少了一些存款,而整个社会却可以利用更多的资金,对整个国民经济是有利的。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否包括劳动力市场?对此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应该建立劳动力市场,因为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建立劳动力市场,因为劳动力仍是商品,尽管在性质上已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也有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并非商品,但仍应建立劳动力市场。这些意见可以继续探讨。我想指出的是,是否称作劳动力市场,这个名称问题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建立什么样的劳动制度。传统体制下的铁饭碗制度、劳动力部门所有制以及劳动力不准流动等制度必须改变。否则,劳动者的素质难以提高,企业的活力也难以增强。而改变这些制度,例如实行劳动合同制,建立劳务市场,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相反地正是实现社会主义劳动性质所要求的。

第二,它应该是价格体系合理价格制度灵活的市场。如果价格体系不合理,是很难形成正常的市场的,也难以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国价格体系仍旧很不合理,我们也很难经由市场自发作用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而必须经过周密的设计,制定合理的改革价格体系的方案,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付诸实施。而设计有科学根据同时切实可行的商品价格体系是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考虑到我们要建立一个包括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在内的市场体系,除了实现商品价格体系的合理化,还要实现利率、技术商品价格、劳务价格以至土地价格的合理化,设计合理价格体系的



任务就更为艰巨了。

合理的价格体系要求合理的价格管理制度。我国价格体系严重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体制下僵化的价格管理制度造成的。所以,灵活的价格管理制度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目标模式的内容。对于我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格管理制度,一般都同意应该是指令性价格(即固定计划价格)、指导性价格(即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并存,但对应以哪种价格为主,则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应以指令性价格为主。一种看法认为,应以指导性价格为主。一种看法认为,应以自由价格为主。我认为,以指令性价格为主是违背建立灵活的价格管理制度要求的,看来,建立以指导性价格为主,与指令性价格、自由价格并存的价格制度,可能是比较妥善一点的主张。

第三,它应该是开展竞争的市场。没有市场是难以开展竞争的,但有了市场未必一定有竞争。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着没有竞争或竞争受到严重限制的市场。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完全垄断的市场就更屡见不鲜了。西方经济学曾对市场结构进行分析,这也是研究市场和竞争的关系的。值得重视的是各种不完全的竞争,有的论者说:“中国经济改革所要实现的有计划的市场也已经远离了自由竞争的原始模型,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还会越来越趋于一种类似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这种产生于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组织基础上的规模经济趋势,是我们在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中无法超越的历史阶段。”^①这个意见是有启发性的。它告诉我们,解决竞争问题,要和处理企业组织、规模结构和价格管理结合起来考虑。

第四,它应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建立具有以上特征的发达的市场体系,包括建立发达的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科技市场、劳务市场等等,是不会影响市场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相反,这正



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即使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如果社会主义劳动者没有变成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者,也不会影响市场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当然不是说,坚持市场的社会主义性质不需要一定的条件。为了保证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性质,一要社会主义企业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二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的管理,三要使市场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几点,我们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五、形成以间接控制为主的社会主义 宏观经济管理制度

我们要建立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目标模式有些什么主要特征呢?

第一,它有健全的计划管理制度,把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有人忽视计划管理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这是不妥当的,我们所以要对科尔纳提出的目标模式ⅡB模式持慎重的保留态度,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模式中计划管理的地位是不明确的。现在流行着一种看法,宏观经济管理就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失误。这种看法承认市场机制存在不足和缺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任务不只是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和失误,而且要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这就必须进行计划管理。计划管理不能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但是决不能把缩小指令性计划理解为可以忽视计划管理。

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目标模式应能保证制订和贯彻有科学根据的切实可行的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计划。我们讲宏观控制,就是按照计划的要求来衡量计划执行情况,防止和纠正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以实现计划的目标。有的同志不同意讲控制。其实计划管理



是离不开控制，而控制并非就是采用行政手段和实行指令性计划。国民经济计划应该包括宏观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例如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重要投资项目，消费基金增长幅度等等。为了保证计划的科学性，应该有健全的计划管理制度和科学的计划方法。我们对于如何制定指导性计划还缺少经验，应该向有这方面经验的国家学习。

第二，它通过一系列正确的政策进行间接管理。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是通过指令性指标和其他行政命令来保证计划目标的实现的，新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要制定和执行一整套正确的经济政策，以贯彻社会主义原则，使得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个经济政策体系包括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劳动政策、技术政策、外贸政策、收入政策等等。过去我们制定经济政策有很多经验，但是大都是以产品经济论为指导思想。在新的经济体制下经济政策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为指导思想，这样做我们还缺少经验。例如，产业政策是涉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过去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来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今后的产业政策则既要保证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又要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这样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巴山轮会议上曾广泛交换了西方国家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外贸政策等对国民经济进行间接管理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们设计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目标模式是有启发的。不过西方经济学家有的主张需求管理而反对供给管理，有的主张供给管理而反对需求管理，这种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截然对立起来的理论和主张，对我国未必是适用的。我认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既包括需求管理，也包括供给管理。过去我们曾经偏重供给管理，而且在供给管理中主要实行直接管理，这是片面甚至错误的，但由此不能否认供给管理也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产业



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等等都是既涉及需求管理又涉及供给管理的。

第三,它善于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对于什么是经济杠杆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杠杆是由国家掌握的用来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工具或经济手段。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杠杆是人们运用物质利益规律,通过影响经济行为双方的物质利益以调节和引导经济行为的经济手段。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杠杆是与价值规律、价值形式相联系的经济手段。这些观点强调的方面不同,而一般都同意经济杠杆是物质利益的引导杠杆,是与价值形式有关的经济手段,是由国家掌握的、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服务的调节手段。经济杠杆包括价格、税收、成本、利润、信贷、利息、工资、奖金等多方面的内容。各种经济杠杆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例如,它们发挥作用的形式、对象、范围、灵活性以及后果都有区别。因此,各种经济杠杆有其特有的作用,同时又有自己的局限性。为了正确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必须学会综合运用它们,使经济杠杆的作用方向与经济调节方向一致,并且使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方向(或主要方向)相一致。

还要指出,经济杠杆既可以作为经济手段运用,也可以作为行政手段运用。科尔纳说ⅡB模式也利用经济杠杆,只不过是用作间接行政调节的手段,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目前我国的调节税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间接的行政调节仍是对于企业微观行为的干预,是不应该广泛使用的。

第四,它是分层次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各个地区情况差别很大。因此,宏观经济管理必须是分层次的,要让地方尤其是大中城市有必要的宏观经济管理权限。最近有人发表文章,提出适应建立经济管理层次的问题,具体主张有:(1)适当扩大中心城市的计划权,(2)赋予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职能相适应的



决策权和调节权,(3) 赋予中心城市必要的税收和信贷权,(4) 扩大地方银行的职能,赋予它组织调度和融通资金的必要的权力,(5) 赋予中心城市必要的价格审批权。我认为,其中正当的要求在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目标模式中都应得到满足。现在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分级管理体制,扩大地方的经济权限将对财政收入带来复杂而且不是人们预期的影响,这就增加了分层次宏观经济管理的困难,应该创造条件把“分灶吃饭”改为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并正确核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这样,就会更有条件建立所谓的中观经济管理层次。应该明确,各个层次的宏观经济管理都应该是间接管理为主。正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指出的:“城市政府也必须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不要重复过去那种主要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的老做法。”所以,目标模式中的分层次宏观经济管理和传统模式中的分层次宏观经济管理有原则性的区别。

第五,它有健全的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制度,充分发挥法律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要求把更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准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法律成为调节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和调节经济的运行,是适应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法律和行政命令一样带有强制性,但法治比人治有很多优越性,利用经济法控制宏观经济,可以克服政府机构直接管理企业的种种弊病,既使企业活动符合国家和社会的要求,也不至于侵害企业的自主权。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都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经济立法是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方式。美国经济立法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调整和处理企业之间关系的法规,如保护竞争反对垄断的反托拉斯法。



一类是调整和处理雇主和雇员之间关系的法规,如劳资关系法、最低工资法、限制雇佣童工法。一类是保障社会利益的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消费安全法。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有立法权,立法和司法比较严格。日本对企业、市场、产业有很多法律规定,如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方面,制订了“银行法”、“长期信用银行法”、“外汇银行法”、“信托业法”、“相互银行法”、“信用金库法”、“临时利率调整法”、“存款保险法”、“证券交易法”、“禁止垄断法”、“外汇和外国贸易管理法”,等等法规。中国只有在有了各种必要的经济法规后,才能实现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目标模式。

第六,它重视发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辅助作用。传统体制下行政手段是最重要的宏观管理手段,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也不能忽视行政手段的作用,那么在实现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目标模式以后,是否可以不重视甚至放弃行政手段呢?我认为决不可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改革任务完成以后也是存在的。

建立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和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以及建立健全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三位一体的任务。为了建立具有上述特征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需要加强对其他国家包括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研究。有一本美国人写的书说:人们普遍把美国经济看成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化。事实上,立法机构或政府在美国经济中的干预作用几乎是从合众国开始建立之日始,而且还有逐日增大之势。现代技术、加速城市化以及个人对社会日益增大的依赖这些方面,迫使公共当局非扩大控制加强管理和监督系统不可。当今美国每项大的经济活动中,国会以及州和地方立法机关都要参与控制和管理企业及其雇员、供应者、顾客、贷款者、股东、竞争者以及公众之间的基本关系。联邦、州的地方管理机构对企业行为、消费者安全、食



品和药物的纯洁和效用,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与服务质量,不动产或证券的买卖,空气和水的质量标准以及许多方面的事情无不施加影响。^②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为我们设计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目标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思考材料。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的前提下,这些经验对我们是很有用的。

注释:

- ①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经济研究》1986年第3期。
- ② 参见《外国经济体制概论》,第18—19,80—81页。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增刊)



正确处理经济改革和 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相互制约的。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使它们相互促进。为此，需要探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关系上的规律性，并正确运用这个规律。

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经济改革是为了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改革任何时候都必须服从于经济发展。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发展在短期内服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从长期看服务于经济发展。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后一半是正确的，前一半则不很准确，有可商榷之处。

在实际工作中安排短期内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有时是根据经济改革的要求考虑经济发展问题的。由于安排时会遇到矛盾，在有些场合使经济发展服从于经济改革可能是必要的。例如，为了进行价格改革，可能需要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增长速度，从而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上述意见可能是指这类情况，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是，必须看到，即使就短时期内说，经济改革也应该是有利于而不应该妨碍经济发展。改革总是要配套进行的，短时期内也不只是进行某种单项改革，所以，从一种改革措施看可能经济发展要服从经济改革，而就各种改革措施配套而言，经济改革仍要有利于经济发展，也就是要服从经济发展。值得注意的



是,如果短时期内经济改革不服从于经济发展,又怎么能保证从长期看经济改革真正服务于经济发展呢?短时期内的经济改革如果妨碍了经济发展,就要认真考虑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否妥当。

经济改革总是在一定经济环境中进行的,经济环境对经济改革有重要制约作用。顺利进行经济改革要求有一个有利的经济环境。因为,在经济严重困难或绷得很紧的情况下,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如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价格,形成市场体系等等是难以出台和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的。我国80年代初开始改革就碰到经济环境问题,当时通过探讨“调整”和“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改革要服从于调整和有利于调整,使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匈牙利1968年改革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形成一个比较有利的经济环境。当然,在经济困难时期也不是绝对不能进行改革,波兰前一阶段的改革就是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在这种困难形势下进行改革,不仅改革的内容和措施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是有极大的困难和风险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宽松的经济环境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改革的原因,结论是要求改革有一个较好的(也就是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诚然,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存在着盲目追求速度、不注意经济效果和“投资饥饿症”等弊端,有可能导致经济绷得很紧。但是,决定经济状况的因素是很多的,除了经济体制以外,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政策乃至国际经济状况和气候条件等等,都会对一定时期的经济有重要影响。例如,政府的投资政策、消费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等都影响经济状况,在既定的经济体制下,这些方面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国1981年调整经济的经验就充分说明,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较好的经济环境是可以做到的。从另一方面讲,即使形成了新的经济体制,也并非注定就有宽松的经济环境。君不见,即使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



家,有些不是也困难重重、经济绷得很紧吗?我们不能把经济改革和经济环境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了,而要更深刻地掌握其规律性。

经济改革和扩大再生产形式的关系,也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扩大再生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外延的,一种是内涵的。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主要依靠追加投资和追加劳动力,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主要依靠技术改造。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要正确处理两种形式的问题。而从发展方向上说则要越来越重视内涵的扩大再生产。这是为了充分发挥资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先进科学技术的作用和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为了解决资金不足资源有限的困难,同时也是外延扩大再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时的必由之路。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一般应该有利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经济改革也正是实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迫切要求。但是,改革并非自然地能够有利于促进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为此,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并且在采取经济改革措施时贯彻这个指导思想。

既然经济改革要能够促进内涵的扩大再生产,那么是不是就不要重视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呢?有人说内涵的扩大再生产要求经济改革,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则不要求经济改革。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呢?应该怎样处理好经济改革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呢?

我认为,说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不要求经济改革,这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不能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粗放经营完全等同起来,在一定情况下,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属于粗放经营,至少带有更多的粗放经营的因素。但社会主义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也要求尽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求节约资金、资源和提高资金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要求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由此可见,生产集约化并非只是指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不过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则必然是集约化生产。在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时,也要力求实现生产集约化。而实行这样的外延



扩大再生产,无疑是要求进行经济改革的。通过改革,这也是可能的。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看,经济改革也是有利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的,中国80年代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说明,即使从社会主义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看,也是要求经济改革的。

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具备着发展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有利条件,例如有较多的劳动力,较多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忽视扩大再生产的外延形式,经济改革也应有利于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健康发展。这些国家要使外延扩大再生产建立在较高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基础上,努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资金利用率和资源利用率,并引导经济向内涵的方向发展。

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很多的,经济改革是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或者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改革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但改革要真能促进经济发展,还需要制定正确的政策,使各种改革措施都有利于发挥各种影响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的作用。如果改革措施起不到这种作用,也难以如愿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还要看到,改革并不能包括或代替一切工作。例如,改革能够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营改善,但是并不能代替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真能促进经济发展,需要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主要因素,从多方面促进经济的发展。

(原载《群众》1987年第11期)



改革应以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为目标

改革前,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的,故称为产品经济。它的优点是可以集中使用资源,有利于完成某些国家规定的任务。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体制起过积极作用。但这种体制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弊端,不利于发挥地区、部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必须实行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就是要在体制上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尤其是让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在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企业之间的分配,即通常说的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不过资源配置不只包括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问题,还包括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科技进步等内容。资源配置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从世界经济的历史经验看,让市场机制作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是解决这个问题、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等问题的较好的办法。而让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也就是实行市场经济。所以,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本来就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使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转变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但是,我们对于市场机制作用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伊始我们就认识到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农村、城市采取的改革措施都是为此创造条件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更是自觉地实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日益扩大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尽管如此，大家对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中要不要起主要作用却长期没有取得共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其他有些同志也说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并未及时被人们普遍接受。

传统观念认为，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姓“资”而不姓“社”，市场经济当然更是姓“资”而不姓“社”了。我们记得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曾争论过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提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由是商品经济姓“资”而不姓“社”。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把马克思主义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但以后又展开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的争论。

有些同志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针对这种观点，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同志的科学论断为这场长期争论做了总结。通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清除了错误的传统观念，这才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正确提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历史看，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以前，资本主义就是搞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以后的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也是不搞计划，只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则是搞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在这两种场合，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只限于社会主义，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后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有了很



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了,有的甚至被称为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也搞市场了,有的也被称为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再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就不符合实际情况因而不正确了。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商品经济有一个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过程。在不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市场机制还不能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这时候的商品经济还不能称为市场经济。而当商品经济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市场机制就成了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就成为市场经济了。因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它们都要有市场,都要实行等价交换,都要开展竞争,都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些是共同点。但并不是任何商品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小商品经济就不是市场经济。只有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相当发达,市场机制成了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才成为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例如,既要有发达的商品市场,还要有发达的要素市场;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要有相应的微观基础即现代企业;要有资源自由流动的各种必要条件;还要有正常的市场运行规则和健全的市场管理制度。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并克服其消极作用和弥补其不足,还要有正确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和政策。可见,市场经济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市场经济。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现在我们实际存在的商品经济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们要根据这种要求,深化改革,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确切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继承和发展。



如果只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是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划了一条不该划的鸿沟。由于这种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曾经非常流行,因而使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有局限性,在有些问题上不够明确或不够彻底。例如,我们曾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概括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有些同志进而认为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就难以使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又如,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国有企业只能有相对的独立性。所谓相对独立,就是相对自主经营而不完全自主经营,相对自负盈亏而不完全自负盈亏。这样,国有企业就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而也难以使市场机制发挥它应有的调节作用。再如,我们曾规定劳动力、土地和国有企业等都不是商品,这样就难以形成生产要素市场,难以使国有企业优胜劣汰,难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再如,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既有行政管理权,又有财产所有权,同时又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对财产有法人所有权,这就难以实现政企职责分开,而政企职责分开则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这些理论上的局限已经影响到改革的实践,增加了改革的困难,造成改改停停的局面。为了克服这些局限,要在继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科学内容的基础上,把这一理论推向前进,使之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要据此进一步明确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市场培育、宏观管理改革的目标和要求,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艰巨的紧迫任务。

有的同志担心,实行市场经济会导致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两极分化。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不能据此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市场机制的作用伴随着自发性,因而有可能导致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贫富悬殊等两极分化现象。但是,这只是可能性而



非必然性。只要做好宏观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就可以使这种可能性不会变成现实。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管理起着重要作用,政府可以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减少和克服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两极分化。有人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就是不要宏观管理,这也是一种过时的错误观念,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和要求。市场机制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但又不是十全十美的,更不是万能的。这就决定了实行市场经济也要宏观管理。国家和计划的作用也很重要。只要市场能做到的,就要让市场去做。市场做不到的,做不好的,或者做起来代价太大的,再由国家和计划去做。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三个方面:(1)为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有利条件。(2)对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进行社会纠正。(3)补充市场机制的不足。由于较好地发挥了这些作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也减少了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贫富悬殊现象,并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更有条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并认真研究和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改进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保证国民经济的计划性,防止两极分化。

(原载《中国软科学》1992年第6期)



必须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

党和政府早就明确了实行政企分开的方针，并一再提出了促进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尽管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迄今政企不分现象仍相当严重。也有人认为国有企业不能也不应该实行政企分开，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成分共同发展。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一般数量很少的格局，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格局。因此，我国不仅要在非国有经济中实行政企分开，而且在国有经济中，也要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中实行政企分开。这样才能使我国国有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健康发展。事实上，不论是世界范围内的实践经验还是科学理论的研究成果，都表明在国有经济中实行政企分开是可能的。

我们之所以必须实行政企分开，是因为政企不分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第一，难以建成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政企不分不仅违背政企分开的要求，也会妨碍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要求。第二，市场体系难以健康有序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和发展健康有序的竞争性市场体



系,而在政企不分,即官商结合的情况下,是难以建立起健康有序的竞争性市场体系的。第三,宏观调控难以正常进行和顺利实现目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要以政企分开为前提,政企不分,政府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宏观调控难以搞好。第四,政企不分,权钱结合,为腐败提供了有利的土壤。这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寻租”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第五,企业难以增强活力,国有资产流失现象难以根治。由于政企不分,企业不能实行“四自”,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政企职能不清,谁都管谁又都不负责任,则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第六,不利于政府实现管理现代化和提高工作效率。政企不分,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就缺少重要的前提条件,也必然会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产生不利影响。以上分析表明,必须对政企不分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和危害有足够的认识。

为了促进政企分开,我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增强政企分开的紧迫感,痛下决心,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党政领导要提高对政企分开重大意义的认识,认识到这是事关“两个根本转变”的大问题。最近江泽民同志指出:搞好国有企业,必须由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抓,及时协调和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实现政企分开也应如此。

第二,加大力度,继续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经济职能。要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还要抓紧做好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工作,抓紧不抓紧大不一样。

第三,把解决企业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提上议事日程,下功夫取得进展。由于明确了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明确了政府对国有企业只负有限责任,因而有可能把企业经营的财产和国家的其他财产严格分开,使企业对盈亏完全负责。还要建立起必要的制度,使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全体成员(包括所有者、经营者、职工)的当前利



益与长远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企业自我发展问题也要尽快解决,要创造条件使企业具有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和能力,不是依赖政府而是能够自主地实现扩大再生产。

第四,积极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这是实现政企分开的重要条件。有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1)国有资产管理部門是政府部門,不能兼有企业的职能。(2)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企業,不能兼政府的职能。(3)中央部委一般不应成为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单位,避免出现既是“婆婆”又是“老板”的单位,以防止垄断现象。(4)认真落实法人财产权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正确处理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关系,保障各自的权益,防止一方的权益受到另一方的侵犯。

第五,建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实现政企分开的要求。当前要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经营内容,抓大放小,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增强整个国有经济的活力,发挥其主导作用,并为政企分开创造有利条件。

第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这也是政企分开的必要条件。

第七,加强有关立法工作。其中,政府法制建设尤为重要。要明确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促进政企分开。

第八,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形成促进政企分开的合力。

第九,转变思想观念。例如,要改革计划经济条件下主要依靠政府办企业的观念,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依靠企业办企业的指导思想。

第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展多



——必须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

学科的研究工作,为实现政企分开、正确处理政企关系、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本文为提交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的书面发言,1997年3月)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创新和贡献

党的“十五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江泽民同志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近 20 年的丰富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跨世纪的伟大事业进行了战略部署，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下面谈谈“十五大”报告在经济理论上的创新和贡献。

一、关于公有制的含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要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而在过去改革中，国有经济比重明显下降，纯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 1985 年为 64.9%，1995 年为 34%。有人为此惊慌不安，认为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动摇了，搞私有化了。

这就涉及公有制的含义。在一些人思想中，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国有制为主体，这种思想来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书认为公有制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有经济（它称之为全民所有制），一种是集体经济，前者是高级形式，后者是低级形式，后者依附于前者，



并且要向前者过渡。这种理论越来越不符合实际情况,不符合客观规律,但它仍有很大影响。

报告提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并且提出: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看法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纠正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错误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报告还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1995年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85%左右,公有制工业产值比重为80%左右。另据统计,1996年纯公有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69%,包括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6%,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起着主导作用。可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没有动摇。

集体所有制是不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呢?不是,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各有其优缺点。报告说:集体经济可以体现共同致富原则,可以广泛吸收社会分散资金,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公共积累和国家税收。这是完全正确的。所谓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观点,也越来越被证明是缺少根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并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适应生产力状况还是不适应生产力状况之分。凡是适应生产力状况并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形式,就是先进的形式,应该允许存在,否则就要进行改革。报告提出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合作社所有制也是一种公有制形式。报告说的集体所有制是包括合作社所有制的,不过一般说的集体所有制是指财产为集体公有的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则是社员有股份的。有人曾说合作社所



有制是私有制，理由是社员个人有股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合作社中社员确实有股份，但合作社作为法人是集体所有和占有财产，集体经营，社员共同劳动，一般来说，不存在剥削或占有别人劳动的关系，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然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报告肯定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是集体经济，这是完全正确的。

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具有重大意义。① 可以弄清公有制是主体和国有制是主导的联系和区别。② 使人们更加重视集体所有制这种有远大前途、很大优越性的公有制形式。③ 1996年混合经济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中已占19%以上，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占20%。往后混合经济单位还会越来越多，其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也要更加重视。④ 这是理论上的创新，将帮助人们解放思想，打消顾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二、关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这一段话，不仅对于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重要意义，而且发展了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

改革以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很单一的，国家所有制采取的是国有国营形式，集体所有制采取的主要是人民公社形式。改革以后，公有制实现形式逐步多样化起来。到现在，国家所有制已经有了利润分成、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公司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等形式，集体所有制也有了集体经营、联产承包、合作社、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



报告为什么要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问题呢？我体会，这首先是针对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争论提出来的。对于股份制曾有过尖锐的争论，有些同志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姓“资”不姓“社”，搞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对于股份合作制也有类似的想法。为了说明公有制可以实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理论界有人提出所有制和所有制实现形式是不同的概念，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所有制实现的形式，它本身不姓“社”也不姓“资”。这种观点为“十五大”报告所肯定。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股份制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这是既有针对性也是非常深刻的。

马克思就曾经提过：由于股份公司的成立，“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在股份公司内部，职能已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①并说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财产的扬弃”。^②

报告提出：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这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改革国有企业是要使它由名不符实的企业变为真正的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但改革中曾经采取过的利润分成、承包经营等形式都难以实现这个要求，而股份制按其特征和作用则可以成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真正的企业的一种较为普遍适用和有效的形式。

报告还提出：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



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也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对于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都要积极稳妥地推行。

上面说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事实上,从历史发展看,私有制也有多种实现形式,例如,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采取过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等形式;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所有制采取过独资、合伙、股份制等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过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等形式,这也都是资本家所有制在一定条件下的实现形式。有的同志说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情况下,所有制只会有一种实现形式,不会产生所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问题,这种看法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马克思把所有制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在这个定义中,所有制实现形式是包含在所有制的内涵中的。但是,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要求我们把所有制和所有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在这里,我体会所有制指的是所有权,所有制实现形式则指的是实现所有权要求的一套制度规定,所有制的实现问题实质是所有权的实现问题。所有者实现自己的所有权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否则所有权对所有者就没有实际意义了。例如,土地所有权的实现是为了地主的权益,特别是为了使地主得到地租。资本所有权的实现是为了资本家的权益,特别是为了使资本家得到利润。他们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会根据具体情况和条件努力寻找一种最好的所有制实现形式,因此私有制实现形式也有过发展和多样化的过程。

公有制的实现也是为了所有者的权益。我们曾经把所有制的实现看得比较简单,事实上它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实现更加复杂。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等同起来,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所有权确实又是全体人民所委托的。因此,国家所有制的利益涉及国



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关系,更具体一点说,涉及中央、地方、部门、企业、职工(职工又可分为经营者、劳动者)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处理好,才都能增加收入,而且,也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因此,公有制在寻找实现形式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要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

事实上,私有制的实现也有一个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地主、资本家当然要靠剥削工人、农民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但是,为了使自己的剥削收入不断增加,以及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他们也必须发展生产力。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时期地主资本家都是这样做的。当剥削阶级不再注意发展生产力而只是用增加剥削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时,他们的制度也就要走下坡路了。

究竟什么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呢?既然所有制实现形式是相对于所有权的实现而言的,是指实现所有权要求的一套制度规定,我体会,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它包括财产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经营目标、管理机构、领导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等内容。因此,所有制和所有制实现形式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是一种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同样是公有制,由于实现形式不同,对发展生产力的影响,对发展市场经济的影响,对企业运行和效率的影响,以及对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关系的影响,都会有所区别甚至大有区别。公有制实现结果如何,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每个企业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寻找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要求,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所有制实现形式。

附带提出,一种所有制实现结果如何,除了决定于所有制性质



和所有制实现形式,还决定于经营管理水平、国家经济政策、政府宏观调控等条件。对这些问题深入研究,也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理论课题。

三、关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关于国有经济的作用也有过严重的争论。有人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经济应该是主体,占统治地位。例如,有人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能低于 $4/7$,公有经济不能低于 $6/7$ 。有的人主张要把所有的国有企业搞活,有的人反对抓大放小的方针,有的人把调整所有制结构说成搞私有化,等等。

其实,国有经济是主导而不是主体,这是早就明确了。如果国有经济是主体,势必导致以下后果:①难以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不仅难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且集体经济也难以发展。②难以形成千千万万个市场竞争主体,因而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③难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搞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没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情况下,改革将缺少动力、压力和条件。④国有经济由于战线过长,摊子过大,企业缺少活力,困难重重,难以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

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和公有经济的地位作用的联系和区别,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报告还指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并且指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是一个新提法。什么是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呢?我体会,一是指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二是指通过对大企业和大企业集团的控股以及对有些企业的参股发挥作用;三是指做那些非国有企业不能做或不能让它们做的事情;四是指保



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

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将会进一步消除人们的疑虑，使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事业。

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国有经济的论述，不仅总结了我国的经验，也总结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即总结了世界范围内国有经济发展的经验。这几年，我国不少同志对国外国有经济的发展作了研究，探讨了其演变规律。

1.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的。从世界主要国家看，尽管各国制度不同，国情有别，但国有经济一般都承担着以下职能：① 发展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② 发展基础产业，如矿山勘探、石油、煤炭、电力等的开发。③ 发展某些支柱产业。④ 发展某些高技术产业。⑤ 承担特殊的社会职能，如军工生产、维持就业、开发落后地区。

2. 世界各国发展国有经济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在有些时期内，有些经济活动，由于投资大，回收慢，依靠个人和集体是搞不了的，这就必须由国家搞；有些经济活动私人不愿意搞，有些私人也能搞，但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不能让他们搞，往往也要由国家搞；还有一些是国家和集体、个人都能搞，但国家搞更有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好，国家应该也可以搞。

3. 各个产业部门和国有经济的相容性是不同的。国有经济在有的产业部门优势大，在有的产业部门优势小。但各个国家国有经



济一般都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也有规律性。

4. 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它是受多种条件主要是受经济发展的要求制约的。各国的经验表明，在特定时期，国有经济的发展总是要受一系列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制约的。概括起来，制约国有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① 发展国有经济的必要性。② 经济技术条件的变化。③ 国家的财政状况。④ 私人经济发展的状况。⑤ 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即成本和收益的比较。⑥ 社会制度。⑦ 意识形态。

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比重过大往往导致国家负担加重，财政发生困难。因为，国有企业相当一部分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少国有企业是亏损的，要靠政府补贴过日子。国有企业增多，政府的财政负担就会加重，从而导致财政状况恶化。这是有些国家搞私有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5.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变化与工业发展阶段有着内在联系。如果把工业发展分为幼年期、成长期、成熟期、更新期（后工业化时期），可以发现在幼年期国有企业比重小，比重提高速度也最慢。成长期比重会较快地提高。成熟期国有企业比重达到最高峰，一般不会再提高比重。进入更新期，国有企业比重则逐渐下降。国有企业占 GNP 比重的变化呈抛物线形状。

6. 各国发展国有企业都有其社会目标，许多国有企业就其自身的经济效益是不好的，需要财政补贴。但从国际经验看，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主要条件是 enterprise 有经营自主权，有明确的财务责任，参加市场竞争。

党的“十五大”报告由于总结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丰富经验，特别是由于理论上的突破，可以说已经规划出了一条正确和可行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道路，主要内容有：



1. 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改革国有企业主要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明确国有经济的地位。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前一个问题,后一个是“十五大”才解决的。

2. 明确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十五大”在这方面理论上的突破,为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为推行股份合作制,为贯彻抓大放小的方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3.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报告全面深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也不能不受所有者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要采取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充实企业资本金”,“培育和发展多元投资主体,推动政企分开,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并提出要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尤其是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更将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4. 提出把两个转变结合起来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从总体上和主要方面解决了两个转变如何结合的问题。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有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有重大进展,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尤其是报告提出了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在微观层次上指明了把两个转变结合起来的途径。

四、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

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也有新的提法。报告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提法是“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过去对非



公有经济的财产保护没有什么明确的法律文件规定。“十五大”报告则明确提出：“要健全财产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是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相适应的。这些新提法比过去的提法更积极、更准确，必将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据统计，到1995年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企业为2594万户，其中私营企业64.5万户，从业人员5569万人，注册资金4438亿元，缴纳税收款1230亿元。1996年非公有制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

改革以来，非公有经济发展是很快的。以个体私营工业来说，80年代由于基数小，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其产值占全国工业比重不大。到1990年，个体私营工业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90年代以后，个体私营工业发展速度加快，1991—1995年中全国个体私营工业产值由1257亿元增长到11821亿元，比重已超过15%。其特点有：私营企业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一批私营企业向规模化、集团化和多角化经营方向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出口创汇增加；公司型私营企业比重不断提高；与其他经济成分的联营合作日益增多，混合经济成为发展新趋势。

个体私营工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一是已成为增加就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是已成为税收的重要来源；三是增加了社会有效供给和服务，方便了人民生活；四是造就了一批新型的企业家，培育了一批管理人才；五是促进了市场竞争，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六是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个体私营工业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问题有：①对私营经济的认识问题尚未解决，某些管理体制不够完善，有些地方政策不落实。②私营经济遭受侵权现象较严重，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③私营企业生产经营中有不少困难，没有得到公平待



遇。④ 部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自身素质低，管理不规范，有些私营企业职工权利得不到保护。⑤ 情况和家底不清，难以进行有效管理。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个体私营工业存在的问题表明，对非公有经济歧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的。这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我国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所决定的，是社会生产落后所决定的。例如，我国还是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国家；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还占很大比重，科学教育文化落后；贫困人口还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还比较低；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等等。这种情况决定必须长期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非公有经济都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服务。

目前，我国非公有经济的比重不是过大，而是较小，从非公有经济的生产经营业绩来看，非公有经济也还有生命力，有相当广阔的发展前途。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可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③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活的范围内获得充分发展的权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他还在一篇内部讲话中说：《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



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现在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毛泽东的这段话还是有教育和指导意义的。

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呢？我认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和消极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因此，既要鼓励引导，又要监督管理。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抽象地回答，不是绝对没有可能性。因此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具体分析，只要按照党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办事，是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

1. 我们的方针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个体私营经济是在这个条件下发展的。

2. 个体私营经济受到国家政策的监督和管理。

3.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4. 广大工人、农民已经不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私营业主也没有而且不可能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

5. 对于私营经济中收入出现的悬殊，可以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进行调节，防止和克服两极分化。

6. 个体经济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发展为资本主义。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个体经济就没有使封建社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在更不具备形成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

7. 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能接受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民营企业家大都不仅爱国，而且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这是民营企业家最主要的政治要求。

前面曾说过，所有制和所有制实现形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是统一又相矛盾，公有制实现形式中可能会利用一些私有的因素，私有制实现形式中也会出现一些公有的因素。只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来解决私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私有经济完全可以纳入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轨道,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面还说过,所有制实现结果如何,不仅决定于所有制性质,不仅决定于所有制实现形式,还决定于其他条件。据此,我们有广阔的余地和充分的可能使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巩固,当然这需要清醒的头脑,正确的政策,艰苦的工作。

五、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也是一个新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是:“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现在把它提高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而且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时间。既然是至少100年时间内必须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安排,就不是权宜之计,不是一般的政策措施而是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安排。可见,这个新提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提出了公有制含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国有经济作用、非公有经济地位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十五大”报告指出要明确公有制含义、明确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明确国有经济作用、明确非公有经济地位,并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这一切表明“十五大”提出的这个新提法,内涵极其丰富,并且是来之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要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呢?报告回答说:①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②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③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